



引用格式:程耀明. 现代化视角下中国道路的形成、内涵和意义[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1-8.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01-08

现代化视角下中国道路的形成、内涵和意义

Formation, inten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ath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程耀明

CHENG Yaoming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通过对东西方现代化运动特点的分析,考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吸取东方国家尤其是苏联现代化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现代化道路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可以发现:中国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必然产物,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国道路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创又需要其长期领导的道路,是突出重点又强调各个领域统筹发展的道路,是对中国有利又增进世界福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前景广阔又需要进一步拓展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开创,不仅使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乃至瓦解了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

现代化;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7-10-26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项目(huy-da1521)

作者简介:程耀明(1962—),男,河南省杞县人,河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现代化逐渐成为一场全球性变革运动,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世界结构和各国之间力量的对比。现代化在给西方带来丰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使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以摆脱来自于西方的政治控制、经济盘剥和文化奴役,是那些主权国家必须作出回应和加以解决的最现实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这条道路的内涵和目标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国内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国际上获得了普遍认同。中共十九大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这为我们描绘出一张更加宏伟的现代化蓝图,标志着中国道路的日益成熟。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必然产物,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

本文拟通过对东西方现代化运动特点的分析,考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吸取东方国家尤其是苏联现代化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现代化道路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揭示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以增强道路自信,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中国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

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流派纷呈,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结构学派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学派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行为学派认为,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实证学派认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审视,使我们深受启发。但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提供的方法论指导,以及苏联现代化实践提供的初始经验,我们就不能清醒地把握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关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不断加剧,它在对全球资源进行巧取豪夺的同时,还强制性地把自己的经济模式、政治架构和文化观念输出到其他国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摧毁了东方国家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274}，“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276}。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把全球都纳入到了现代化运动过程中,现代化已经不再是西方社会的事情,而是逐渐成了主导全球的趋势。然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西方国家加速现代化的步伐,并猛烈冲击落后国家的制度形态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难以克服的矛盾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并日益尖锐化,促使落后国家不得不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行反思。这些落后国家既认同西方现代化的成就,又希望避免西方现代化的消极后果;既想通过现代化摆脱其落后和被奴役的命运,又想独辟蹊径开创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现代化运动是资本逐利本性驱动的结果,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演变而来的,具有积极主动的特点;而东方现代化则

是以打破原有社会秩序为前提,具有被动接受和模仿的特点。因此,东方社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能回避社会形态更替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现代化放在资本主义架构中进行研究,认为现代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和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结果,资产阶级按照资本主义的性格塑造了现代化的性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走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为现代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而认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具有明显的异构性。恩格斯晚年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后能否通过社会结构的改造加速进入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研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3]这一论断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既抓住了现代化的本质和规律,又为各个国家和民族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方法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独特研究视野为东方国家探索符合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思考空间,在实践中,东方国家必须选择好并走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个任务只能由具备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完成。

列宁对此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对俄国现代化的意义这一问题上,列宁历史而又客观地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虽为俄国现代化提供了技术基础,但不可能为俄国现代化提供所需要的组织保障。因此,俄国推进现代化的最终出路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基于这种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不

久,在俄国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列宁最初尝试通过强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此后不久列宁就对这种直接过渡形式作了深刻反省。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4]502}。列宁认识到,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只有把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形式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迂回过渡”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就曾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后,列宁及时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4]493}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只是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还不能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对东方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对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行政力量迅速调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速现代化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正是通过实行这种模式,苏联仅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一百多年乃至近二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历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奇迹。苏联模式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方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引发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创新和西方经济实践的变革。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运动,无不受到苏联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影响。此外,苏联模式还使

后起的国家看到了现代化的希望,甚至被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移植和仿效。

在经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起步阶段或经济恢复时期,苏联模式的确能够发挥其要素集聚高效和战略目标明确的优势。但是,在现代化加速阶段,即需要对各种要素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加以配置的时候,其局限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苏联模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悲剧落幕,促使我们对现代化模式进行重新思考,为中国道路取得成功提供了宝贵财富和前车之鉴。

二、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与中国道路的形成

现代化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但是,近代以来,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的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洋务运动是在不撼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发展中国近代工业,这种打上西方印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现代化运动,势必遭到西方列强和国内顽固势力的联合绞杀。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找到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幻想通过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来挽救中国。由于没有彻底肃清封建土地所有制,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相互勾结,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一度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军阀割据,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再次幻灭。在内部制度制约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多次丧失现代化机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把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封建官僚和中国资产阶级身上无疑是痴人说梦,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成为历史,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5]21}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后就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此后逐步认识到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推进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用敏锐的世界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其关键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认知和评价。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得出的结论,究其原因:一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发育不充分,致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因而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二是近代中国工业不发达,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三是西方列强不愿意中国同他们分享世界资源和文明成果,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所要求的国际条件。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了多方位的有益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基础薄弱和技术落后,现代化存在巨大困难;二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理论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实践上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模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度曾经认为苏联模式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是,当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开始提出质疑。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以苏为鉴”,但是遗憾的是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过高估计了政治力量的作用,将政治动员视为解决经济问题并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毛泽东曾经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但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不可能展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活力难以释放,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成了镜中之花。实践证明,在传统发展模式下谋求现代化,在中国同样行不通。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

时期对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慎重思考。邓小平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才能开辟正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于1979年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16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2-3}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从思想方法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了深刻的总结,其要义所在就是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5]29}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35}他

还说:“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5]56}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到中共十九大,历次全国党代会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词,可谓一以贯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也一脉相承。而且,历次全国党代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论述都有标志性的拓展。中共十三大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与之相应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中共十七大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重新表述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与之相应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中共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共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现代化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论述的拓展,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三、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国情下的现代化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现代化道路更是千差万别。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而探索出来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广泛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和经济运行的先进方式,有极其深刻的内涵。

1. 中国道路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遭受重大挫折,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比以往的任何制度都更能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道路必须将社会主义方向作为前提。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7]110}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认同。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5]19} 他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5]22}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 这一论述不仅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密切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必须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诉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大。当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

章”^{[5]23},也是前人从来没有写过的新文章,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考验,只有坚持政治定力和道路自信,才能写好这篇文章。

2. 中国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又需要其长期领导的道路

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结果,继续走好和拓展这条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曾提出这样的疑问:“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6]170}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确不同:一是中国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谋划的,不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坚实的技术基础;二是中国现代化背负着沉重的人口包袱,必须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一个凝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作为国家的政治核心,中国就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当代中国,能够凝聚全国人心和整合全国资源的坚强政治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5]7} 他强调,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5]14},“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1]。

3. 中国道路是突出重点又强调各个领域统筹发展的道路

现代化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统而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的现代化,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作了系统阐发。他说:“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5]9}经济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程度较高,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强,从微观方面来看,经济现代化就是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人民在法律框架内享有充分自由,各项政治权益有所保障。文化现代化表现为科学精神深入人心,先进文化得以弘扬,创新意识不断光大,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多元文化格局日益形成,人们的合理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现代化表现为社会治理更加科学,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社会运转更加顺畅,法治社会日益成熟,人们能够按照公平规则分享社会资源和发展红利,幸福指数大大提高,人人安居乐业。生态文明主要表现为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善待自然,决不把自然作为奴役和掠夺的对象,从而为人类营造更好更美的生存空间。现代化的上述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经济现代化是基础,政治现代化是保障,文化现代化是引领,社会现代化是目的,生态文明是条件。

4. 中国道路是对中国有利又增进世界福祉的和平发展道路

综观世界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国家

走的是一条掠夺式的现代化道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它们不仅把现代化建立在对本国人民压榨的基础上,还把本国的现代化建立在别国贫穷和落后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觉醒,这条所谓的现代化道路已被抛弃,人类需要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的,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决定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遇深重苦难决定的,更是当今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新型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稳定的国内局势,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只有通过发展增进自身利益又在国际交往中兼顾他国利益,才能获得现代化永续动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1]

走和平发展道路,可以使中国在上世界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打破“国强必霸”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现代化模式,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解决许多世界性难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性意义已经被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所证明,能够经得起世界历史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5]247}“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5]265}“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5]267}

5. 中国道路是前景广阔又需要进一步拓展的道路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才能赢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并获得更大的成就。中国道路不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空间和新纪元。中国道路是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中国道路的前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道路是我国各项事业阔步向前的重要支撑,它赢得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和国家的赞誉,无论什么国家都不能无视这条道路所迸发出的活力和它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实惠,使国家逐渐繁荣强大,一改近代以来其贫弱落后的形象,获得世界的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1]因此,中国道路是一条既遵循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个性的道路,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认识或者难以预知的因素对它产生深刻影响,这条道路还需要我们更多地付出和进一步地拓展。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5]21},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必然结果,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道路的开创,不仅使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乃至瓦解了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中国道路使西方国家从傲慢中惊醒,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推动了符合人类文明要求的现代化进程,为世界发展多样化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3.
- [4]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引用格式:张斌,张乾元. 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内涵、基础与实现路径[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9-1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09-06

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内涵、基础与实现路径

The connotation, found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popular identity of Chinese dream

张斌,张乾元

ZHANG Jian,ZHANG Qianyuan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中国梦之大众认同是一种多维度的认同,它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理论认同、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的高度统一。当前中国梦之大众认同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其思想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其利益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其政治基础;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整体观是其民族基础。要实现人民群众对中国梦的广泛认同,一是应加强对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大众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同;二是在中国梦的实践中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强化大众对中国梦的广泛认同。

关键词:
中国梦;
大众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7-09-11

作者简介:张斌(1989—),男,江西省南昌市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张乾元(1965—),男,湖北省广水市人,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崇高奋斗目标而展开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因而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梦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因此,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是中国梦提出和实现的前提与基础。中国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认知和认同程度,直接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鉴于此,本文拟全面探讨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基本内涵,阐明当前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社会基础,并为提升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提供切实有效的途径,以增强实现中国梦的自信与自觉。

一、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基本内涵

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是指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可进而自觉践行。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是多重维度的认同,既包含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认同,也包含了对中国梦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实现目标、实现途径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认同,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理论认同、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的高度融合和统一。

1.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实施的重大战略构想,其目标和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载体是国家富强,主题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内在包含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中国梦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提出的国家战略构想。历史上,中华民族创

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唐、宋、明时的中国,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超欧洲。”^[2]英国历史学家肯尼迪也认为:“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3]然而,近代以来,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国家,这个古老的民族却陷入了百年屈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都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4]从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入侵中国至今,历经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5]中国梦这一战略构想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回顾,对中国当前现实的把握和对中国未来的展望而提出的,它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目标。对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内在包含了大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高度统一。

2. 文化认同与理论认同的统一

中国梦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中国梦的大众认同之关键所在,是对中国梦的思想渊源和实现中国梦的指导思想的认同,是文化认同与理论认同的高度统一。

文化认同是指对一种文化形态的认知、接受并认可。我们所说的“文化认同”是特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41}正因如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要实现物质上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持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理论认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中国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谱系。梦想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梦的实现更是如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向指引,才能推动中国梦的如期实现。

3. 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的统一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正确的道路。“没有正确的道路,再美好的愿景、再伟大的梦想,都不能实现。”^{[4]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6],它因此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制度既是文明的表征,又是道路的体现。中国道路在制度方面的体现,是我们党将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上升为制度创新的成果。在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推进道路创新、理论创新,不断将创新成果制度化、法

制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是中华民族世代的社会理想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梦想相互融合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是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的高度统一。

二、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3}中国梦要实现的不仅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最为根本的是要实现人民幸福;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也是其最终受益者,中国梦是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想。因此,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1. 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一致,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相契合,这就为人民群众广泛认同中国梦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体系。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人民群众已经能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规范、审慎自己的行为;能够自觉地

把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作为自己的最高奋斗目标;能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中国梦的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其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这就为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奋勇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坚定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促进了其对中国梦的认同,进而奠定了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思想基础。

2. 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利益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它是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的梦想。“实现中国梦,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意味着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向上、文明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味着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4]8} 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抓住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构成其为大众所认同的利益基础。

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其将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和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5] 这一伟大梦想所要成就的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的梦想,而是造福全体人民。^{[4]9} 就此而言,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形势下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准确把握,也是中国共产党

人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达肩负的重大责任时指出:“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7]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7] 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最长远利益,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理论和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前提。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大国,要想把13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就可能变成一盘散沙,甚至四分五裂,不仅不可能实现中国梦,甚至会陷入混乱的泥潭和深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根本价值追求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其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这就为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4. 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民族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它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因如此,中国梦之大众认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民族根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追逐民族整体梦想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6]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生活在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8]。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了今天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好局面。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形成和存在的众多民族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统一整体,凝聚成为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梦想,因而具有坚实的民族基础。

三、中国梦之大众认同的实现路径

实现中国梦的大众认同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加强对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梦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认知,进而认可、认同中国梦;另一条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逐步地切实享受到中国梦的成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度。

1. 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认识,增强大众对中国梦的认同

大众对中国梦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其对中国梦的认同程度。中国梦是一个系统的战略思想,其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不仅包括中国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还包括中国梦的实现主体、实现目标、实现方式和实现道路等。普通大众很难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梦的庞大思想体系,只有通过宣传教育,才能让人民大众更加完整准确地了解中国梦,并自觉将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加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一是要注重宣传教育内容的可接受性。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的对象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要提升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效果,就应该采用一些普通群众乐意接受并能够接受的语言和形式,创新中国梦的表达方式,推动中国梦宣传语言的大众化,同时又要避免走向庸俗化倾向。二是要不断创新中国梦的宣传教育途径与方法。例如,可以经常性地开展一些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征文活动,积极宣传中国梦的思想,扩大其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三是要充分发挥报纸杂志和新媒体的宣传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报刊的影响虽已经大不如从前,但对普通居民生活而言,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中国梦的宣传教育不能忽视传统报纸杂志的影响。例如,可以在报纸杂志中专设中国梦的研究专题,广泛宣传中国梦的思想,同时刊登一部分专家学者对中国梦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电视、手机、电脑等现代传播媒介的作用。这些传播媒介,受众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是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总之,提升大众对中国梦的认同,应该加

强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工作。

2. 关注切身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强化大众对中国梦的认同

好的实践效果是提高大众认同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曾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9]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应解决好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强大众对中国梦的获得感,让大众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实现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进而提升大众对中国梦的认同。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影响中国梦大众认同的重要因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82} 中国梦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就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应特别注重改善民生,帮助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个人的梦想。

经济发展状况也是直接影响大众对中国梦广泛认同的现实因素。中国梦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它承载着历史的重托和对未来的憧憬。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不断被冲击,中华民族的梦想一度支离破碎,国人对中国梦的认知和认同渐渐地模糊、弱化,甚至停滞。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作支撑,中国梦就是空中楼阁,中国梦的认同也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在我国,之所以有人缺乏对中国梦的认知和认同,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财富分配不均,不同的人对中国梦的理解、体验和感受不同。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着较为旺盛的发展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对中国梦的大众认同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当前的首

要任务仍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着力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这是增强中国梦说服力的关键之所在。只有经济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民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梦的强大说服力,进而在更高的程度上对实现中国梦形成更广泛认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张立平,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5.
- [3] 保罗·肯尼迪. 大国兴衰:上[M]. 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5.
- [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C].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5] 习近平.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 人民日报,2012-11-30(01).
- [6]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03-18(01).
- [7]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2-11-16(01).
- [8] 习近平.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30(01).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6.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引用格式:冯勇. 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之维[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1):15-2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15-07

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之维

The dimension of the rule of law of the all-out effort to enforce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冯勇

FENG Yong

中共河南省直机关党校,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党内绝非法外之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每一位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不但要遵守国法,还必须接受党规党纪的严格制约。因此,有必要从法治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理念和运行模式。从法治原则讲,全面从严治党应当坚持“严”字当头、规则导向、作风先行和权力制约等原则;从法治主体讲,全面从严治党应当重视和发挥党委、纪委、普通党员和领导干部各法治主体的积极作用;从法治规则讲,全面从严治党应当依法依规,除依据宪法和法律之外,还应当全面完善和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治党规则;从法治路径讲,全面从严治党应当从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手段、弘扬法治精神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依法办事能力、规范党内法规体系、加大法纪执行力度,从而构建从严治党新常态。

关键词:

从严治党;

法治;

党内法规

收稿日期:2017-09-14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72400410324);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1-2017-406)

作者简介:冯勇(1979—),男,河南省许昌市人,中共河南省直机关党校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且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与规范下开展工作,所以,无论是在党章党规中,还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要求。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主线,既是其基本路径与保障力量,又是其实践成果与必然产物。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治,核心在严;治要依据党纪国法,严也绝不能脱离党纪国法。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同时也是执政党自身建设与治理的最优选择。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法治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法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法治的途径解决问题。本文拟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原则、法治主体、法治规则和法治路径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原则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确立基本的法治遵循即根本的法治原则。有了根本的原则引导和基本的准则规范,不但可以为从严治党提供法治依据,还可以为党的建设与治理在法治状态下正常运行提供法治保障,更可以为从严治党的法治化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1. “严”字当头原则

“严”字当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法治原则。思想建党是我党建党方略的重要基础,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习近平总书记说:“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1]由此可见,治党是根本,管党服务于治党,从严治党是对管党治党提出的原则要求。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依据宪法法律至上和依法治国的要求,严格执法是基本的法治原则之一,党的建设也必须遵循这一法治原则。治党必须做到“严”字当头,把严格依法办事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原则,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当代社会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

2. 规则导向原则

指引作用即导向作用是法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法律规范能够引导人们的社会活动趋向合理性。^[2]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规则极其重要,党的生活必须由规则引导,党的行为必须由规则规范。而法律和法则恰恰为这种规范提供了重要的原则指引和制度支撑。所以,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则导向原则不仅仅是法治理念,而且是法治原则,更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固有的和特有的原则。

3. 作风先行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必须根据当下的新形势、新情况,运用新思路、新方法,将党的优良作风发扬、继承下去,使其既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行动指南,又成为党内风清气正的“催化剂”。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良好的党风关乎全局,至关重要。风清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3]要坚决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优良的作风促使党内风清气正,使党继续保持亲民爱民、清正廉洁、高效务实的本色。我国的法律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据法定程序制定的,不但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更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凝聚和升华。因而,无论是法的具体条文还是法的精神内核,都必然要求和保障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关系和良性互动。故此,作风先行原则实际上也契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理念,并赋予法治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

4. 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是现代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原则。从严治

党的首要举措是从严治权和从严治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担负着治国理政的重任。而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具体执行者的党员领导干部手握国家权力,他们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对象,他们能否严以用权、规范用权也检验着从严治党的最终效果。因而,我们必须力行权力制约,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进行全过程、多方位、无死角的监督与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则是始终对党内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故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权力制约原则几乎等同于行政法学上的限制公权原则,而在党内搞权力制约的目的是限制党内权力滥用,规范党内权力运行。

由上可知,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与现代法治理念高度契合,不仅有助于全面完成从严治党这一政治任务,还切实践行和彰显了党的建设的法治实质。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主体

对于任何事业而言,人的因素都至关重要。全面从严治党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达到预设目标,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一批高素质、有觉悟、信法治的主体。

1. 党委主体

全面从严治党从来不是抽象地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通过具体的法治主体去落实和执行,以使从严治党真正有力度、有实效。毫无疑问,各级党委是最有力和最普遍的落实者和践行者。这就需要上至党中央、下至基层党委的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地实施治党方针,担负起主体责任,行使从严治党的法定权力,根据不同层级依法履行对应的法定主体职责,严格按照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具体部署全面落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

2. 纪委主体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各级纪委也是重要的法治主体,其担负着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督等主要法定职责。纪委不仅指各级党组织纪委,也指上级党组织派驻到各级机关、单位的纪检机构,还包括各个机关、单位内部设立的纪检专员,其共同构成了从严治党的纪委主体。

3. 党员主体

党委和纪委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力军,但从严治党只靠党委和纪委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赖广大党员。党员首先要做到独善其身、慎独慎行,主动承担自觉自律的义务,还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监督自己所在的各级党委、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充分体现“从严治党人人有责”的要求。

4. 领导干部主体

领导干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党和政府的权力资源有相当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既是从严治党的对象,又是履行从严治党职责的主要决策人,承担着主体责任。因而,党内一大批党性强、作风硬、具备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既是我们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优质资源,也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法治主体。

由上可知,法治主体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存在和关键要素,充分重视和发挥各类主体在从严治党中的主体作用,不仅有利于实现从严治党在党的建设中的组织净化功能,而且也有利于我党切实落实和更好履行主体责任。法治主体合格与否,既关乎全面从严治党的成败,又是我们客观判断从严治党质量的评价标准。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规则

在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基本方略的背景下,依法治党就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此处的“法”除指适用于整个国家和社

会的宪法法律之外,还包含那些具有规范意义的治党规则,这些规则也是从严治党的合法依据和行为标准。

1.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2012年12月4日,在刚刚接任党的总书记不久,习近平同志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是中共为切实改进作风而迈出的第一步,它并不是治党管党的最高标准,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八项规定”不但是对全党的整体要求,也是制定其他党内规范的法定根据,还是对党员行为的基本要求,因此,必然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的党内法治规则。

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为了及时发现党内存在的违纪问题,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履行自我监督职责,中共中央于2015年8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该条例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主动自我监督、治党管党的规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法治规则的重要构成,为法治权力的运行提供了有力的规则支持。

3.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刑法理念和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其称为“党内的刑法”。它既立足于预防不特定的党组织和党员,又着眼于对已经违纪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责任追求和惩戒。《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具有较为典型的法治性,有助于对违纪违规的党组织和党员“量罪定罪”,从而确保党内规矩不变形、党内纪律不虚设、党内秩序不混乱。

4.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共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原《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客观现实需要。因此,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对原准则进行了修订,2015年10月颁布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一准则将视角从领导干部转向了全体党员,向全党提出了廉洁守法、奉公遵纪的具体规范,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主动践行,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做到廉洁自律。因此,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从总体上而言也属于法治规则的范畴。

5.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共十八大以后,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在此情况之下,20多年前施行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已经无法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有必要对其加以修订。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环境,规范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为全体党员作出示范。2016年10月27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政治性、时代性,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作了系统规定,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长期以来,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等不良现象在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党内监督不力,必然会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而有效的党内监督是永葆我党风清气正的基础性举措,要不断增强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使积极开展监督、主动接受监督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这5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以及相应的监督制度作出了规定,形成了包括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全体党员民主监督等在内的多元一体、上下统一的党内监督体系,为新形势下强化党内监督提供了根本遵循。

7.《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随着我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不断深入,之前制定的与问责相关的规定越来越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不系统、不匹配、操作性差等问题,必须对原有规范进行整合和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6月28日,我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起到了法律规则中“罚则”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向谁问责、谁来问责、问什么责、怎么问责的问题,以问责的形式倒逼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落实,是党内追究责任、进行制裁的准则。该准则突出强调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遵循。

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下,依法依规治党成为常态和必然,也成为具有充分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法治任务。全面从严治党除要依据宪法法律之外,还必须有党内法规作为制度支撑和保障,党规党纪法治化既是政治要求,也是问责操作的技术标准,法治化的党内规则也必然成为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据。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路径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

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除此之外,此次全会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并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这一论断不仅说明了依法从严治党的必要性,而且也指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路径。

1. 强化法治思维,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它将法治的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4]法治思维要求遵循从法律规定到法律知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内在的主观认识过程,也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外在的客观体现。“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从严治党也是一项要素庞杂、结构繁复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必须在强化法治思维、坚守法治精神的基础上有序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法治道路上筚路蓝缕、摸索前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明显提高,法治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还不具备基本的法治思维能力,仍然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因此,为了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治国方略,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必须不断得到加强,法治环境也

必须不断优化。

那么,如何树立法治思维呢?第一,要固守合法性底线。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强调,“任何重大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要求,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与宪法法律相违背。因而,不管是谋划发展思路、规划改革方略,还是实施改革举措、发展社会经济,都要秉持法治思维,遵循法律规则,恪守法定程序。第二,要强化权利义务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因而,在此过程中,必须始终尊重和维公民的基本权利,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同时,要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在行使法律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时,忠实履行义务,勇于承担责任。第三,要树立公平正义思维。无论是进行制度创新还是社会利益调整、公共资源配置,都应当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性要求,力争实现社会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和规则公平。第四,要坚持权力制约理念。防止权力滥用、约束规范权力运行,是法治的核心要义。从严治党必须把重点放在约束和规范公权力上,不断增大监督力度,拓宽监督路径,规范监督方式,公开监督过程,使党和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行使权力。

2. 运用法治手段,规范党内法规体系

长期以来,因为规划、统筹、协调等方面工作的不到位,我们党的党内法规和一些规范性文件存在着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不适应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日益突出的问题,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纲要》指出:“力争经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为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

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这实则是对我们做好党内法规的清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的清理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体制机制,但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这一领域的清理机制仍然不完备。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开展清理工作,对存在问题的要分类处理、结合实际对症下药,该修改的及时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争取使党内法规长期存在的“四不”问题(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得到彻底解决,充分维护党内法规体系的统一协调,实现科学化和一致性。

除了清理党内法规,我们还要努力实现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的有机统一与无缝衔接,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不断从立法技术层面优化和完善党内法规,使其在制度规划、程序制定、内容设计等方面更具科学性、稳定性、合法性,达到与国家立法的协调统一。同时,对于党内法规中的那些直接规范、约束公权力运行的,而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成熟制度,也应当适时启动法定程序,将其升格为国家法律。

3. 弘扬法治精神,加大法纪执行力度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这是法律至上的第一要义。法律至上实质上就是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至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也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法律至上,首先要求执政党应做到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立法机关应及时响应群众呼声和现实需要,制定良法,保证立法水平和立法质量;各级政府应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越位、不缺位,以建成法治政府为努力方向;司法机关应强化监督职责,正确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实施,筑牢“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群众应牢固树立对宪法法律的信仰，善于用法、自觉守律，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弘扬法治精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保证。只有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能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法律法规，确保一切法律法规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才能实现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地位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法律”，维护党规党纪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对广大党员而言，党内的制度规范与法律一样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准则，不管是普通党员还是领导干部，都必须恪守党内法规，绝不能越雷池半步。从组织角度讲，还应加大法纪执行力度。对违反党纪党规的行为，必须动真格、

下重拳，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党内法规的威慑力和严肃性，从而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和从严治党管党的能力。要继续强化纪检工作“高压线”，充分发挥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拓宽信息来源渠道，积极主动地进行检查监督，不仅要事后处理，更要加强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对违规违纪的党员或组织果断追责，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氛围，构建从严治党新常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06-30(01).
- [2] 李步云. 法理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94.
- [3] 许罡. 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读本[M].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5: 114, 142.
- [4] 张立伟. 什么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N]. 学习时报, 2014-03-31(005).



引用格式:阿兰·巴迪欧,[翻译]蓝江.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22-37.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22-16

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begins again

阿兰·巴迪欧¹, [翻译]蓝江²

A. Badiou¹, [Translator] LAN Jiang²

- 1. 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法国 巴黎;
- 2.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通过对阿尔都塞相关文本的研究,发现阿尔都塞勾画出了庸俗马克思主义不同版本(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抹除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阿尔都塞的贡献在于,努力挖掘这一差异,并集中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而通过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之差异的分析发现:事实上,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一门新的学科——辩证唯物主义的开放性领域,可以将辩证唯物主义界定为断裂的形式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前理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革命方向。对此,阿尔都塞未能揭示,因而还需要重新开启辩证唯物主义。

关键词:
阿尔都塞;
萨特;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收稿日期:2017-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6BZX016)

作者简介:阿兰·巴迪欧(1937—),法国哲学家,曾从师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曾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是当代法国左翼思想的旗帜性人物,提出在当下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创立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范畴和观念,其主要代表作有《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元政治学概述》《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

[译者导言] 本文是阿兰·巴迪欧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其旨在基于阿尔都塞文本所揭示的三种庸俗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抹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通过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之差异的分析,重新将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革命方向,进而强调重新开启辩证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在所有同时代的人中,我们与阿尔都塞之间保持着极为复杂也看起来更为粗暴的关系。我不再与之前的他的学生圈子为伍,但我与他的创造和尝试绝不是毫无关系。这篇文章——1967年应《批判》(*Critique*)杂志邀请而写的——将对他的证明,以及对他强烈的兴趣与某种程度的怀疑结合在一起。1968年的“五月风暴”让我坚决地与他决裂,仿佛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争吵,尤其是亲近的人之间的争吵。后来,我站在了萨特一边,萨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对立面(以科学规律来与自由的形而上学相对立),我想将那些让我们彼此决裂的东西放在一边,公正地对待我曾受益于他的东西。

一、基于阿尔都塞文本的问题意识

阿尔都塞的著作与我们的政治局势是相对应的,他指出了当下局势的迫切性所在,由此他

给出关于当下政治局势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在西方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命题中,最可怕的也是其根本上所缺乏的,实际上可以界定为某种理论上的缄默:在人们不说话的地方,完全可以架构出人们所说的东西。事实上,这个空白地带必然会被覆盖,整个论断的链条也会发生扭曲变形,这样覆盖物的能指就可以各就其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活力面临一种非常近似于濒临崩溃的情形,它们或许只能在修正主义的繁华世界里潜伏下来。于是,最好保持缄默,体制里的意识形态官员们渐渐地不得不放弃所有的理论,为的就是在那个时代里在闲聊时能聚在一起,甚至他们会与那些基督教主教会议之后的泛基督教主义的肮脏暗流同流合污,尽管这些暗流可能会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这些被破坏的善,就是某种正常效应的全部结果,马克思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向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巴师夏到萨伊)的过渡时指出了这种效应:将科学概念重新纳入意识形态领域,此前,这些科学概念已经被转化为同样的观念。我们知道,这种操作使用了哲学上的传承,目的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让其发生扭曲变形:一是停留在接近于科学资源的地方,假装用开拓态度来奠基这些概念,将错综复杂的理论话语分解为最基本的明晰性;二是在稍远的目的上,它使用了伪概念的结论,将这些概念纳入到系统的整体研究当

中,在整体中,那些公开的“结论”^{*}被描述为庸俗的泡沫,成为古代的皮影戏式的效果,其中,神灵、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的破烂不堪的错误认识,都在扯动皮影的提线;三是它发明了一个代码,在经验领域中,用来翻译、输出、复制科学的严密性,它不过是对强制地宣称为已知知识的形式化。于是我们有三种“马克思主义”:一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类比的马克思主义。

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仅仅是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反复不停地解释^{**}。这表明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架构以及对马克思的认识对象的独特规定漠不关心,他们所得到的是普通的人类学,关心的是著作中那些暧昧不清的观念。历史学——作为流放和分裂的场域——被理解为明晰性的重临,被理解为在总体的大写的人的创造中最根本的延迟。其随之衍生出来的观念(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有可能彻底地理解这种经验)就是实践和异化的观念^{***},而实践与异化的辩证结合,无意识地重现了那种古老的浑浑噩噩的关于善与恶的催眠曲。

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拔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他们所说的科学概念是对所谓的“辩证规律”的严格应用,比如对质量互变规律的应用。对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他们认为马克思完全囿于恩格斯那脆弱的推理体系之下。他们代之以马克思名义的“自然辩证法”^{****},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乍一看,似乎给出了更为集中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他们关心社会实践的构造和层次,他们很乐意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才是马克思的奠基性范畴。然而,不难看到,他们如此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恰恰是消解了马克思的思想架构。事实上,他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考察,既不是依照一条线性的线索(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表现性的中介(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同构关系:这里的知识是由一整套功能体系来界定的,我们可以在一个层面上看到与另一个层面完全一样的形式组织。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不同层面上有着某种不变的东西,这些层

^{*} 伪概念的结论假惺惺地将科学描述为“真理”的集合,这些“真理”在原则上脱离于它们的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脱离的名义下,黑格尔宣布他对数学知识的挞伐:“数学证明的过程并不属于对象,而是一种外在于物质的活动。”(参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于黑格尔来说,其结论是,科学“将纯粹自我运动还原为纯粹物质,这样,在其中便拥有了一种冷冰冰的、外在的、无生命的内容”。整个当代都在挞伐科学知识的冷漠、外在、封闭,黑格尔则致力于将在总体上僵化的科学对象与科学思想的总体化运动对立起来,最终将其与死亡的形象联系起来,认为没有记忆的科学结论是死气沉沉的。在一篇冒用黑格尔风格而写作的论文中,罗伯特·巴里十分成功地向我们给出了这种论调的经典色彩版——“……阿尔都塞先生试图将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下解放出来,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这不过是让我们还原为甚至倒退到低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且走向了前辩证法的、前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那灰暗而悲凉的天空”(参看其《远远不及马克思主义》,收录于《现代时代》1966年5月号)。这意味着他没有读过巴什拉的作品,并将一种隐含的宗教意识形态永恒化了,这种意识形态不信任科学,认为科学令人无法容忍地将灵魂固化了。但是科学绝非如此:科学是有组织生产其对象,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变革,在变革中,“无物先给定,万物皆构筑”(参看巴什拉的《科学精神的变革》),科学宣称其领域是它生产结论的领域,于是,科学与其表现出来的科学研究计划是一致的。所以,黑格尔对科学结论的批判,与科学的目标无关。恰恰相反,它准备让苦难的经验、让崇高的基督教得以安定下来,而这就是他“批判”的结果。

^{**} 所以,毫不奇怪,阿尔都塞针对青年马克思的谱系学背景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收录在他的《保卫马克思》当中。

^{***} 参看巴里巴尔的文章《伪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意识形态》,他批判了这种错误的概念,收录于《光明》杂志1965年1月号。

^{****} 我们看到罗格·伽罗蒂(Roger Garaudy)以神奇的速度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式的自由,变成了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式的自由。

^{*****} 阿尔都塞曾区分过三种因果关系的概念:笛卡尔式因果关系;莱布尼茨式因果关系;斯宾诺莎式因果关系(参看《读资本论》)。

面在结构上不同于结合了不同要素的平面。类比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同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最粗俗的类比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实为一丘之貉,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严格的机械模式,也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沆瀣一气,在各个层面所谓原则统一的名义下,恢复了精神的明晰性*。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最精致”的形式,用预先给出的但没有严格界定的变换替代了知识对象的问题式架构,这或多或少会导致社会总体性的同构关系的重新出现**。

阿尔都塞的著作首先在于,依照马克思给出的例子,重新勾画出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版本的共同点。在这里,我再一次描绘出这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所没有说出的东西,即他们所抹除的体系。而正是这些体系揭示了他们之间搁置对立而相互统一起来的秘密。

庸俗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效果就是抹除差别,即消解在所有样态的谱系中都起作用的差别。这种被抹杀的差别的表现形式,即它在经验历史中的呈现形式,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老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有一个共性,即它们在唯一答案基础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所有情况下,这个唯一答案都得到了承认。颠倒、对立、现实化等概念,成功地占

据了这个起初由该关系的本质所设定的位置。因为按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现成的辩证法,所有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连续性的明确否定,都会得出其肯定的反思形式。

阿尔都塞的第一篇文本首先是为了挖掘出那个业已被埋葬的差异。恢复这个差异是要证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事业与黑格尔或黑格尔之后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准确来说,是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阐述的***。之所以无法阐述,是因为对其阐述只是用来遮蔽这个差异的态度,这个差异既不是颠倒,也不是冲突,更不是方法上的挪用,而是认识论上的断裂——一个新科学对象的规则体系的出现,这个新科学对象的问题式的内涵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确凿无疑的是,从1850年代开始,马克思就置身事外,而黑格尔哲学的伪对象及其线性形式(辩证法)不可能被颠倒或被批判。原因很简单,我们不会再遭遇它们: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去发现它们,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可能去排斥它们,因为科学空间本身就建立在彻底没有这些东西的基础之上****。反过来说,这种认识论的断裂毫无疑问生产了另一种科学——在这种科学中,认识论告诉我们科学自身是如何分裂的。在科学的发现中,我们可以图绘出这个断裂的边缘,即在一个没有问题

* 卢西安·戈德曼绝大多数近期的著作均是如此,这些著作就是要认识被作者所“发现”的各种同质性结构的纯粹而单纯的同一性:“于是,这两种结构,即主要的小说风格的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结构,等于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结构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反映。”(参看他的《小说社会学》)

** 毫无疑问,最好的例子就是让-皮耶尔·韦尔南的历史心理学。他十分幸运地贯穿了他所有的理论预设。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的《古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的最后一章来理解其中的模糊之处。

*** “人们只会给出那些他们可以解决的任务”,这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各种各样堕落败坏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阿尔都塞曾评论过的经验历史主义(参看《读资本论》),以及各种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蒙昧思辨(在巴什拉之后的认识论中,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在巴什拉那里,理论本身一开始就被思考为一个生产过程,即一种理论实践)的保护层。这个“著名说法”仅仅意味着一个(科学)问题不可能被当成是一个问题被生产出来,除非它所处的空间——就该对象的问题式——本身已经被生产出来了。

****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在伽利略之后的物理学中再没有它的任何踪迹——不可能在那里建构起这种“自然”。准确来说,在新“物理学”和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实证物理学甚至不可能肯定任何亚里士多德对象的存在。对于这些对象,他们无话可说。这种“无话可说”就是巴什拉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

的答案中,意识形态的位置标明了—一个必须要变革的领域*。此外,阿尔都塞十分清晰地判定了马克思的思想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即他不是黑格尔式的思辨:这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并非偶然: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经常提到的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马克思的科学作品《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全新学科(历史科学)的概念,他不仅摒弃了黑格尔的意识形态,也改变了黑格尔的外部,但并非黑格尔领地的外部。这样,相对于黑格尔之后的各种意识形态来说,在成为他者的激进事实中,马克思出现了。

对这一事实的最简单的理论表述——马克思建立了一门新科学——向我们表明,掩饰历史断裂所产生的概念差别,有一个次生效果,即压制。内在于马克思理论规划之中的根本差异,即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历史—经验上的证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另一门学科的差异,在这门学科中,在原则上,有可能宣称它具有科学的科学性。依照另一条或许有问题的传统路径,阿尔都塞将第二门学科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他的文本的第二篇就集中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极为重要,即便它仅仅囿于理论策略之中,阿尔都塞仍然

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区别。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事实上都可以按照抹除这种差别的不同程式来加以说明。

其一,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强制性地辩证唯物主义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事实上,他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变成一种辩证的人类学,其中,历史成了一个奠基性范畴,而不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这样他们就消解了历史概念,让历史概念囊括了总体化环境的民族国家维度,而在这种总体化的环境下,对结构的反思,它们的“内在化”,都是结构自身的中介功能**。

其二,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将历史唯物主义归为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他们将矛盾当成可以应用到任何对象之上的抽象规律,并认为既定生产方式下的结构性矛盾也不过是普遍性规律下的特殊情形而已。在这些前提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对象的构成程序以遭到压制而告终,马克思的结论被整合到一个绝不会践踏规则的宏大体系当中,而他们将任何总体性的假设都归于想象。这是一种神奇的转世,马克思得以转世,因其披着德日进的“宇宙”法袍。

其三,类比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确立了二者间的对应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既定社会

* 这种图绘构成了科学的谱系学。亚历山大·科瓦雷或乔治·康吉莱姆的著作都是这个意义上的谱系学作品。阿尔都塞与米歇尔·福柯所开创的惊天动地的事业(这个事业涉及到一部作品,即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感知的考古学》)之间的区别,展示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信念,即如果科学的谱系学和非科学的考古学是可能的,那么相反,科学的考古学是不可能的。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实践,除了它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系统的根基,没有最基本的基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连贯性的基点都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无意识。在这个差别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解释说:(1)福柯不可能反对他所描绘出来的结构性背景,尽管其具有普遍性,但科学与非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算子,这样他自己必然局限于伪科学的考古学当中。(2)福柯对马克思的判断,停留在前理论的肤浅之上(参看他的《词与物》)。

** 在这里,萨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这一点来看,他的《辩证理性批判》就是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纪念碑。然而,萨特这个理论案例看起来更为复杂,而阿尔都塞很快就给他带上了理性主义唯心论的帽子。在个体实践的原初透明性与结构在形式上的惰性之间,在萨特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偏离,即由自在自我的彻底和反辩证的外在性所产生的偏离:萨特的辩证法是一个破碎的辩证法,其可以部分地反映出某种结构上的扭曲,即便如此,或许会以他的概念有点隐喻式的用法为代价,这有可能提出或至少可以传达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参看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第1卷)。

形态,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客观形式的双重结构。

在这两者中,一项决定另一项——或者,纯粹多余:实际上,这里有三种让差异得以纯粹化的一般程序。不过,正如德里达十分敏锐地看到的,一个被纯粹化的差异不过是一种同一性的失败,所有真正的差异都是不纯的*。保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复杂性,以及将这些属于区分开来而导致的扭曲,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所有这些都同时让我们可以系统地澄清各种不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版本,这并非已经一无是处。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后面我们分别将它们简写为 MH 和 MD)的差别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广泛程度。为了奠基历史科学,这次革命在知识生成(这绝对是一种新哲学的奠基)和构成中加上了如下事实:这种哲学“已经可以让哲学从意识形态阶段过渡到科学学科的阶段”,这样,马克思的作品本身就成为这样一次断裂的双重奠基,或者毋宁说在一次奠基基础上的双重断裂。

清晰地区分 MH 和 MD、(历史)科学和让各门科学具有科学性的科学,意味着采用马克思的尺度,即最终将马克思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它在这种复杂的知识组合中具有双重功能——科学和科学性的哲学——于是,在我们这里,二战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即现象学这种唯心论就崩溃了。

这样,回到阿尔都塞的战略背景下,我们可

以用他自己的理由来贯穿其作品。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重讲故事,也不是让它要么面对既存的理论,要么面对未分化的真实概念,而是依照它所生产出来的元理论概念进行自我反省,作为理论来运作,去看看他的作品是否符合那些规则,这些规则的操作本身就是建构其对象的规律。如果哪里出现了任何空缺,在文本生产出来作为它自身规范的东西与这些规范的文本生产之间出现了差距,那么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去反对这个规划,而是去“缝合”**这个空缺,将这个空缺所导致的问题带入文本。这就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所做的工作,我们自己与之不可须臾分离,这项工作就是其空缺位置的自动复原。

我们或许可以依照分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开创性的差异来前进,这样就将问题变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我们马上可以说,这就是掩饰最根本的东西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掩饰这个差异的不纯性和复杂性。事实上:

(1) MD 和 MH 的差异内在于 MD,这让我们对很多对称关系、对问题的分析处理都变得毫无意义。

(2) 我们在这里真的可以宣布 MH 的理论话语吗?

要么我们十分省略地讲述科学的故事,我们因此就掉进了一个言说的陷阱,而阿尔都塞的著作有一种禁止我们去如此言说的功能。阿

* 参看雅克·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中的文章《残酷戏剧和再现的封闭》。我们能同时用阿尔都塞来读马克思,用拉康来读弗洛伊德,用德里达来读尼采和海德格尔?在我们这些组合中,大标题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实际的整体性上来看这三种话语,我认为答案只能是否定的。更好是这样:走一条不那么清晰的路径,这条路径让三者都最大程度地彼此分离,而这也是每一种话语过程的前提。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概念很快就被商业化,真正的规则就是折中主义。

** 这就是雅克·拉康和雅克-阿兰·米勒提出的著名的“缝合”概念,用来思考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主体的位置替代,参看《分析手册》第 1 期(1966 年 1 月号)。我在文章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仅仅是指示性的。

*** 我一次性地强调一下,我们的研究仅限于对阿尔都塞提出的基本概念的研究,我绝不会假装掩盖这一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开始是一个集体性的工作。它比任何其他工作都更为集体化,这正是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政治使命。

尔都塞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跳过诸多证明的细节,直接跨越到那个虚幻的结论,因为科学对象自带着它的某种绝对明晰性。

要么我们试图分离出 MH 合理性的特殊形式,我们“在哲学反思中‘重新把握’一个基本的哲学发现,一个理性新形式的哲学所产生的发现”^{[1]166}。毫无疑问,我们在谈论 MH;毫无疑问,我们生产了它的话语,而在其话语中,它是沉默不语的前提。但我们开展工作的地方并不是 MH,而是我们可以进行思考的地方;不是 MH 的科学对象(生产方式和变革形式),而是科学性。因此,在定义上,这就是 MD 的领域。

在这里,我们能说明的是, MH 发生在 MD 之中。在这样一个关系中包括了一些困扰我们始终的难题,它们涉及到 MD 本身的理论地位。

(3)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双重断裂的悖论相一致, MD 依赖于 MH,在理论的依赖性上,这依然晦暗不清:不仅是因为 MD 自然不可能生产出“理性的新形式”的概念,除非这样来思考,用阿尔都塞那种玄妙莫测的表达来说,在那些现有的科学那里,有些形式存在于实践状态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相对立, MD 还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史”^{[1]110}。的确,因为唯一的科学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史,哲学就是“知识生产的历史理论”^{[2]70}。这就是为什么说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基础,由于让科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史成为可能,那么也导致了哲学上的革命,即有 MD 主导的哲学革命。

于是,我们看到, MD 与 MH 之间的区别并非确凿无疑。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无本质差异的区别,在原则上,二者是胶合在一起的;二者并不纯粹。 MD 与所有科学尤其是与 MH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会导致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不过,它产生了这种自动化过程,这个倒退,也就是说,用不那么科学

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与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来“丰富”科学,这就是认识论的匮乏,其中科学不断地被这种匮乏所提及。这是因为科学性的知识同时就是让科学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的知识,在科学对象的生产中,除了科学本身之外,科学并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在 MD 之内,我们对阿尔都塞概念的检验,就是通过 MH 的退却的内在性来架构的,即一种停留在自身之中的匮乏形象。

随着分析的渐渐深入,我将围绕两个差异来展开分析:一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二是决定性实践与主导性实践的差异。接着,我将进一步来谈谈话语理论和结构性因果关系理论。

二、科学与意识形态

基于 MD 的定义(这个学科宣布了 MH 的科学性),我们很快就会得出,这个领域的概念就是科学概念。 MD 不可能在一个无法分解的“看”中来展现科学的同一性。这样,首先遇到的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配对。这个专属于 MD 的对象是一个同时衔接和分离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相关差异的体系。

为了以更简单的方式来概括这一配对,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生产知识形式的实践,其生产方式就是(创造)概念。而意识形态是再现体系,其功能是社会实践性的,即它为自己设定了一整套观念体系。科学的特殊效果——知识效果——是通过规范的科学对象的生产来获得的,科学对象在本质上异于既定对象,也不同于真实对象。相反,意识形态所关联的是生活经历,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人类与生存条件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是“在他们与他们的生存条件之间所架构出来的生活关系”^{[3]240}。

意识形态产生一种认识效果而不是知识效果。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这就是相对于我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所出现的前提都是被

再现出来的,而不是被认知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双重化过程,在本质上它与幻想的特殊结构紧密相关*,即便这看起来有些神秘,至少在我们现阶段的知识形式中是这样。至于政治双重化的功能,在于用一种特殊的必然性形式来同时囊括想象和真实,这个形式,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判定,保证了在社会总体各种不同形态“在空缺中”所规定的任务可以得到具体实现。

如果科学是一个变革过程,那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重复过程,因为无意识在那里自我构成。

配对的这两项有一项首先出现,而不是二者同时出现,这一事实意味着——这十分重要——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并非十分明确。这不会让我们立刻弄清楚不同的实践和话语,甚至我们也不太可能抽象地将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说真的,这里的诱惑太过明显。最大的风险就是将这个对立当作一种标准,即将它等同于(意识形态性的)真理和错误的配对。这样,理论上的差异就被还原为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善与恶将它们各自形象的封闭无限性圈子永恒化了。很明显,其社会实践功能让一个主体“恪守本位”,不可能是对知识对象生产的否定。而这正是为何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社会形态,而科学也不可能消解它:“难以相信,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意味着确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在没有生产的社会组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形式下起作用。”^{[3]239}事实上,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

一门新的学科(MD)的开放性领域,它们在其中的自我发展,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个过程。事实上:

(1)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科学。除非我们重复说科学就是它自己对象的科学,这就是纯粹的同义反复,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科学的科学?”只有一个答案,即科学产生了某种对象的知识,而意识形态的某个既定部分表明了该对象的存在。意识形态的观念事实上可以作为指标**,让某种线性关系发挥作用。在规范的复群下,指标关联体系再生产了存在统一体,从而让既定现象(马克思称之为“表象”)合法化。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生产了理论的感受。借助统一的压力想象宣布了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整个体系的功能就是提供一切作为真实而给出的事物的合法化的思考。在这个前提下,很明显,同样代表真实对象的意识形态空间是从内部生产出来的,而科学生产了知识的对象。此外,意识形态生产了知识对象本身的存在指标(而不是它所指示的知识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总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般性向科学的一般性的变革”^{[3]189}。

(2)反过来说,意识形态总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总体化和对存在物规范指标的意识形态的机械论仅仅是为了某一领域而发现(认识),在这个领域中,确立了科学的存在物,也就是说,确定了科学完成其认识架构的真实对象。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形式上将大量的话语指

*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界定一下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中想象对应的地位之间的关联。其风险在于,这个关联或许在一定条件下无法找到(看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法文版)第239页)。康德最近对科学主体的思考,并不会向我们假装说,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主体就是其特有的意识形态观念。

** 这里更好的用词应该是“指称项”,相当于英语中的 designator(参看卡尔纳普的《命名与必然性》)。盎格鲁-撒克逊逻辑经验主义在指称的形式理论和更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符号学上发展,在我看来,为我们提供了意识形态结构分析的框架。很自然,对于卡尔纳普来说,符号学是一种科学理论:这是因为逻辑经验主义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它从系统上澄清了关联描述的一般形式,澄清了再生产的话语,亦即阐明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最抽象的形式。

*** 总体性的概念,在其绝对意义上,就是理论幻想的原型。萨特的总体化是对幻想的幻想主义式批判:一种在意识形态内部的替换过程。

称为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上,它们并无缺憾。但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指称,所以这个评价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性的。唯一被认知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就是对科学的回溯。

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甚至他打算在《资本论》的第4卷中来谈这个问题!),即经济学意识形态,经济学本身可以分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处在断裂边缘”的意识形态)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彻底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中,他所生产的仅仅是一定范围内的科学概念,即那种经济形态下的科学概念,反过来看,他也只能思考这种意识形态。

于是,我们可以衡量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即二者之间有机而动态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MD在这个问题上到达了顶点:如何思考科学对于那些不是科学的东西的关联,同时保留这种差异不纯粹的激进性?如何思考双重关联之间的非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将MD界定为断裂的形式理论。

于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背景下就产生了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一种社会形式下各种形态之间的关联和断裂的所有形式。

三、结构性因果关系

在这里我想尽可能严格地谈论问题,尽管我只能讨论阿尔都塞工作的一个部分。

与所有严格建构的概念一样,这种“社会效果的生产的机械论”^{[2]84}(属于MH的对象)假定一个(看不见的)一般理论。

科学事实上是一个证明的话语,在概念的

连续秩序上,这套话语关系到有着纵向等级秩序的系统联合体。我们可以用语言学的类比来说,在表达过程中,科学对象在一定前提下展现自身,这个表达过程就是理论范式的句法:“在思想总体或体系上的概念的组织结构。”^{[2]87}例如,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证明,在逻辑上属于之前的概念体系(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概念、简单再生产理论等等)。但这种历时性从属关系指向了一个我们发现的更为复杂的共时性集合:(1)一个按照某种结合规律而互相连接的概念体系;(2)形成了一种话语秩序,这套话语十分清楚地揭示了这个体系。

知识效果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将体系中诸概念的联合体与在科学话语中呈现出来的线性秩序之间的差异/统一和“不一致”^{[2]87}作为问题来思考。整个问题在于,二阶秩序绝不可能再现出一阶秩序的轨迹。这并非重复而是其实存,即缺乏体系所决定的实存,这个缺乏的内在性在它自己的实存中并未出现。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体系并没有像(科学)话语的效果那样清晰,其功能所在也正是对让其实存的纵向联合体之不做解释。结果,对科学体系的理论呈现并不属于科学。事实上,MH体系的呈现,这种特殊因果关系的力量展现了其对象的规律,不可能属于MH。阿尔都塞关于支配性结构的最重要的文本^{[3]163-224},即《论〈资本论〉的对象》都不属于MH,而是属于MD。在MD中,这些概念是按照某种历时性顺序展开的,这个顺序与可以指出的最一般的(缺乏的)体系有关联,即MD的体系或理论。

* 庸俗政治经济学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的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资本论》第1卷)这样,意识形态:①重复了直接事物(表象),即客观幻象;②在这种被再现的当下性之中,重新刻画了科学概念本身(详尽说明的材料);③对这个再现(体系)的总体化,并将之视为大真理——意识形态自我指称为科学;④服务于某一阶级的需要。

所以,我们认为,MH 的概念的系统组织是由 MD 生产出来的。这个组织一开始为自己提供了一些原初术语,也就是说,一些不明确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借助它们与系统的公理性关系而变成概念。这些基本观念都聚集在 MD 最一般的概念即实践中。

一般来说,我所谓的实践是从一种既定的原材料变成一种确定产品的过程,在一定的人类劳动的作用下,使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所以,在所有这样的实践中,支配性的因素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劳动转化的要素,在一种特殊的结构下,它让人、手段和使用这些手段的技术方式运转起来^{[1]163-224}。

这些原初观念事实上就是:(1)劳动力;(2)劳动手段;(3)劳动力作用于劳动手段的形式。两种端点——起始点上的原材料,终点上的产品——就是这个过程的界限。

三个术语的特殊组合,从其特有的结构来考察——“在任何情况下,即生产结构”——定义了实践。

这样,构成的第一个集合就是实践的序列。阿尔都塞给出了这个序列,许多部分都是开放的,这个序列中其他比较固定的部分包括经济实践(其局限就是自然和使用产品)、意识形态实践、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

说实践概念是 MD 最一般的概念(最规范的概念组成),等于是说在社会整体中,只有存在是实践的。其他所谓的简单对象都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意识形态的指标。这也意味着这个概念的一般性不属于 MH,而属于 MD。实践并不存在,“没有一般性的实践,只有具体区分的实践”^{[2]73}。我们认为,正如 MH 所阐述的那样,历史只知道一定的实践。

在这个前提下,唯一可以考察的“总体性”完全就是“在一定社会中既存的实践的复杂统一体”^{[1]167},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统一体在其中将不同类型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呢?

首先,我们将关联于所有其他实践的实践称为社会形式的形态*。对于各种形态彼此间差异自主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对它们概念的建构(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谈科学史、宗教史、政治史等)同时就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之中对它们关系和等级的规定。说实话,思考这种奠基性关系和各种形态之间的关联,意味着思考“它们的独立程度以及它们‘相对’自主性的类型”^{[2]74}。一种形态完全是由它与其他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来定义的:存在的是各种形态之间的关联结构。

对于一定的社会来说,在已经确定的空间位置的布局中,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这一形态的概念可以用来思考其他形态的实际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一形态的基础上,对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总体的状态来说,我们合理地在各种形态的实际效力的程度秩序上,贯穿各形态的整个体系。我们将各种形态的体系称为合并形态,这样,可以依照不同效力的动态的等级秩序所刻画出来的轨迹来思考它。合并形态首先是支配性形态的规定,支配性形态的图示确定了对总体理性分析的出发点。

MD 的第一个大问题——这里即 MH 的认识论问题——认为各种形态的集合总是界定了实存的合并形态,换句话说,界定了“与支配性相关的结构统一体的复杂整体”^{[1]208}。

现在,很明显,这个合并形态变化了。我们的意思是说,合并形态是结构化整体的实存形式的概念,而不是其形式的变化。为了从一开

* 《保卫马克思》的文本,没有在传统中踟蹰不前,而是在毛泽东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找到了支撑,阿尔都塞将这种结合起来的实践称为矛盾。我们坚决摒弃这种含糊不清的用法。

始就让我们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假定之中,我们可以承认,如果合并形态的类型是从占据“主要地位”^{[1]219}的形态(即支配性形态)来定义的,那么我们便能够思考所有的形态类型:处于支配地位的合并形态是政治(国家的危机)、意识形态(如18世纪的反宗教斗争)、经济(罢工)、科学(决定性的断裂,如伽利略的物理学),等等。于是,关键在于判定这些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即合并形态效果的生产机制,此外,还包括它与整体的实存效果是否相适应。

我们将这种效果的生产称为决定。明显的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其效果上来定义决定:合并形态中的变化本身与替代支配性形态是一致的。

预先警告一下:无论如何,决定的奥秘不可能在各种形态和各种实践之中,以及与所有其他形态的完整关系下的思考中发现。在诸形态的层次上,只有一种支配性的关联形态。我们相信,一种在整体上规定了合并形态的形态,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将决定(替代支配形态)混淆于支配(一个既定合并形态类型中的各种效果的等级化功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遭到意识形态扭曲的根本原因。在这些扭曲的变形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经济主义,它假定经济总是支配性的,所有的合并形态都是经济的。

我们可以想象,替代支配形态、合并形态发生的相关的扭曲变形,都是一种隐秘的、与再现出总体性的形态不一致的实践—结构出场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社会组成(这一次是一个常量)中的一项,在它自己的复杂形式中彼此相关地实现了两个功能:一是形态功能,关联于等级化的结构整体;二是决定实践的功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它就是“在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1]219},简言之,即在替代支配形态和既定的合并形态中实现的。这种实践,类似于斯宾诺莎的“自然”,同时是架

构的和被架构的。

用比较粗糙的方式来概括是MD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是经济实践(更准确地说,这种实践的界限就是自然和使用产品)。

我们需要注意如下事实,即决定性实践的因果关系的类型完全是原创性的。说实话,作为决定的主要原则,经济实践并不存在:它是在支配性的关联总体中被描绘出来的形象(这就是唯一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形象就是经济形态,它不过是其同名实践的代位项而已。如今,这个代位项本身就是决定中来把握的(取决于经济形态是处于支配地位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取决于由诸形态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其合并形态的发生效力的程度,等等)。于是,经济实践的因果关系就是一个业已结构化的整体中的一种匮乏的因果关系,而某一形态在其中再现了这个结构^{[1]156}。

结构性因果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由一定范围下的结构对该范围下各种现象的决定”^{[1]166},说得更准确些,每一种形态都是它自己的组成形式,即“支配性结构对从属性结构的决定”^{[1]167},于是发现它处在MH所赋予的形式之下:各种形态的组合(预先给定的复杂整体的不平衡的(支配性的)结构^{[3]223})与通过再现实践(其存在不过是它自身的效果)来替代这个整体的决定(复杂过程)之间的离心化的统一。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总结了马克思最特别的科学发现……即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这就是包含在‘实践状态之中’的特殊理论问题”^{[1]167},而这个问题远远未得到解决。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可以(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只是有可能去指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问题的秩序安排会使用一种预

料之外的阅读斯宾诺莎的方式*。无论如何,解决或者至少提出结构性因果关系的问题,就是 MD 的隐秘过程所依赖的东西。

最后,我们必须面对这个计划的主要“空白”,在我们所阐明的层次上(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最初的差异,结构性因果关系的理论)会触及到对文本本身的破坏性效果。我们可以用如下两个问题详细而不失严格地列举出这些“空白”。

(1) MD 自身的理论地位如何?

(2) 能在集合的基础上来界定对自己产生影响的结构吗? 如果不行,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在没有各个位置的“空间”、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通过让各个元素占据某些确定的位置,让各个元素得以结合起来的组合?

MD 地位的问题一定会引出第二个问题,因为它总会让再现的秘密得以呈现。事实上,关键在于了解 MD 是否在一个操作性区分中被再现出来,而这个操作性区分让 MD 成为可能,并组织了它特有的话语方式。MD 是否可以在一种认知实践(这个实践拥有概括功能)的形式架构中来理解**? MD 是不是一门科学? 如果不是,它是不是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谈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犹豫,甚至他经常会认为 MD 是意识形态。事实上,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被应用在哲学上,这里的斜杠(/)标志着断裂,正好可以让我们看到,MD 在其出现的源头处,如今最后宣布并废除了与旧的(意识形态的)知识问题比较接近的镜像关系。

换句话说,支配着整个西方哲学的并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方案,进而包含在实

践、宗教、伦理和政治利益之中,不同于知识实在的方案,这是该问题必须接受的方案^{[2]66}。

我们能给出的 MD 的最好的定义是不是“非意识形态的哲学”? 唯有当哲学与这样的非意识形态(科学)拥有某种内在关系时,这个命名上的附加内容才有意义。

实际上阿尔都塞思考了这个关系,即从“新理论概念的哲学下的生产”思考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在伟大的科学发现中提出这些问题,那么新理论概念的哲学则解决了包含在‘实践领域’中的理论问题。”^{[1]166}对于认识论断裂来说,有一个对应的哲学上的“产品”,它生产了与不同科学之中的实践(不同科学中的操作层面)相关联的理论概念的反思形式和问题形式。所以,这就像柏拉图之于几何学,笛卡尔之于新物理学,莱布尼茨之于微分计算,康德之于牛顿,MD 之于 MH,马克思(哲学家)之于马克思(科学家)。

但阿尔都塞并没有告诉我们以下内容:

(1) 是什么让这个“产品”区别于意识形态对新科学事实的单纯和简单的再现,又是什么让这个“产品”区别于科学概念的散落脱节,导致了科学话语绝对差异的反思上的错误认识? 如果科学和哲学在经验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这个对应关系与如下事实无关,即哲学实际上是在科学之中被细化的,那么在消解了唯一话语(这种话语的具体过程不能化简为意识形态)即科学话语的统一根基下哲学是如何被细化的?

(2) 是什么让再现为哲学的 MD 区别于之前的(哲学的)认识论,并十分清楚地隶属于生

* 参看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 1 卷中的例子。实体的内在因果关系事实上不过是其效果:被生自然的内在一模式运动,能生自然就是被生自然所缺少的决定。然而,上帝实际上(通过其充分观念)是作为样态再现的。在被称为人的结构构造中,决定的代位项可以是支配性的(自由),也可以是非支配性的(奴役):智慧就是一个合并形态。

** 正如阿尔都塞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实践的全部领域,除包括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之外,还包括技术知识和经验知识,或许可以还原为在已知的被再现的形式与内在于社会形式的其他形态中的其他效果之间的过渡性架构。

产、分化、化约科学概念? 阿尔都塞非常清楚意识形态哲学最清晰的形式特征就是那些可以归结为折中主义的东西: 理论上的目的论和自主智力^{[4]53}。如今, MD 是一门“超级”理论学科, 它是为了刻画出所有理论实践的“形式条件”而问世的。于是 MD 必然拥有两种属性: 如果 MD 真的生产了所有理论实践的前提条件^{[4]170}, 那么 MD 必然是自主智能和循环的, 最终(它对立于所有其他科学) 而成为它自己实践的理论*。当一门科学仅仅是这种差异的成熟的行为时, 认识论断裂的一般理论, 即 MD(对立于所有其他科学) 必须能思考自己的断裂, 反思其差异。

我已经说明, 在决定性的实践(经济实践) 与在整体的一种形态“出场”之间, 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扭曲的统一, 即在上帝与关于上帝的充分观念之间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式关系毫无疑问充当了第一“模式”。但在斯宾诺莎这里, 这个问题仍然是其样态的演绎——决定“什么”是被该结构所架构的, 在它的基础上, 定义了这个结构。同样, 我们要说, 它是由诸形态的体系来定义的。

那么就必须要有一门先在的形式学科, 我试图称之为历史集合论, 它至少包含让结构逐渐被构筑起来的内容所赋予的约定。

这门学科, 非常近似于数学集合论的完整发展, 毫无疑问, 它超越了属于关系程序的设定, 或超越了开创性的空集差异体系。事实上,

我们已经看到, 合取必须被看成是各个位置的明确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各种形态彼此间产生关联。从支配的角度来看(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 在任何结构中), 在根本上, 它是位置的分配器和函数的界定符^{[1]157}。这样, 决定概念的完成结构设定了如下的形式算子**。

(1) 集合 P , 位置的集合, 或者关联起来的效果的(空集)空间。

(2) 函数集合 F , 或实践的集合, 它将某些位置分配给函数本身。于是, 这些函数是在 F 集合的某一部分基础上界定的, 它们从集合 P 中取值: 它们分配—占据了某些位置。

在集合 P 中, 由另一函数 f' 来界定的函数 f , 称为“根据函数 f' 的 f 形态”, 或者“ $f-f'$ 的效果差距”。我们尤其可以思考, 如果得到界定(如果在 F 的一部分基础上, f 得到界定, 而这个部分包含 f), 那么这就是根据函数 f 的 f 形态(即 $f(f)$)。这就是 f 的代位形态: f 分配给自己的位置。

F 的子集 H (也是一个实践集合), 如果符合如下两个条件, 可以称之为在历史上可以再现的集合:

(1) 决定条件。例如: 在 H 中存在一个函数 $\det()$, 它是 H 对 P 的一对一的应用, 所以, $\det()$ 在 P 的所有位置上分配了 H 的实践, 尤其是它为自己分配了位置, 即自 P 之中, 它通过形态 $\det(\det)$ 来再现。

(2) 支配条件。支配条件的理论已经是非

* 正如阿尔都塞引用胡塞尔说的话那样: 宣布这个循环与那种寻求出路的循环是不一样的。我会接着说: 将这种循环的循环性命名为“辩证”循环, 并不会遮蔽如下事实, 即这个循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循环。“这种操作所蕴含的循环, 就像所有其他同类循环一样, 就是在理论问题式的基础上, 像追问其本质一样来追问其对象的问题的辩证循环, 它在检验其对象的时候, 也让其对象来检验它自己”^{[2]31}。我完全同意。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情况下, 这个对象什么时候才是知识本身——正是任何可能的科学对象与其问题式之间的关系? 那么追问对象开启了一个其结构绝对是原创性的问题: 问题式的问题。难道我们看不到, 这个特殊的对象, 就像朴素集合论中的某种对象一样, 是一个悖谬的对象? 难道除非借助某些无法判定的陈述, 否则我们便无法来设定它?

** 下面的说明极为简要, 也非常概括。一般来说, 阿尔都塞决定了替代效果所产生的某一形态的“整全”效果, 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 我赋予我自己某种权力, 建立了一种更为完备的理论范例, 将某种排列的排列作为基本函数。这个例子太过专业, 无法在这里展现。我仅仅只是标示出其存在。

常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结构性因果关系的概念,我们是完全在对应的支配类型上获得的。通过例子,我想在这里有意识地强调决定与支配之间的概念上的差异。另外,有一个小的证明,我想留给读者来做,这个证明事实上说明了决定性形态的代位性存在不可能在这里占据支配性的位置。

我们首先要指出, $\det()$ 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让我们可以认为, P 的每一个位置都拥有一个实践(社会形式的完备性)。

已知 H 的函数 h 在 H 中被界定, P 之中有位置 p , 我们可以界定 $h(p)$ 是存在物 $h(h')$, 并有 $\det(h') = p$ 。换句话说, $h(p) = h(\det^{-1}(p))$: 这个函数将占据位置 p 的函数作为其主张。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函数 h 在诸位置上运算,因为通过一个决定项,各函数被分配在各个位置上,而函数 h 就在这些函数上运算:在一个既定的情势中,(在 H 上界定)的函数 h 成了诸位置的同态。

现在将 $\text{dom}()$ 作为在 H 上定义 H 的函数。于是,我们可以通过递推来得到位置 $n - \text{dom}$:

$1 - \text{dom} = \det(\text{dom})$ (由决定项决定的 dom 形态)

.....

$n - \text{dom} = \text{dom}((n - 1) - \text{dom})$ (由上面的 $h(p)$ 定义)

我们看到, dom 首先是自身运算(因为 $2 -$

$\text{dom} = \text{dom}(\text{dom})$), 那么通过 \det , 函数被分配到这个位置上, 在这里 dom 分配了自己, 最终这个函数(总是通过 \det) 占据了它所获得的位置。

如果对于任何位置 p 来说, 都存在一个数 n , 如果符合如下条件, 那么我们可以说 dom 处在支配形态的位置上:

$$n - \text{dom} = p$$

于是, 支配形态复苏了, 它是在实践 h 与决定项(即 $\det(h)$) 之间差距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复苏, 它可以让我们贯穿由各个位置连接起来的秩序(各个形态的等级关系)。

F 的子集 H 是历史上可以再现的, 若它拥有唯一的决定形态和唯一的支配形态, 那么我们便可以说, 它在历史上就被再现了出来。

从这些形式开始, 我们逐渐综合 MH 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或许可以建构出合并形态的概念。在不诉诸数学化的情况下(上面的纲要很明显有很多缺陷), 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确定一个抽象的分隔, 在 MD 中, 这个分隔将实践同关联统一体的概念区分开来, 也就指明了其问题所填充的空缺。

我还要说, 这个架构是不完善的和粗浅的。但首先, 在可以触及到的证据的基础上, 阿尔都塞认为他完全可以在没有这个架构的基础上工作。他的所有努力从一开始就有走向现实化的正确性, 对于一门没有传统的学科来说, 通过新型的范畴论, 数学努力要获得的是: 对结构概

念的直接决定,这个概念忽略了集合的优先在场*。我相信,认识论上的审慎在此时会产生一种经典的形式化结构和规定。任何早熟的超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让MH的基本概念(支配结构、结构的结构、决定)变得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前理论的)观念。在MD中,“纯粹”的在历史上可以再现的集合的元素,似乎对我来说,优先于历史结构的理论。

作为结论,我想强调一下(重新)开启MD的必要性及其风险。

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的合并形态中来思考这种政治上的合并形态,就可以将它归为以阿尔都塞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认识论上的明晰性;相反,我们将其空缺归结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描述的反复咀嚼,在形式主义者和文学的神学家们看来,它在各个方面都丧失了科学的生命力。

对于以阿尔都塞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基于受惠于MH的概念的实际性,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在字面上发现了它,因为从马克思开始,我们就拥有了这种实际性:并没有被忘记,而只是被掩盖、被重述、被压制。由于我并没有对历史科学说过什么,严格来说,我自己已经不限于谈MD的必要性(但不让我们来重读马克思: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读),我在这里

要说的是,在政治实践中,埃迪安尼·巴里巴尔在考察过渡形式时所获得的令人振奋的结论^{[1]277-332}带来了不少益处。

毫无疑问,仍然需要将研究推向政治的维度。我们知道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此,他们已经取得了一项成就,即清晰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定了位置。一旦我们超越了对现象学唯心主义的普通批判,其合并形态就会迫使我们保留——通过新的科学架构——阶级组织的理性主义诉求和革命性的力量,进而思考其所赋予政治实践对我们当前危机给出的出路。

我们拒绝靠近总体性,而这就是康德第一批判所严格确立的东西,从一开始——没有假装去还原或演绎它——就让自己置身于纯粹科学事实之中**。在几个阿尔都塞的论争背后,隐秘地主宰着他的就是超验的辩证法。毫不奇怪,如果将知识的对象与它的生产条件(例如问题式)通过某种方式联系起来,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康德哲学的构建方法。甚至当我们试图逃离经验主义的“圈套”时,这个“圈套”会永无止境地让主体去面对对象,当阿尔都塞谈到“一种机械论,借助知识对象,来获得真实对象的认识”^{[2]71}时,他与模式论(schématisme)已相差无几了:在让概念起作用的结构的实际问题中,也回避了对真实的保证、对真实的“管制”

* 范畴论或许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认识论事件,因为它看到了抽象化最彻底的效果。准确来说,数学结构并不是按照纯多(集合)的元素之间的运算关系来构建的,而是它们成为各种轨迹的网络中的“至高点”,其中,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同质关系)是最原初的关系。在被绘制出来的宇宙中(这就是概念的使用),各种结构的结构,多不再是诸多他者中的结构:我们可以说这是各个集合的范畴或者各个群的范畴,等等。

因为我在谈数学,我必须强调阿尔都塞之中存在着潜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危险,这个运动更多是“有机的”,而不是数学的。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

(1) 数学从属于非数学的概念体系,“数学的形式化必须从属于概念的形式化”^{[1]163}。

(2) 将概念和定义等同起来,“……定义或者概念的地位问题”^{[1]70}。

这让我们有点突兀地返回到将数学作为一种语言的古老的意识形态之中。我们记得,科学的概念必然是一些未定义的词汇,定义无非是引入了一些缩写的符号,结果,概念效果的规范性依赖于它所使用的符号编码的明晰性,即其潜在的数学化,最后,在物理学中,在基础生物学中,数学并不是从属性和表现的,而是原初的和生产性的。

** 重读《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在这里康德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增加了作为类似奇迹的独特之物的指数,这些奇迹主宰着科学“在探索中”兴起,“一个人的快乐的思想所带来的革命”,“心中一道闪电”,等等。科学就是一个纯粹事实,在这个事实下面一无所有。

的问题。知识形式的生产理论就是一种实践上的模式论。阿尔都塞(在他之前还有卡瓦耶斯)所概括出来的概念哲学,十分强烈地将知识结构化领域的展现类同于没有主体的多元超验领域。

最后,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想知道,在我们所认为的阿尔都塞的一定范围内的认识论中所蕴含的康德主义,与统治着阿尔都塞的一般认识论的许多假设的因果关系上的斯宾诺莎主义之间,是否可以兼容。换句话说,即 MD 的统一的问题,甚至是将纯粹的单纯存在作为一门独特的理论学科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我们可以在此意义上谈康德和斯宾诺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压制了如下事实,即在表面上他们二人非常接近:《伦理学》的第 5 卷中被压制的东西,在那里人类共同归属于其最终根基,并在上帝的理智之爱那里得到了恢复;而在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中被压制的东西是,自由开启了一条通往超越诸多现象的道路。有待思考的问题是,这个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的、受到压制的认识论,如何与结构效果的整体理论艰难地衔接起来。或者说阿尔都塞,为了思考马克思,必须在斯宾诺莎之内来理解康德。这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隐喻形象,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判定:在客观上,辩证唯物主义是否(重新)开启了。

参考文献:

- [1] ALTHUSSER Louis. Lire le capital(I) [M].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65.
- [2] ALTHUSSER Louis. Lire le capital(II) [M].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65.
- [3] ALTHUSSER Louis. Pour Marx [M].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1.



引用格式:雷金娜·罗特,张福公. 马克思论技术变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38-54.

中图分类号:A1;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38-17

马克思论技术变革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

Marx on technical change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version of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雷金娜·罗特¹, [翻译]张福公²

R. ROTH¹, [Translator]ZHANG Fugong²

- 1.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MEGA 编辑部, 德国 柏林;
- 2.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组织编辑过程中发现,《资本论》的各个版本中马克思的某些说法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他总是会寻找新的资源方法来解决他在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这已为那些占了他思想遗产的很大一部分的未发表的文献资料所证明。关于技术变革,马克思开始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即工人的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也考察了机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后又考察了机器的发展史,并对技术设备如何运行产生了兴趣;他还将农业纳入考察范围,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现对于土壤栽培和家畜育种的改良作用。此外,他还沉浸在对地质学、化学和数学的广泛研究之中。马克思的这种开放性研究有时也会偏离他最初关注的问题和主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这或许可以从他在1850年代早期和1870年代所做的摘录笔记中看出来。

关键词: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技术变革;
工业化

收稿日期:2017-09-19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606190026)

作者简介:雷金娜·罗特,女,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 MEGA 编辑部成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文稿;张福公(1990—),男,山东省滨州市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约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马克思主义。

[译者导言]雷金娜·罗特(Regina Roth)是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部成员,长期致力于从文献学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编辑和研究工作。本文译自罗特发表于*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10年第5期的*Marx on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Critical Edition*。原文初稿是为2009年4月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召开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ESHET)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文标题略有改动。本文基于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以《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为例,具体展现了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的工作方法。此外,本文通过详细梳理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和零散手稿,揭开了马克思从早期到晚期对工艺学、技术变革和自然科学问题研究的神秘面纱,为我们重新思考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支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1]³⁹⁹1868年8月,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IWMA)撰写的一份决议草案中补充道:“机器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着必要的物质条件。”^[2]这表明,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技术变革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追问这一立场的来源时,我们发现,它是马克思对机器进行长期考察的结果。若要追溯这些来源,我们不能只读马克思公开出版的那些著作,因为它们没有提供可以用来评判马克思工作的广泛基础。众所周知,马克思自己只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1867

年),并在1872年的第2版和1875年的法文版中做了两次修订,而另外两卷的出版工作则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手稿编辑出《资本论》第2卷(1885年)和第3卷(1894年)。因此,若想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的观点,其全部思想遗产——其中也包括大量草稿、摘录和书信等——都必须被考虑进来。

这里,首先我将概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组织与结构,然后介绍马克思的工作方法,最近出版的几卷《全集》(主要包括《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涉及这一问题。事实表明,马克思经常修改他之前写下的东西,因为他总是会寻找新的资源和方法来解决他在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两部分中,我将阐述马克思1840—1870年代的摘录笔记中对技术问题的研究情况,以及这些资料在其手稿中被利用的情况。这里,我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的各种经济理论。而在得出一些结论性的评价之前,我想顺带谈一谈政治,即1868年国际工人协会就“资本家手中的机器的影响”这一主题而展开的讨论。这场争论深受马克思及其技术变革思想的影响。

一、MEGA 中的马克思

相较于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今天我们借助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来考察他的思想发展要容易得多,而这要归功于人们对于马克思著作历史考证版工作的不懈努力。最早的马克思著作考证版是MEGA¹,它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由大卫·梁赞诺夫依托在莫斯科刚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而主持启动的工程。^{*}直到

* 该工程出版了7卷的著作、草稿和文章(1844—1848年12月)和4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1844—1883年),MEGA¹中有一卷没有进行编号,后来又出版了两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5年]和马克思的《大纲》[1939—1941年]),原计划编辑出版42卷。

1960年代,这项工程才分别在苏共中央领导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支持下得以恢复。拥有大部分原始手稿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同意与他们合作。1972年,他们试编的一份样卷得到来自不同编辑项目的国际编辑者们的一致认可。1975年,MEGA²第1卷问世。1989年之后,由于需要制定一种新的制度基础来推进编辑项目的实施,于是,5个研究机构共同创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它们分别是柏林-勃兰登堡自然和人文科学院、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和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院*。这些政治独立的机构在学术上对这个项目负责,它最初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主管,自2000年以来由柏林-勃兰登堡自然和人文科学院主管。现在,该科学院负责编辑工作的实施,并协调来自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丹麦、美国和日本的几支研究团队的工作。

若要回到这些材料,只有借助这些版本。譬如,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首次出版问世的《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大纲》。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MEGA继续出版着那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即所谓的MEGA²。在这个版本中,全部资料被划分为4个部分:第4部分是全新的,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和旁注,其中大部分皆是首次出版,它们将在马克思的思想、概念或主题的来源与形成方面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第3部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同其他约2000余人的通信,即马克思恩格斯收到的所有通信——其中大部分也是第1次出版;第1部分包括除《资本论》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

作、草稿和文章,从中也可以发现新信息,尤其是有关他们新闻工作的信息,比过去我们知道的多得多的文章已被证明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之手,而且,这个版本也将会把已出版的资料置于新的语境之中,因为它详细考察了这些文本的创作背景,譬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4]。

在MEGA²第2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中将会看到最多新收录的资料。只有MEGA出版了所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既包括关于单个问题的草稿或专题论文,也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新发现的资料包括《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除《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之外),或者马克思在1863年到1883年去世前这段时间内为写《资本论》而准备的全部手稿:一是为《资本论》第2卷而作的远超过12本(500页左右)的手稿(1864—1881年);二是为《资本论》第3卷而作的大约10本(800页左右)的手稿(1864—1877/1878年);三是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而作的从1883年至1894年恩格斯在准备这两卷本的付梓过程中写下的各种手稿,总数超过100页。而且,MEGA²也出版了那些不易搜集的文本,譬如,直到1875年马克思亲自出版的几个版本的《资本论》第1卷。MEGA²中的一些《资本论》前期手稿已经成为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ECW)的文本依据,譬如,全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4年写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MEGA²和MECW中的经济学手稿与印刷版见表1。

二、马克思:一位“修订大师”和收藏家

下面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为撰写《资

* 俄罗斯独立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院于1990年代末解散。

表1 在MEGA²第2部分和MECW中的经济学手稿与印刷版

文献资料类别	文献资料完成时间	MEGA ² 印刷版位置	MECW印刷版位置
经济学手稿	《大纲》	1857—1858	MEGA ² II/1
	《1861—1863年手稿》	1861—1863	MEGA ² II/3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	MEGA ² II/2
《资本论》第1卷		1863—1864	MEGA ² II/4.1
	手稿资料	1871—1872	MEGA ² II/6
		1877	MEGA ² II/8
		1867, 1872	MEGA ² II/5-8
	印刷版	1872—1875, 1883, 1890	MEGA ² II/10
		1887	MEGA ² II/9
《资本论》第2卷		1865	MEGA ² II/4.1
	手稿资料	1867—1868	MEGA ² II/4.3
		1868—1881	MEGA ² II/11
		1884—1885	MEGA ² II/12
	印刷版	1885, 1893	MEGA ² II/13
《资本论》第3卷		1864—1865	MEGA ² II/4.2
	手稿资料	1867—1868	MEGA ² II/4.3
		1871—1881	MEGA ² II/14
	印刷版	1894	MEGA ² II/15

本论》第2卷而准备的大量草稿^[4]。首先,这些草稿表明马克思从未对自己写下的东西感到满意过:他一开始就为第1章写了5份草稿,围绕同一主题又写了4个片段,其中每个片段在内容上都有很大变化。他尝试用文字、数值举例、变量和数字等几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譬如,在社会资本层面创造生产资料过程中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替换问题。为了考察资本的周转条件,马克思提出不同的模型来推导随着时间变化而可能出现的各种资本周转模式。为此,他罗列了22张表格来描述这种周转在不同工作和流通阶段的发展状况。^{*} 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常常纠结于究竟应该用哪些概念和术语来表述他的许多范畴,有时,他似乎是在用它们

做实验。譬如,在某一手稿中,马克思在表述“流动资本”时用的是“flüssiges Kapital”(流动资本)或“Betriebskapital”(经营资本),而不是“circulating capital”(流通资本)^{**}。同时,“circulating capital”这一术语也是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的:作为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不断变化形式的资本的高级概念,作为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概念,或者是作为重农学派所说的“avances annuelles”(年预付)^{***}。

与分析很多问题不同,马克思在分析扩大再生产问题时写过一份单独的草稿。这一草稿是在马克思的最后一份手稿(上面标有“1877—1881年”)中发现的。^{[5]790-825} 在这里,马克思还写了多个纲要来考察在再生产和流通

* 在其中一种模型中,马克思将两种模型混合在了一起。恩格斯试图通过减少这些表格的数字来简化这种呈现,但是他对的版本也不完全满意,并在后来的版本中做了批判。

** 出自马克思的1867—1868年手稿,参见 IISH, Marx-Engels Collection, A 76:56。

*** 恩格斯决定使用另一术语即“流通资本”来表达这一高级概念,参见 Marx[1885]. MEGA² II/13, 2008a:516-518。这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再生产模式的方法,参见 Mori K. (2009)的 *Six-sector Model of Production and Monetary Circuit: Making sense of Marx's Original Reproduction Schemata* (该文初稿是为2009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召开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ESH-ET)会议提交的会议论文)。

过程中不同部门的发展情况。有时他会发现诸多他想要解决的新问题^{[5]790-825,873-881},有时,他似乎因计算错误而感到气馁,并随之放弃研究这个主题。从他的这份手稿的重要部分中,我们也会看到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假设和数值举例,并试图描述一种积累过程。在他的手稿中——至少在那些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手稿中——经常会看到,马克思——不像现代经济学家那样——不会对他的数值举例的前提做出明确说明。而这或许是在他的很多举例和非连续统一的著作中存在较多错误的一个原因。^{[5]810-814}只有恩格斯看出这些图表可以被较容易地改正——他在1885年的印刷版中就做了这项工作,但他既没有提及原来的错误,也没有说明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的假设或结论,他只是在例子的结尾指出总资本和总剩余价值都增长了。不过,从恩格斯所举的例子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马克思称作思考均衡增长问题的先驱。^{[6]474-477,543-54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77页的最后手稿很难称得上是为出版而写的一份草稿,更多的是一些在被遗忘之前写下来的思想观点的汇编。这个文本结构混乱,它的第一个标题“第三章(第二册)[Ch[apter] III(b[ook] II)]”可能是后来被补加上的。^{[5]698,1609}马克思经常用长横线而非标题来划分他的各种思想。其他两个标题是以“anticipated(预先)……”开头的,这表明马克思是想将这些部分添加到其他草稿中的,而那些草稿或者已经写好,或者尚未动笔。这个文本的前1/4是马克思在1877—1878年看到欧根·杜林的著作并支持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时写的。但对于马克思是何时续写了这一手稿的剩余部分,目前还不十分清楚。^{[5]1610}

如果将《资本论》第2卷的所有准备草稿和资料放在一起考虑,它们就呈现出这样几个主题:一是细化对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其中包

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危机主题;二是考察不变资本在创造生产资料过程中是如何被代替的;三是思考货币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些手稿中没有一份可以恰好用作《资本论》第2卷的草稿,这对于在马克思死后整理这些手稿的恩格斯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资本论》第3卷的准备材料更是支离破碎。现存的一份关于整册书的草稿上只标有“1864—1865年”,并存在严重的缺陷和断裂^[7]。马克思是在纸上进行思考的。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在检验过程中发现了其他与他之前(比如在一段或一章的开头)的假设或想法相对立的证据或材料时,他就会对它们进行修改。譬如,在第5章中,马克思一开始提出一个有关信贷和虚拟资本的观点,并表明将避免分析信贷制度的真实运动及其产生的各种工具。然而,在接下来的许多页中,他收集了很多与信贷制度相关的材料,其中包括大量只是作为观点和事实的汇总而尚未详细阐述的摘录。^{[8]469,431,853}随后,马克思多次指出第5章应该就是信贷章。^[9]而且,他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指出,信贷已经发展为一种促使资本集中化的庞大社会机器,并在随后的一份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信贷来促进发展。^{[5]335;[10-11]}这些事实使后来的恩格斯确信需要改变马克思手稿中的判断,因为这种详细分析在他的工作计划之外。^{[12]389}在其他地方,马克思也改变过自己的计划。譬如,在1864—1865年关于《资本论》的草稿中就包含一个篇幅很长的地租章,马克思没有使它单独成册^[13],或者将它用在自己的手稿中作为“对价值和生产价格之差异的说明”^{[13]1861}。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对于世界市场和股份资本的研究。1858年,马克思还设想在不同的著作中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正如福尔格拉夫所说,马克思后来就想着把它们——至少是有关这些问题

的不同思考——纳入《资本论》中,因为他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来单独著书分别论述它们了。^[11]而且,就像在其他手稿中一样,马克思写下了大量想法、评论甚至书目材料,而不管它们是否适合他正在思考的主题。马克思用横线或方框将它们与上下文区分开来。

《资本论》第3卷晚期手稿的绝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在探究从第1章开始就有所涉及的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关注的是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从价值水平范畴向价格水平范畴的转化;二是决定利润率变动的规律。为此,马克思为《资本论》第3卷的开头部分写了至少4个草稿,而且还满怀热情地研究了利润率变动和决定这一变动的主要因素。工资、工作日长短或劳动强度的变化很重要,就像技术进步及其对不变资本的数量和价格的影响很重要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大量例子进行计算,即把一个或多个决定性因素——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总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利润率或资本周转——保持不变而改变其他因素来探讨这些变化。1864—1865年,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地租的分析。马克思重新整理了这一章的内容并做了笔记,以便梳理出一个更详细的结构,同时对“剩余价值向地租的转化”部分做个总结。^{[8]816-817}第三个主题是关于信用、利息、货币和资本的分析,如上所述,它在很多方面仍是开放性的。而手稿的这种状况正是恩格斯花了10年才完成编辑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详述马克思《资本论》3卷的特殊手稿资料,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马克思是一个“修订大师”。这可以由马克思的几处声明来加以确证。譬如,当他说这次最后修改仍然有待决

定哪些内容应保留下来正式发表,而哪些内容应被省略^{[8]83},或者当他1866年初告诉恩格斯他的《资本论》3卷手稿已经完成时,他却再次食言了。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出版这一手稿。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相较于其他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这不仅包括上述提到的手稿,而且包括其他类型的书面材料。如果我们看一下MEGA收录的这些资料,会发现几个不同层面的交流范例: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的手稿,它见证了作者与自己 and 潜在读者之间的交流;第二个层面是马克思的书信,它向我们展示了作者与周围人的交谈内容;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对话,其占据了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很大一部分,包括他的摘录笔记、阅读书籍和新闻剪报收集。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而这也就为恩格斯留下了阐释的余地。在对马克思手稿进行编辑的过程中,恩格斯重新组织和校对了一些段落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对马克思留下的草稿和恩格斯编辑的印刷版*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有很多差异,有时候,这种差异表明:在作为作者的马克思和作为编者的恩格斯之间,存在关注点上的变化。

在《资本论》第3卷第3章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种转变的一些迹象,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关于技术变革的讨论(参见本文第5部分)。首先,正是恩格斯编排了这一章的结构——马克思留下了40页的手写稿,其中只有很少线索适用于这样一种编排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在马克思

* 现在,利用MEGA所收录的马克思留下的所有草稿、论文、笔记和恩格斯编制的印刷版来进行这种比较,就容易得多了。首先我们拥有所有文本,其次我们可以用几种方法来进行比较,特别是罗列确定各印刷版中诸多段落的来源,比较标题和结构,或者列出恩格斯的增加部分,以及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

对几段文字做了编号或者强调它们的开头时,才算是提供了些许线索。譬如,关于6种“对抗作用”^{[8]301-309}的文段,还是恩格斯将马克思的这一文本看作是对“内在矛盾规律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一般性思考”,并选择以“这一过程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快速瓦解”结束了他的论述。^{[12]243,1077-1078;[8]315;[14]360}顺便提一下,这一表述在《资本论》第3卷中只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瓦解”这一术语时才使用过。“瓦解”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崩溃(collapse)”^{*}很少被使用。如果使用它们,也是与价格或信贷联系在一起。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很多文段加上了方框,以表明其中涉及的内容或讨论观点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在其中一处,马克思考察的是在何种条件下利润率会保持不变甚至会提高。马克思对于这种条件的可能性缄口不言,判定它们只是抽象的可能性,但没有明确排除这种可能性。^{[8]319}恩格斯在印刷版中插入了这样一句话:“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利润率会下降。”^{[12]227}

最后,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对资本构成的影响这一段文字做了修改,并将它作为第3章的一个“补充性评论”。在增补部分中,恩格斯指出并不是每一种发明都是一种创新。^[15]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结论:一个资本家如果不使用节约劳动的机器,那么他就没有履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即“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逐渐变得衰老,而且已经越来越超出它的时代”^{[12]258-259}。但马克思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这样的明确判断,至

少在《资本论》中没有这种观点。

在其他地方,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看作“一种真实的趋势”,并强调将这一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非常重要。^{[8]286,288,467}而且,后来,在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将这一趋势确认为“超越一切过去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之一”。但是,手稿和印刷版之间的这些差异表明,马克思非常注重保持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平衡,从而总是不能决定自己更倾向哪一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确考虑过“对抗作用”和利润率不变或增长的情况。而这在他后来讨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问题的手稿中也得到了证实。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情况是否仅限于某一工业领域,也没有说明哪种情况从长远来看会成为普遍趋势。^{**}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没有明确排除这些情况,从而使问题始终保持着开放性。正如上述所言,这种平衡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的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譬如,在信贷或地租问题上,马克思尝试用了不同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因此,马克思似乎对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合法性还存有疑虑,当然这一点目前还尚未最终确证。同时,恩格斯更倾向于给出明确的表述,因此,他有时候似乎并不回避使马克思的表述尖锐化,只要它们符合他所理解的“作者的精神”。^{[6]8,[11]27-29}

森贤治(Kenji Mori)注意到另一个有关马克思进行仔细考察分析的方式的例子,而它也只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而不是恩格斯所呈现的印刷版中才能看到。在《资本论》第2卷阐述再生产过程问题的手稿II中,马克思发展了一

* 这里,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在手稿中不常用的术语:“zum Klappen bringen”,可译为“being folded”(被推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瓦解”这一术语是恩格斯的一种表述。

** 参见1875年马克思在最后一份手稿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见Marx and Engels[1871—1895]. MEGA² II/14, 2003:29, 124-125)。在之前的一份手稿中,马克思在标题为“利润率的一般规律”的段落中讨论了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结果(参见Marx 1867—1868. IISH, Marx-Engel Collection, A 71:15-16, 19-20)。

种非常详细的再生产模式,其中包含的不是两个部类,而是6个部类。这一模式讨论了产品在各个部类之间的转换,货币对于这些转换的必要性,剩余价值在不同部类中的实现方式,以及不同部类之间保持平衡的条件。马克思也追问了这些过程在利润率达到均衡之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而在写了几行之后,他就中断了写作,想把这一问题留待以后再作考察,但最终却没有机会来完成。^{[5]495;[6]540-543;[16]}

三、马克思的工艺学摘录笔记

马克思很早就对技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早在1845年,他就已经在阿道夫·布朗基《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第2版,1842年)一书的启发下研究了安德鲁·尤尔和查理·拜比吉的法文版著作。^{[17]8,10;[18]LXXXII-LXXXIII}马克思在6个笔记本的其中一个里面写满了有关“机器问题”的摘录,这是当时备受关注的—个问题。不过,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忽视了尤尔和拜比吉提出的大多数真正的技术问题,譬如,关于机器和工具的差异的讨论或者关于分工的详细考察。相反,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机器对于价格、成本、出口或生产过剩造成了什么影响?其次,他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问题:机器对工人造成了什么影响?^{[18]LXXXIV;[19]20-21}在1845年2月与出版商卡尔·列斯凯签订《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合同之后不久,马克思就决定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将几本围绕贫困问题来研究工业化的社会影响的著作包括进来。^{[17]457-458}马克思考察了机器问题和工厂制度,特别是认识到了机器对工人的失业、工作日的延长和工作强度增加的影响。1847年,马克思在反驳蒲鲁东的观点时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

摘录*,同时附上了几段对尤尔著作的摘录。^{[20];[18]CXXII-CXXIII}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既没有打算详细地考察技术问题,也没有打算在《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单列几章来考察这些问题。相反,他可能只是想在与之相关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中来讨论它们。

1850—1851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侨居伦敦。他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开始了广泛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但又远远超出这一领域。马克思在1851年10月1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对涉及文化史、女性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社会状况与影响、工艺学、工艺学史以及农学^[21]等方面的著作做了大量摘录。正如在1845年所做的那样,马克思是在阿道夫·布朗基、安德鲁·尤尔^{[17]460,540}和约翰·贝克曼对工艺学理解的意义上使用“工艺学”这一术语的。马克思在其中一个笔记本中写道,贝克曼第一个使用“工艺学”这一术语来表示力学、物理学、化学与手工艺之间的联系。马克思随后作了补充,认为这应该就是“生产”。^{[22]50;[13]1932}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中,当马克思在论述我们今天在德语语境中所说的属于“技术”方面的内容时,他也是使用的“工艺学”^{[19]20;[22]x}。而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中,正如MEGA² II/6的编者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经常用“技术”来代替“工艺学”,同样以形容词“技术的”来代替“工艺学的”。**当然,马克思也经常使用其他术语来讨论技术过程、工具或工序,譬如,机器、机构或劳动工具。而技术变革则通常被他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因素而被讨论。^[23]

即使在1851年秋,马克思还在跟几个德国出版商联系商量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其中前

* 实际上,马克思在1845年的《评李斯特》中就已经利用了他对尤尔的摘录。

** 顺便提一下,在第23章的开头,马克思也用“构成”取代了“资本的技术构成”这个多少有些模糊的概念。

两卷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第3卷是研究社会主义的,第4卷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些计划是与上述提到的马克思的大量研究相一致的。一方面,这些研究涵盖了德国的“工艺学”文献,其中主要是J. H. M. 波佩的著作,也包括约翰·贝克曼的著作和由卡尔·卡玛什与弗里德里希·黑林翻译的安德鲁·尤尔的《工艺学、制造业和矿业辞典》的德文版。在摘录中,马克思集中研究了自中世纪以来的技术发明史。同时,马克思对许多技术细节问题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主要包括磨坊、钟表和蒸汽机^{[22]LVseqq, LXX-LXXI}。另一方面,这些摘录笔记也包括J. V. 李比希和J. F. W. 约翰斯顿研究农业化学、地质学和它们在农业中的实际应用的著作。与早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摘录相反,比如,与1844年所做的经济学笔记相比^{[17]472, [24]},此时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摘录表现出某种中立的态度。他保留了原著作的篇章结构,忠实地记录了原作者的观点,而没有任何评论或批评。^{[22]LXXIX-LXXX; [18]XCH seqq, CVseqq}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马克思的主要兴趣似乎是获得这些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我们发现,马克思详细摘录了大量关于各种物质的分解和分离工序的内容,而且可能并不是为了在后来的手稿中加以利用。同样地,在马克思对李比希和约翰斯顿的摘录中也有许多关于化学过程和地质过程的细致描述。这就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摘录主要是纯粹出于对技术细节问题的真正兴趣。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使这些摘录会被用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哪些地方和如何利用保持了开放性。^{[22]LVIseqq; [25]172seqq, 276seqq, 327seqq}

而且,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考察纺织

工业时继续研究了机器对工人的各种影响。彼得·加斯克尔在《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中描述了劳动人民的状况,他使马克思注意到纺纱机的采用最初会提高对劳动的需求,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工人被机器所代替。约翰·菲尔登就在《工厂制度的祸害》中描述了工厂对童工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他们所遭受的虐待。^{[26]277-278, 286seqq; [25]104seqq, 43seqq}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探寻产业革命为什么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米勒认为,马克思在1851年对德国工艺学的摘录中没有找到令其满意的答案,马克思无论是对技术过程的研究,还是对发明史的研究都没有获得令其本人满意的结果。^{[22]CI seqq}

1856年,马克思又重新回到对机器的研究。他开始计划把有关货币、信贷和危机的材料从摘录中整理出来集中在一起。同时,他也对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和波佩的《工艺学史》中有关金币的物理特性的内容做了一些摘录。^{[22]169, LXXXV}而在此之前的几页中,马克思也重温了他在1850年对另外两本有关铸币问题的著作所做的摘录。^[23]在《大纲》中,马克思多少利用了这些摘录,尽管不是系统地利用,但对机器和工艺学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评论。**

1860年代初期,马克思开始对机器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展开系统思考。马克思按照不同的主题把先前摘录的引文整理到一个笔记本中,并命名为“引文笔记本”。他给关于机器的摘录加了两个标题,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18]95seqq, CXXVII-CXXVIII},第二个是“机器”^{[26]329seqq}。首先,马克思将1851年笔记本中拜比吉的4段引文与亚当·斯密的一些引文放在一起,并按自

* 最终,这些努力还是在1852年失败了。同样地,他尝试为由布罗克豪斯主编的系列文集《现代》至少写一篇介绍英国政治经济学现代著作(1830—1852)的文章的计划也没有完成。

** 马克思从早期笔记中引用了关于尤尔(MEGA² II/1, S. 569, 570)和拜比吉(MEGA² II/1, S. 257, 291, 480, 569, 597)的摘录,从《伦敦笔记》中引用了关于波佩(MEGA² II/1, S. 718)和加斯克尔(MEGA² II/1, S. 478, 697)的摘录。

己的理解将它们归纳为分工和机器的本质。^{[18]CXXXVII-CXXXVIII}其次,他将涉及机器的社会影响的引文集中在一起,其中的大多数文献表明机器将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并通过增加换班或加班来延长工作日。接着,马克思再次注意到彼得·加斯克尔所描述的机器的经济社会影响。而这次,马克思写了一篇有关纺纱厂的兴建带动了织造业发展的文章,并以此论证机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因素。正如米勒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其他文本语境中既没有坚持这一观点,也没有否定这一观点。而在后来的手稿中,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没有再用上述文章,但只是利用了其他作者的引文。^{[26]308 seqq,331 seqq}

同时,马克思在一个笔记本中对许多书做了新的摘录,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标题。^{*} 马克思在此之前已经读过其中的一些书。以拜比吉为例,这次马克思读的是他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英文第1版。这些摘录看起来像是在整理完“引文笔记”的相关内容之后写下的。马克思再次注意到拜比吉对机器的3个组成部分的区分,并且摘录中包含了此前笔记中没有考虑的各种主题。^{**}

1860年代早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思考“技术变革的作用”这一问题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一主题的存在,也注意到了它的潜在影响,但是,他只是在与之相关的“纯粹”经济学问题中加以考虑。但随着他对技术变革和一般技术过程的兴趣剧增,他迫切想要解决有关机器、工厂、现代工业和工业革命的问题。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相对剩余价值,并在这一语境中更细致地对技术

问题做了思考。在1863年1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论了“有关机器的一节”。马克思说,他重读了1851年的摘录笔记,并对手稿做了大量利用,其摘录笔记中的大多数标记都是这一时期做的。^{[18]CXXVI-CXXVII;[22]LXXXVII seqq} 马克思借鉴了拜比吉有关技术创新成本^{[13]305-306,1681,1867}的观点,以及“作为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因素的机器发展的条件”^{[13]1914}的观点。马克思从拜比吉的机器定义即机器是由一个中心动力推动的几种简单工具的集合开始,在探寻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对机器如何从中世纪以来的纺织业和其他工业中发展而来做了一个历史性考察,并专门引用了波佩^{***}的材料^{[13]1915,1918-1925,1928-1935,1940}。

为了详细阐明机器发明和发展的各种条件,马克思又发现了有关机器的技术原理的新资料。于是,他再次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对《各国的工业》第2卷做了大量笔记。这是一本对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所展示的各种机器的汇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是由著名的发明家和机械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撰写的。另一资源是来自罗伯特·韦利斯,他是一名发明家、机械工程教授和应用力学教育领域的核心人物。马克思旁听过韦利斯在伦敦杰明街政府矿业学院给工人开设的课程。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制造业工艺学这一个对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机械分支。正如保利尼所说的,经过这些研究,马克思对机器工艺学的本质获得了卓越的洞见。^{[19]23seqq} 当然,这些研究也显示出马克思对技术过程、工具和工序的真

* 参见 IISH, Marx-Engels Collection, B 91 A 这个笔记本上标有“Hefte VII”(笔记本七),因为马克思在它的前63页上写下了共占7个笔记本的《大纲》的最后一部分(IISH, the Marx-Engels Collection, A 49)。

** 参见 IISH, Marx-Engels Collection, B 91 A:184-185 和温克尔曼(1982:101seqq, CXXVIII-CXXVIII),马克思没有用1835年出版的该书的第4版,马克思在1845年读的该书的法文版是从1833年的英文第3版翻译而来的。

*** 马克思主要是利用了波佩的《工艺学史》,而没有使用他在1850年代就已经读过的波佩的其他著述。

**** 内史密斯也对1841年出版的《浅谈滑动原理导论》中的他和其他人的发现做了改进。

正兴趣。^[13]1935-1949,1979-1988 后来在 1863 年春,马克思重新阅读了约翰·贝克曼的那部阐述中世纪以来的发明史的 5 卷本论文集,而且比 1851 年要更加广泛深入。*

在他的《补充笔记本》——这是 1863 年春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准备材料做了大量新的摘录所形成的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也花很多时间关注了另一个主题:农业化学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在《补充笔记本 D》中,马克思首次对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于 1856 年出版的《农业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做了摘录**。在随后的 1865—1866 年,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 3 卷第 1 稿——特别是阐述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的第 6 章——时做了一本厚厚的笔记,结果,有关地租的这一部分“就几乎构成一本书”^[28]。在这些有关不同国家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摘录中——其中很多内容都被用在了第 6 章中——大约有 100 页专门是对李比希的摘录。马克思对农耕方法和谷物产量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特别是现代土壤施肥方式与旧式耕作方法(比如轮作或排水)在效果与成本上的差异,以及李比希关于人口供养的思考等问题。*** 1866 年 2 月 13 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李比希和其他化学家的最新著作对于解决地租问题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

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用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机器和现代工业”。马克思在过去 20 年中所做的大量研究在这里留下

了痕迹,那便是他对查理·拜比吉和安德鲁·尤尔的著述所做的摘录。当然,为了证明机器对工人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也参考了更多最新的资料,主要是议会调查报告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18]LXXXIX seqq,CVI,CXXXVI seqq 在《资本论》第 1 卷于 1867 年出版之后,马克思继续对农业改良问题做详细研究,并阅读了卡尔·弗腊斯的几本书****。在其中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中,他证明了一般耕作的破坏性影响,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29]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在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的政治事业和继续从事《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的整理工作的同时,马克思还开启了一个涉猎广泛、内容丰富的新的研究阶段。其中很多内容都源自于上述提到的在《资本论》中仍留有开放性的诸多空隙和问题。货币、信贷和银行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地租和地产亦是如此。马克思也深入研究了自然科学问题,尤其是生理学、化学、地质学和数学等。这些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是他以前所做的大量摘录,小部分是他读过的书目和以往的岁月积淀。我们之所以知道马克思阅读过这些书,也是因为他多封通信中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列出的

* 这些摘录可以在所谓的《补充笔记本 D》中找到(Mueller 1994)。马克思注意到工人被早期机器取代的几个事例,以及在早期时代和社会中磨坊的改进细节。

** 参见 IISH, Marx-Engels Collection, B 93:37-40。

*** 1862 年,马克思读了李比希的《农耕的自然规律导论》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参见 IISH, Marx-Engels Collection, B 106:29-135。

**** 参见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3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我想从肖莱马(Schorlemmer)那里了解一下最新最好的农业化学方面的德文著作……为了写地租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进展有所了解。”

***** 马克思也重新读了波佩的《数学史》,参见 IISH, Marx-Engels Collection, B 107, 111-112。

想要阅读或购买的书单中提及过它们。^[30]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似乎表明马克思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移。但实际上,其中一些研究从最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与经济问题有关。譬如,这可以从马克思对尤利乌斯·奥的《补充肥料在国民经济和私营经济中的意义》一书的阅读中看出来,该书是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之一。^[31]尤利乌斯·奥明确表明肥料的经济效益是他的主要研究课题,而马克思的边注则显示出他对奥关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讨论很感兴趣。^{*}其他研究表明——正如从1868年马克思对弗腊斯的评论中已经可以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和科学问题本身。在某些情况下,马克思在开始阅读时会有一种隐性的经济学线索,譬如,当他在读几本有关农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时,他写下了这样的标题:“农业+土地价格,地租”。但随后,他详细记录的却是地质过程和其他技术过程,而没有进一步涉及经济学内容^{**},正如马克思晚年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研究的态度一样。^[32]

四、马克思手稿中的技术变革

虽然有关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对其经济学理论的影响问题在将来MEGA²的相关文本可资利用的时候还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但在这里,我想先谈一下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在《资本论》中,诸如“技术进步”“技术变革”甚或“工艺学”这些术语很少出现。然而,对于不同形式的技术变革的考察却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阐述积累过程和利润率趋于下降时更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驱动力在于资本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准确地说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那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被证明是更加有效的,而且不会像绝对剩余价值的增殖方法(比如延长工作日)那样很受限制。这些基本原理都是众所周知的。通过考察分工、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马克思发现这些形式节省了劳动或可变资本。与此同时,不变资本——原材料、用于机器制造的产品以及其他东西——却保持不变甚至会增长。于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提高了。马克思洞察到,这会使作为剩余价值或利润与总资本支出之比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为了解释资本家引入这些会降低他们的利润的新技术的原因,马克思转向对竞争力的考察。通过考察,马克思发现,那些使用可以降低成本的新技术的资本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直到其他资本家也使用这种新方法。随后,产品价格会降低,并产生较低的利润率。马克思将节省劳动的创新发明看作技术变革的主导形式,而且他的很多阐述进一步表明,技术变革的发展最终会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然而,由于马克思没有更具体地阐释这一过程,因而为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利润率下降与危机理论或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之间的关系留下了空间。^{[33]:[34]177,179-80;[14]311-370}

之前,舍福尔德借用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资本构成、工资率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表明,资本有机构成在节省劳动的技术进步中会保持不变。因为在所有部门中劳动的节省所降低的不只是最终产品的价值,从长远来看,也会降低不变资本中诸要素的价值。如果劳动的节省对所有部分的影响是相同的,那么,产品的相对价值和生产资料的相对价值就会保持不变。如果商品是根据生产价格(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来加以衡量的,上述结果会同样出现。而且,“如果没有外部干

* 马克思也对一段分析地租原因的文字做了强调,参见RGASPI, fonds 1, opis 1, delo 6425; 285, 289, 303, 306-309。

** 参见IISH, Marx-Engels Collection, B 143。

扰”,并且不变的利润率能为投资提供“足够的剩余”,那么,经济就有望“维持一个黄金时代”。他还指出,“马克思自己已经担心可能会出现资本节约型发展”。譬如,原材料的节省将不断降低资本有机构成。因此,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机器的引入隐含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消耗更多材料的生产性消费。机器的引入不会改变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材料,但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制造机器。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就会必然提高。

实际上,马克思的确注意到了生产资料特别是原料的逆节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将其定义为利润率下降的逆趋势。因为当原料的价值发生巨大下降时,生产中原料的使用量反而会增加。基于这些考虑,马克思也注意到有些因素会限制这种逆趋势,这似乎是对舍尔福德引用过的《1861—1863年手稿》中那段关于原料的有限性降价的文字的一种回应。^{**} 这也是马克思谨慎地设法保持论据和论点之间平衡的又一例证。1864—1865年,马克思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是以与它的物质内容增长相同的比例而增加的……比如大量的棉花……这对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以及煤炭等来说同样如此。[当然,也存在相反的因素,比如某一动物或植物产品的价格上涨]。”^{***[7]305}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加了方括号的文字在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被省略了。^{[11]233,954} 尽管1884—1885年以来恩格斯就

已经知道《1861—1863年手稿》的存在,但没有证据表明恩格斯了解其中包括这样一段文字:“[……]资本主义生产从未成功过,将来也决不会成功地用它控制纯机械过程或无机化学过程的那种方式来控制这些过程,[譬如,动物的有机过程]。”^{[13]1809}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自1884年以后,恩格斯反复翻阅了马克思的23个笔记本(《1861—1863年手稿》)的其中几本,并利用马克思留在这些笔记本封面上的条目整理了一个内容目录。在辨读了《资本论》第3卷的前230页之后——马克思的评论是在第217页——恩格斯在1885年3月8日写给劳拉·拉法格(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马克思的女婿)的信中说,这一手稿的最重要部分已经在先前的《1861—1863年手稿》中得到解决了。然而,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恩格斯是否看到过有关“有机原材料的诸界限”这段文字,因为它是出现在后来马克思重新回到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阐述时他与舍尔比利埃的争论部分,而不是出现在他专门阐述资本、利润和利润率的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说明了另一种利润率下降的逆趋势,以及由于机器的使用而带来的剥削程度的加深。这是与技术变革相关的另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而这里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只是被顺带提及而已。^{[34]181;[7]302-305;[14]327-370}

马克思是如何在手稿中利用这些摘录笔记的呢?首先,他以一种历史性方法追溯了协作和机械化发展为一种建立在用机器制造机器这

* 马克思将它们看作“一种独特的操作”,即一种与工人不相干的、独立于工人之外的方法。这里以及接下来的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引用来自《资本论》第1卷的第2版(1872年),亦即马克思自己编排的最后一个德文版(参见 Marx[1872]. MEGA² II/6,1987:322)。

** 参见 Marx[1864—1865]. MEGA² II/4.2,1992:110-164,305;Marx[1861—1863]. MEGA² II/3.1-3.6,1976-1982:1809-1810 和 Schefold B. Different forms of technical progress[J]. The Economic Journal,1976(86):817。

*** 马克思经常使用方括号来标注观点、笔记等等。这里我用了双方括号来区分马克思的括号与编者的括号。

**** 参见 Marx and Engels[1871—1895]. MEGA² II/14,2003:345-346,1022-1023;Marx[1861—1863]. MEGA² II/3.1-3.6,1976-1982:1544,1802。

种生产之上的新体系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以拜比吉的机器定义为开端,马克思考察了从工具到机器的发展过程,并把波佩所描述的自中世纪以来的技术运动与《各国的工业》中所描述的更加现代的发展(比如滑动刀架和蒸汽锤)结合起来。于是,马克思将不断增多的各种工作机看作18世纪产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他在早期著作中所强调的、当时人们所普遍认同的蒸汽机。^{[1]362 seqq; [19]12,24,34-35} 马克思也指出,一个行业中工作方法的变革会引起其他行业发生相似的转变。^{[1]374-375}

其次,在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强调科学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从而将科学看作一种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但并没有阐明科学对经济需求的完全依赖性。后来,N.罗森博格对这一问题做了考察。^[29]而C.J.里科伊补充指出,除了科学,实际经验的积累也被证明对于机器发展具有本质作用。^[36]马克思的思考没有局限于工业领域,他看到除了纺织工业,机械工程、交通运输和通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农业中的技术变革应得到更加详细的讨论。马克思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化学新发现对于耕作方法的影响方面,这些方法对于他分析级差地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763-764,768,833}同时,马克思也暗示了这些方法的破坏性作用。^{[7]753; [1]475-477}

再次,在《资本论》中,当先前在早期摘录笔记中占主导地位的机器的社会效应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与政治学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应该对工作条件的恶化负责^{[1]399-424}。在做总结时,马克思将

资本家手中的工厂制度看作是一种“对工人的必要生活进行系统性掠夺”^{[1]413}的工具。我们从1877年秋马克思为计划中的《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第3版和美国版所编制的一个修订列表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持久兴趣。^{*}在这些列表中,马克思提到“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中的几处改动,譬如,经济危机与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马克思也指出,对工作条件进行法律监管与约束,将是大工业的一种必然产物。虽然这种制度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但它们已经得到缓慢而普遍的强制实施了,并提高了安全水平,也实际地缩短了工作日。^{[1]456-475}

五、马克思政治学中的技术变革

最后,我想探讨一下19世纪的政治学,以考察一下马克思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展出来的思想观念对其政治活动的影响。1868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第3次代表大会,讨论“资本家阶级手中的机器的影响”问题。在1867年9月的洛桑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办事处为布鲁塞尔大会议程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中就包括工业中的机器使用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问题。1868年1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针对提交给布鲁塞尔大会的问题做了公开论述。机器及其影响被列为第2项议程,其次是信贷、合作社、教育,然后是地产、矿场、铁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罢工。^{[37]535,538-539,1835}1868年7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开始就讨论了这些问题,而且马克思强调,本次会议要将机器及其影

* 在这些列表中,马克思也注意到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的分析应该限定在西欧国家。马克思在1872—1875年的法文版中修改了自己的表述,并在1881年3月8日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确认了这一观点。安德森指出,这一改动在恩格斯负责整理的《资本论》第1卷第3版和英文版中被忽视了。

** 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对工人的影响会随着机器的引入而加重。他援引了美国内战期间美国棉纺织工业的一个事例。他指出,据统计,在美国内战期间,新机器在棉纺织工业中引起大量的集中化过程,并导致5万多名工人失业。

响问题作为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来讨论。^{[31]577}

在讨论中,马克思指出机器的影响已经转向人们所期望的反面:机器延长了工作日,而不是缩短了工作日,女工和童工在机械工人中的比例增长了。工人们经受着日益紧张的劳动强度,变得更加依赖于资本家,因为他们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工人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奴隶,很多工人都失业了。根据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所做的会议记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完全被杀害了”^{[37]581},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产生了不断增长的剩余人口,从而导致“工资的降低”^{[37]581}。而那些支持机器的观点没有得到多少回应。约翰·韦斯顿认为应该把各个工业部门都考虑进来,而不应只考虑纺织工业。他指出,在木材加工业中,机器缩短了工作日,但并没有减少对劳动的需求。根据会议记录,作为伦敦最著名的自由思想家之一,哈里特·劳在会上指出:“机器已经使女性更少地依赖男性……最终将把她们从家庭奴隶制中解放出来。”^{[37]585}在同年8月11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没有采用有关上述问题的任何观点。相反,决议只谈到了被资本家用来进行“独裁与勒索”的机器和作为废除雇佣劳动之物质前提的机器之间的差别。这是对《资本论》中关于“机器本身”与资本家手中的机器之间的区别这一观点的一种回响。^{[1]375}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同意这样一种趋势,即相比于资本家,机器的引入更不利于工人,特别是由于工资的降低和工人的失业。最后,大会通过了总委员会提出的决议。^{[37]1884-1886}

六、结论

在《资本论》第1卷临近出版之前,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你上一封信中的某些说法确实引起我的怀疑,好像你又碰

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点,可能使一切都拖延到不知哪一天去。”^[38]而《资本论》的各个版本似乎也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一担忧,并充分表明马克思是一个“修订大师”,他总能发现新的资源和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他经常会寻找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总是对他找到的解决方法感到不完全满意。这已为那些占了他思想遗产的很大一部分的未发表的文献资料所证明。关于技术变革,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开始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即工人的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也考察了机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后又考察了机器的发展史,并对技术设备的运行产生了兴趣;他还将农业纳入考察范围,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现对于土壤栽培和家畜育种的改良作用。此外,他还沉浸于对地质学、化学和数学的广泛研究之中。马克思的这种开放性研究有时会偏离他最初关注的问题和主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这或许可以从他在1850年代早期和1870年代所做的摘录笔记中看出来。不管怎样,马克思最终还是对技术变革,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作用做了详细分析,并强调了机器的普遍应用的革命性影响和关键性作用,以及它通过建构一种“真正的社会生产制度”而对劳动者的解放最终所具有的积极意义。^{[37]587}当然,他偶尔也会提到技术变革的破坏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second section, Vol. 5, 6, 8 [C]. Berlin: Dietz, 1983, 1987, 198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457.
- [3]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irst section, Vol. 2 [C]. Berlin: Dietz, 1982: 187-438.
- [4] ROJAHN Jürgen. Die Marxschen Manuskripte aus

- dem Jahre 1844 in der neuen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MEGA) [J].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985:647 – 663.
- [5]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second section, Vol. 11 [C]. Berlin: Akademie, 2008.
- [6]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second section, Vol. 13 [C]. Berlin: Akademie, 2008.
- [7] MARX Karl.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 – 1867; Part 2* [C]//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second section, Vol. 4 (MEGA²). Berlin: Dietz, 1992.
- [8]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second section, Vol. 4 [C]. Berlin: Dietz, 1992.
- [9]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irst section, Vol. 25 [C]. Berlin: Dietz, 1985:443.
- [10]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second section, Vol. 7 [C]. Berlin: Dietz, 1989:547.
- [11] CARL Erich Vollgraf. Engels' kapitalismus-bild und seine inhaltlichen zusätze zum dritten band des kapitals [J].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 F*, 2004:7.
- [12]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second section, Vol. 15 [C]. Berlin: Akademie, 2004.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8 – 150.
- [14] HEINRICH Michael. *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Die Marxsch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 klassischer tradition überarb und erw neuaufl* [M]. 2nd ed.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01.
- [15] KURZ H D. Technical progres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lassical economics; Adam Smith, David Ricardo and Karl Marx [J].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10, 17 (5):1183.
- [16] MORI Kenji. Six-sector model of production and monetary circuit: Making sense of Marx's original reproduction schemata [C]//The ESHET 2009 Conference in Thessaloniki, Greece, 2009.
- [17]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ourth section, Vol. 3 [C]. Berlin: Akademie, 1998.
- [18] RAINER Winkelmann. *Exzerpte über Arbeitsteilung, 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 historisch kritische ausgabe* [M]. Mit einem Vorwort von L Krader Frankfurt/M: Ullstein, 1982.
- [19] PAULINYI Akos. Karl Marx und die technik seiner zeit mannheim [C]//LTA Forschung Reihe des Landesmuseums für Technik und Arbeit in Mannheim, 1998:26.
- [20] MARX Karl.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M]. Paris: A Frank, Bruxelles: C G Vogler, 1847.
- [2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09 – 413.
- [22] HANS-Peter Müller.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M]. Frankfurt/M: Ullstein, 1981.
- [23] ROPOHL Günter. Karl Marx und die technik [C]//W König and H Schneider, *Dietechnikhistorische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Kassel: Univ. Press, 2007: 63 – 82.
- [24] ROJAHN Jürgen. 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 the importance of Marx'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 [J]. *Rethinking Marxism*, 2002 (4):29.
- [25]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ourth section, Vol. 9 [C]. Berlin: Dietz, 1991.
- [26] HANS-Peter Müller. Karl Marx über maschine-

- rie, kapital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exzerpte und manuskriptentwürfe 1851 – 1861 [M].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2.
- [27]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ourth section, Vol. 7 [C]. Berlin: Dietz, 1983: 214seqq.
- [2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81.
- [2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5 – 286.
- [30] CARL Erich Vollgraf. Marx' Arbeit am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 in den 1870/80er jahren [C] // In memoriam Wolfgang Jahn: Der ganze Marx. Alles Verfasste ver? ffentlichen, erforschen und den “ ungeschriebenen ” Marx rekonstruieren. Hamburg: Argument, 2002: 33 – 66.
- [31]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ourth section, Vol. 32 [C]. Berlin: Akademie, 1999: 42.
- [32]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ourth section, Vol. 31 [C]. Berlin: Akademie, 1999.
- [33] SCHEFOLD Bertram. Different forms of technical progres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76 (344): 806 – 819.
- [34] ELSTER J.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a case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Osl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5] ROSENBERG N. Karl Marx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science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4): 713.
- [36] RICOY C. Marx on division of labour, mechanization and technical progress [J].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3 (1): 47.
- [37]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rx-Engels gesamttausgabe: first section, Vol. 21 [C]. Berlin: Akademie, 2009.
- [3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42.



引用格式: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刘顺.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辩证法[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55-64.

中图分类号:A1;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55-010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辩证法

Marxism and ecological dialectics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¹,布雷特·克拉克²,[翻译]刘顺³
J. B. Foster¹, Brett Clark², [Translator] LIU Shun³

1. 美国俄勒冈大学 社会学系, 美国 俄勒冈州 尤金;
2. 美国犹他大学 社会学系, 美国 犹他州 盐湖;
3. 上海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马克思所提出的囊括人类、自然和社会三重维度的“新陈代谢”这一概念, 饱含着深邃的生态世界观, 是生态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这一世界观是劳动价值论和生态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蕴含着独到的生态辩证法。在一定意义上, 生态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针对当前流行的那些企图淡化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诘难, 有必要利用生态辩证法对其作出有力的回应, 以期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生态辩证法的未来愿景是: 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共同发展的人类社会, 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可以合理调节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 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生态辩证法;
资本主义;
新陈代谢理论

收稿日期:2017-05-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7YJC710051);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HS16006);2016年度上海海事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1953—),男,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旗舰人物,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的生态学》《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与《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等;布雷特·克拉克,美国犹他大学副教授;刘顺(1988—),男,河南省鹿邑县人,上海海事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哲学。

[译者导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著名左翼美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主编,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领军人物,长期从事资本的生态批判研究和相关约稿组稿工作。本文是作者一贯秉持的“马克思具有深刻的生态世界观”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和总结,作者首先针对马克思生态学研究的一些突破性进展来展开讨论,旨在说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深刻意涵;尔后,作者试图对当前那些流行的、企图淡化新陈代谢理论的观点,进行客观的批判性阐述;最后,作者循序渐进凝练出生态辩证法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核心地位。本文不但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生态世界观作了进一步阐发,而且在全球性生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自觉为马克思思想的“在场性”提供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合理辩护。

一、问题的提出

那种认为“生态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思想基础”(这可在马克思的“生态代谢断裂理论”中得到印证)观念的复兴,正在重新定义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即站在新的角度去界定资本批判与自然科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秉持“马克思思想只是德国理想主义、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相互杂糅而形成的一种粗鄙复合体”观点的人来说,这种复兴似乎令人吃惊。然而,曾在20世纪盛行的古典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正在被一种更加广泛的共识所替代,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密不可分。个中缘由就在于,他的理论不但关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还涵盖其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革命的批判。

在乔治·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根植于其把劳动观念作为社会—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中介。在这种意义上,人

类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的和自然生态的。而且,任何一种对现实的历史的理解,必须聚焦到人类自然条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上。^[1]正是基于这种总体性的综合方法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到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的重要性,以及触达人类自由和实现人类潜力最大发展的必要性。因此,社会主义要求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去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可以说,马克思提出的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断裂这些核心概念,事实上已逐步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批判性的生态世界观。^{[2]949}

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与其生态价值论存在着紧密关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批判的核心,是剖析代表着总体生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结晶)之间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极力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资源被当作一件“自然馈赠给资本的免费礼物”,所以它们不直接参与价值的生产。^[3]基于此,他把财富与商品价值区分开来,认为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被自然界和劳动共同生产出来。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价值/交换价值的源泉是对人类劳动力的剥削。这样,财富与价值的矛盾就成为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并与自然生态条件退化和破坏直接相关。正是资本主义价值与积累过程之间的这种生态矛盾,恰能解释走向生态危机或新陈代谢断裂的资本主义制度趋势。这种制度对利润的狭隘追求(且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正日益破坏支配着一切生命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社会再生产过程。

对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和生态价值论的“重新发现”及其在分析生态危机中的作用,已经出现明显“不和谐”的趋势^[4]。一些左翼学者试图盗用马克思的社会新陈代谢理论,宣扬原始社会的“一元论”观点,而其理论基石正是诸如社会的“自然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新

陈代谢”概念。^{[5]80-81} 这些观点,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它们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超社会建构主义概念,它们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并倾向于淡化一切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甚至根本不把生态危机当作世界末日或者重大灾难来看待。因为他们认为,生态危机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法则。在部分左翼学者看来,面对地球灾难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例外论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存在着持续性关联。^{[5]169-192}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马克思生态学的一些主要突破性研究进展展开简要讨论,这主要结合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和生态危机因果关系来探讨,并通过研究其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结构来实现。之后,我们将对当前那些流行的、企图淡化马克思“独到的新陈代谢理论”(体现着市场内部逻辑)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综述。^{[6]10-19}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和总结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

二、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框架

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具有鲜明的复杂性,不妨用 I. 梅扎罗斯提出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框架来作参照理解,因为异化理论是构成马克思所有思想的基础。在梅扎罗斯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呈现出“人类—劳动/生产—自然界”的三角关系。人类必然通过劳动生产来调节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利用商品交换制造出一套整体的二阶调整关系,这就导致出现一个更加异化的三角关系:异化的人类——异化的劳动和生产——异化的自然界,而异化的自然界叠加在前两者之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在第二个异化的三角形,它却无视异化的概念而认为劳动和生产具有直接性;但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科学,主要聚焦于(异化的)自然界与

(异化的)生产之间的关系,目的就在于彻底主宰自然界。正因如此,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的异化作用才得以凸显出来。梅扎罗斯写道:“对于包括污染在内的严峻的‘自然异化’现象,若不能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在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后果是难以予料的。”^{[7]99-114}

同样的概念性框架,尽管被视作充满生态学意义,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展现得更加突出,即在马克思对全球自然代谢、社会代谢与新陈代谢断裂的研究分析中体现出来。在他看来,劳动—生产过程应该被看作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因此,蕴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关于新陈代谢的一些概念框架术语,可表征为非异化的三角关系(人类—社会新陈代谢—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新陈代谢就是实际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人类(经由劳动)与整个自然界即全球的新陈代谢进行物质变换的重要中介,虽然具体的历史形式和发生过程都存在着特定的差别。

随着与商品生产相关的二阶调节关系(土地的减少与劳动向商品的转化)的出现,在基本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存在着叠加,表现为一个异化的三角关系:人类异化—社会新陈代谢的相互依赖的过程的异化(新陈代谢断裂)—自然的全球新陈代谢异化。^{[2]949} 因此,正如青年马克思在《对詹姆斯·米尔的政治经济学元素的评论》中,把新陈代谢断裂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物种活动“异化的调节”。^[8]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观日益推崇生态现代化模式,因为它不得不解决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社会新陈代谢的断裂。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诸如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等,通常被他们建议和采用,但事实上都没有触及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仅仅把生态矛盾移来移去的背景下,最终自然界的普遍性新陈代谢断裂就会更加严峻,其影响远超过

直接的生产过程,并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极限”问题。这种理论框架恰好构成马克思生态危机理论的核心,其特别强调由生产制度肇始的人类新陈代谢断裂。在广度和深度上出现的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和生态灾难之结果,正代表着资本主义体系市场制度的最终失败。

这种整体的概念性框架在马克思有关19世纪土壤危机的讨论中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他以此为背景引入了“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人类在整个文明史上一直从事农业,呈现出人类—农业—土壤的三角关系。人类文明史上充斥着很多转向非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农业例子,它们导致了土壤退化。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和农业的发展,新的商品关系随之出现,以定性的新方式破坏了这种恒定的自然关系,因为必要的营养物质(如氮、磷、钾)不能反馈给土壤,所以出现了农业生产中更加广泛的、严峻的生态代谢断裂。这是一种“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无可修复的断裂,而这种新陈代谢是由生命自身的自然法则所规定的”^{[2]949}。

为了解决支配着土壤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的中断问题——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城乡之间极端对立的产物,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开始着手研究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办法,这一方面带来国际鸟类和硝酸盐贸易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带来化肥工业的发展。鸟类和硝酸盐贸易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并肇始帝国统治战争的爆发。^[9] 工业化肥的发展,尽管有助于创造用于战争的化学品,同时也愈加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载体。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显然忽视了造成异化自然和异化社会的深层制度根源,反而导致巨量化肥的流失、水道退化以及世界海洋死亡带的出现。因此,在全球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化学化肥,驱使人类社会和土壤的新陈代谢断裂向自然界中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新陈代谢断裂扩散,逾越了全球的生态边界,并破坏了生物圈的基本生物的地

球化学过程。^{[10]73-87}

倘若放到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中,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体系的理论诠释中(以及在普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而一般情况下使用价值离不开与生产活动相关的自然物质基础。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来源于抽象劳动)仅仅源自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而缺乏任何自然物质基础层面上的考量。因此,自然界被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免费馈赠给资本的礼物”。这种生态矛盾就产生了所谓的“劳德代尔悖论”。该悖论以劳德代尔堡的第八个伯爵詹姆斯·梅特兰的名字来命名,他是19世纪初的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劳德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私有财富(交换价值)的积累,一般取决于对公共财富(使用价值)的破坏式开发,从而生成稀缺和垄断,以满足积累过程的实现。^{[10]53-72} 在这些条件下,耗损公共利益的、加剧的环境退化正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固有后果,甚至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基础,因为一些新兴产业诸如废物处理产业,正是为了应对所谓的环境影响而出现的。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极端的消耗制度,这种制度在利用自然力量(包括被马克思称为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时是贪婪的。在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驱动下,资本主义促使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最大化,然后把所产生的废弃物倾倒入环境之中。“‘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是每个资本主义者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11]380-381}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的特色就在于,它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的退化与破坏,已被其商品生产制度所强化,而这种商品生产制度是以对劳动力的纯粹计算为价值法则的,但同时又把自然界视作一种无价值的领域。

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概念及其与社会和生态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最初

来源于他的朋友、革命同志和社会主义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著作的启发。丹尼尔期在1851年的著作《小宇宙》中,运用流行的系统理论中新陈代谢概念来诠释植物与动物之间的交互关系。^[12]马克思在丹尼尔斯思想以及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著作的基础上,建构并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和新陈代谢断裂理论。^[13]在撰写《资本论》及随后的时期内,马克思愈来愈注意到生态危机。在阅读了植物学家卡尔·弗拉斯关于历经“类文明”长期历史中出现的土壤破坏和荒漠化的研究之后,他认为这个过程在很多方面仅仅强化和扩展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使在异化劳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制度变得“无可救药”。基于此,马克思推断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破坏代表着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主义趋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需要对这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性的瓦解。^[14]

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新陈代谢的概念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新陈代谢断裂的事实,主张在面临资本主义退化的境遇下去“激活”一种非异化的社会新陈代谢,并推动一种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这些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对作为一种剥削劳动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反,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最初源泉即土地和工人”^{[11]638}。

三、生态和社会一元论:自然界被统摄

马克思社会新陈代谢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较早引入并使用现代生态系统和地球系统概念(二者均源自于新陈代谢理论),并且在生态学内部,使这二者在形成期有着清晰的内在联系。^[15]马克思的总体唯物主义方法论率先使用了若干生态学概念,并在一些方面促进了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生物学的巨大进步。而且,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着紧密联系,仍是最成熟的辩证法理论,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可用它来理解资本主义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和自然界的退化。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持左派传统思想的理论家,却试图采取另一种路径,推崇生态学维度上资本主义的统摄作用,诸如资本主义应该被视为生命之网本身的组成部分。这种社会一元论显然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攻击。其明显意图是,欲割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许多秉持社会一元论的观点,携带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固有的断然拒斥自然辩证法的认识论根源,这种认识肇始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本到处自相矛盾和后来完全被他自己否定的著作)一书中的一个著名注脚,即他在这里质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16]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探险》到其他很多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发表,蕴含在其中的拒斥自然辩证法及“自然界仅仅是分析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客体”的观点,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并成为他们的哲学传统。这就强化了一种仅仅局限于人类、人类世界和人类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主客体辩证法。^[17]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第一自然”(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已经被“第二自然”(被人类社会改造后的自然)完全瓦解。^{[18]65-69}因此,自然界已不再作为一种现实和本体论存在,在社会建构的“混合体”中,自然界仅仅是一种虚无存在。^{[6]15}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冲突,也不承认新陈代谢断裂的出现以及作为笛卡尔“二元论”载体的自然界的异化。^{[5]4,19-20,78,152}任何一种持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然破坏基本的

生态过程的观点,就被标签化为“世界末日论”,被视作对自然科学家和激进生态学家的指责,并当作社会一元论世界观的主要敌人。

秉持严谨的批判性视角就会发现,社会一元论观点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深层矛盾,包括那种把社会决定论引申到“自然界消亡”的观点也是如此。譬如,乔治·摩尔反对将自然与社会相分隔的“二元论”,其理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一元论的关系视图”,在这里自然和社会的“融合捆绑”意味着二者的统一存在。^{[5]385}他认为“资本主义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调和与生态圈的关系”,然而资本的力量构建和培植了“生物圈的资本主义过程化”。抑或,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资本主义从整体上内化了自然界的矛盾,但是‘生命之网’却内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6]12}。在任何时候,自然界仅成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要素,实际上就消解了自身的存在。

这些理论家最大的恐惧就是二元论。左翼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和埃里克·斯温德杜夫甚至声称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二元论者。史密斯断言:“考虑到马克思本人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在他的理论视域中同样存在着自然界概念二元论的影子,事实就是如此。”斯温德杜夫写道:“社会和自然,或许已被马克思融合为一体,二者成为了历史的、地理的存在,但是他又把二者作为先验存在的独立领域。”^{[20]446}为了克服他所说的马克思的“社会—自然二元论”,斯温德杜夫以独特的“社会自然”形式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杂交主义。

由此产生的荒谬现象,便体现在摩尔所推崇的重要地理学家布鲁斯·布劳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埃尔马·阿尔特瓦特的批判指责中,因为后者依据物理学理论坚持在他的研究中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21]显然,摩尔违反了自然科学:“‘熵法则’在能量和生产的特定形式下发挥作用。它并不是由抽象的生物

圈来决定的。从历史性自然的角度来说,熵是可逆的和具有周期性的,但是在特定文明的逻辑内,要受制于上升的熵。”^[22]然而,怪诞的社会一元论观点认为,熵要听从社会的安排,因为人类社会能够逆转和回收熵,从而能够回转或弯曲“时间箭头”。

这些左翼思想家甚至还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认为“自然界及其衍生物‘环境’和‘可持续性’,是‘空’的符号”^{[23]304}。尽管“作为历史产品的自然界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但是社会关系却生产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20]446}。在这种本质上反环保主义的视域下,受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术语的影响,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包括整个绿色运动组织在内)被批评不应该持有“自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冲突”的观点,且被说成倾向于“虚幻的想象”,滋生了“生态恐惧”,即认为“为了避免内在的灾难,有必要对资本主义这种阴云密布的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23]308-309}。史密斯斥责了那些气候科学家,因为他们“试图区分社会(人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认知不但是“一个愚人的辩论,而且是一个愚人的哲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留下了巨大的鸿沟,即自然界在一个角落,社会在彼此分开的另一个角落”^{[18]244}。

史密斯和其他左翼思想家针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和行动所持的整体怀疑主义态度,实质上表现出对现状的默认和对环境议题的疏离。摩尔把他所说的“绿色唯物主义(他所使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术语)的新陈代谢崇拜”,归因于地球系统的“生物物理”概念。不仅史温吉道甚至阿兰·巴迪欧和斯拉沃热·齐泽克都认为,“生态已成为群众的‘新鸦片’”,而且这个论断被他们一再逐字强调。^{[5]15}

在回避生态科学的时候,摩尔警告说不要形成“对自然极限的盲目迷恋”^{[5]80}。与一些世界主流的气候科学家的观点相反,作为人类世

(荷兰气象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的概念,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工作小组的成员,他断言,“人类(人类社会)并不能去统治自然力”。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显然具有无尽的能量,“突破看似不可逾越的‘自然极限’”,因此,在与人类世相关联的星球界限中,并没有真正的代谢断裂,这就意味着“没有理由去担心”^[24]。最糟糕的是,这种制度(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滥用,最终必然造成自然资源成本的增加,这就为资本带来了底线问题,原因就在于“廉价自然”愈加难以觅到。^{[5]112-113}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被视为一种“世界生态学”,它在“生命之网中得以展开”,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有能力不断克服经济稀缺。^{[6]16-17}

摩尔欲采用“生命之网”这个术语来表明他正在重视的生态问题。然而,这个短语主要被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对自然具有包容性”的一个隐喻。无论是在自然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世界从整体上被简单描述为一种相互联结或勾连的关系集合,在该集合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摩尔的这种理论立场在很多方面与坚持生态现代化战略和“绿色资本主义”的学者相似,认为通过把自然内化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就能够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即把一切都纳入到市场逻辑中去。^[25]

这种分析拒绝接受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社会新陈代谢断裂之类的质疑,试图调和异化的人类与异化的自然之间的矛盾,并使现存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摩尔无视马克思有关“社会新陈代谢相互依赖过程中的断裂”思想的复杂认知,反而把这称为“能量的单一代谢”^{[5]83}。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陈代谢断裂,而在于新陈代谢转移,……新陈代谢成为识别转移(临时的和具体情况的)而非断裂(累计分离)的一种途径”^{[5]83-84}。与史密斯的“资本主义驱使自然界的统一性”相一致,摩尔完全否认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自然之

间的社会新陈代谢被“异化调节”的理论。^{[18]81}

在社会一元论思想家的单维视角中,研究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相互渗透、交互和调节是毫无道理的,自然循环过程不被认为是相对独立于社会的,甚至认为通过抽象力仍然被归入社会内部,因此,自然界不再被视作合法的研究主体。在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的复杂辩证法里,我们只剩下一种“辩证的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中,现实被社会化地建构为一系列物质或过程的集合体^{[5]13,37,76,78}。对于摩尔来说,世界生态的概念仅仅意味着大写的资本被镌刻在一切事物之上,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之网”,只不过是一堆商品的集合。于是,地球系统的概念就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马克思明确认为,自然与社会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彼此不能也不应该被归入到对方那里。这并非意味着要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作出选择。相反,作为一种开放理论体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提供了唯一有意义的可用来研究分析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聚焦于调节手段、总体性,以及兼顾到现实和综合层次的异质性特征。^{[1]119-124}此外,这不可能仅仅通过苦思冥想来实现,而应在源自真实的物质关系下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四、辩证实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统一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深切关注着如何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他写道:它“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26]。

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框架,恰好为解

决这种分离提供了办法。这种理论框架作为一种开放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能够解释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关系,阐明自然的异化与新陈代谢断裂甚至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断裂的出现如何与资本制度相互交织耦合。

社会新陈代谢涵盖人类劳动和在更大范围内与生物物理世界相关的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一种必要的“新陈代谢交互”^{[11]637-638}。在他之后,卢卡奇解释说,劳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因为这些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并且是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27]44}。他注意到,“不管劳动过程发挥出多大的变革效果……自然边界只能后退,但绝不可能消失”^{[11]34}。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生命自身和社会得以存续的永恒条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284}。

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与商品生产的具体形式和无止境的追求资本积累相关的且特点鲜明的二阶调节。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不仅异化了人类和生产过程,而且也异化了自然界自身。如前所述,对此人们采取了一些异化调节的措施,但造成了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因此,生态危机在社会新陈代谢的交互过程中显现的断裂,抑或只有通过辩证批判实在论才能得到彻底解决。^{[2]949-950}

人类只要积极参与劳动和生产,就处于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也即获得了“第二自然”的存在形式。然而,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在更广泛、动态和普遍意义上仍然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全面兼顾到内部和外部关系,而不是把分析仅仅局限于内在动力。这就引出了开放辩证法与封闭辩证法之间存在区别的关键性问题。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这个辩证法的概念(在定冠词意义

上)——作为哲学意义上或者的确作为唯一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很明显把你置于这种位置:辩证法适用于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许能被划归为维多利亚时代,即体现新科学的‘真理即成事实’精神;我们只能理解我们所做的,因此我们只认识历史而非自然界本身,因为后者正是上帝所负责的东西。”^[28]

相比之下,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质上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它拒斥封闭:不存在完全脱离自然的人类领域,当然也没有上帝的领域。从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甚至强调环境的动力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拒绝接受自然的辩证法。卢卡奇在其《社会存在本体论》“马克思”这一章中(后来以英语独立出版),试图重新整合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辩证认识论只具有近似的理论特征,这是因为现实包括物质复合体的持续相互作用,该复合体位居内在和外在的异质性关系中,并且它们自身是通常异质性成分的动态合成体,以至于有效元素的数量是可以无限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知识的近似特征并不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尽管它也会去影响认识论;相反,它是对知识本体论的反思;客观因素的无穷和异质性以及这种形式的主要结果即科学法则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作为一种倾向来实现自己,必要性也只有在与反对力量的纠缠中才能得以确证,也只有通过无数事件所发生的调节关系来实现自我。”^{[27]103} 这表明:为了拒绝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和“替代束”概念,“双重内在性”和资本主义设想的自然界统一,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退回到前黑格尔时期的唯心主义,这是一种类似于莱布尼茨体系的投机哲学,坚持着“无窗”的单子论思想和静态的“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理论。^{[5]1} 最近流行的社会一元论和混合主义概念把此作为拜物教迅速登场的基础,并被用于重新考量社会理论,以期实现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就带来了阿尔弗雷德

北·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之瑕疵。^[29]

对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娜欧蜜·克莱恩客观地指出,“地球吸纳全球资本主义贪婪的新陈代谢污秽副产品的能力,正在遭遇透支”^[30]。资本主义的强大破坏力,正在驱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逐步积累,这种积累与其他因素造成地球系统中新陈代谢的人为断裂,这远远超出直接的社会生产所造成的生态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正在造成海洋酸化,它对海洋钙化产生巨大影响,而海洋钙又需要使用更多的能量才能生成,以用于地壳和板块的形成。^[31]物种是广泛生物网的基础,因此一旦它们受到刺激,就会在生物圈规模上产生大范围的影响。此外,海洋变暖和酸化正在导致珊瑚漂白化和坍塌。这些发达的珊瑚生态系统,在生成营养丰富的海洋环境与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32]海洋酸化被认为是以前生物大规模灭绝的驱动因素和当前生物大规模灭绝的一个肇因。

基于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概念框架,就成为理解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地球系统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尽管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技术修复手段来应对这些生态断裂,但是所有这些都将导致自然界新陈代谢范围内积累的结构危机,因为构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东西并未消失。^[33]马克思警告说,人类历史可能被破坏生命基础的一种异化的新陈代谢所摧毁和阉割。^[34]考虑到英国殖民主义正在导致爱尔兰新陈代谢断裂的极端案例,他认为在这些可怕的条件,“毁灭或革命就是标语”^[35]。

在马克思对资本和异化的新陈代谢批判中,隐含着新陈代谢恢复的肯定性认知,即运行在“人类存在的永恒自然条件”之中的非异化的社会新陈代谢。^{[2]959}要实现新陈代谢恢复,需要阻止“私有财产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对立”,根

除资本统治制度的异化。^{[7]113}这种以唯物主义为底色的理论,有助于促进一种复杂的动力学分析观点的形成,明确生产活动如何在更大范围内的生物物理世界中被引导和治理。正如批判现实主义者罗伊·巴斯卡尔所认为的:“仅仅在第二自然遵循第一自然所施加的必要约束时,我们人类才能作为一种生物而存在。尽管第一自然总是被历史地调节,但是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逃脱它。”^[36]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强调,“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事实上,“真正的人的自由”需要“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37]。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及其价值论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构筑一个可持续的、共同进化的生态愿景,据此,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物质变换),以推动人类未来的不断进步。这也正是马克思本人最深刻的、最具革命性意蕴的社会主义构想。

参考文献:

- [1] LUKÁCS Georg. *Labour* [M]. London: Merlin, 1980.
- [2] MARX Karl. *Capital*: vol. 3 [M]. London: Penguin, 1981.
- [3] MARX Karl, ENGELS Frederick. *Collected works*: vol. 3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732 - 733.
- [4] FOSTER J B. *Marxism in the anthropocene: dialectical rifts on the left* [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6 (3): 393.
- [5] MOORE J W.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M]. London: Verso, 2015.
- [6] MOORE J W. *Toward a singular metabolism* [M] // Ibañ D, KATSIKIS N. *Grounding Metabo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7] MÉSZÁROS Istvá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M]. London: Merlin, 1975.

- [8] MARX Karl. Early writings [M]. London: Penguin, 1974: 261.
- [9] HORNBOG A, CLARK B, HERMELE K, et al. Ecology and power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68 – 82.
- [10] FOSTER J B, CLARK B, YORK R. The ecological rift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 [11] MARX Karl. Capital: vol. 1 [M]. London: Penguin, 1976.
- [12] DANIELS Rolang. Mikrokosmos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88.
- [13]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14] MARX Karl, ENGELS Frederick. Collected works: vol. 42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7: 558 – 559.
- [15] FOSTER J B. Marxism and ecology [J]. Monthly Review, 2015(7): 2.
- [16] LUKÁCS 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 London: Merlin, 1968: 24.
- [17] BOTTOMORE Tom.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M]. Oxford: Blackwell, 1983: 523 – 26.
- [18] SMITH Neil. Uneven development [M].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65 – 69.
- [19] MACLEAN G K. Bertrand Russell's bundle theory of particulars [M]. London: Bloomsbury, 2014.
- [20] SWYNGEDOUW Erik. Modernity and hybridity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9 (3).
- [21] ANGUS Ian, MURPHY Fred. Two views on Marxist ecology and Jason W Moore [EB/OL]. (2016 – 06 – 23) [2017 – 03 – 20].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
- [22] MOORE J W. Nature in the limits to capital [J]. Radical Philosophy, 2015 (193): 14.
- [23] CHRIS M W.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planning theory: conceptual challenges for spatial planning [J]. Regional Studies, 2011(2): 277.
- [24] ANGUS Ian.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 [25] HAWKEN P, LOVINS A B, LOVINS H L. Natural capitalism [M]. London: Earthscan, 2010.
- [26] MARX Karl. Grundrisse [M]. New York: Penguin, 1973: 489.
- [27] LUKÁCS Georg. Marx [M]. London: Merlin, 1978.
- [28] JAMESON Fredric.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M]. London: Verso, 2009: 3 – 7.
- [29] WHITEHEAD A N.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25: 51.
- [30] KLEIN Naomi.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4: 177.
- [31] BEDNARŠEK N. Limacina helicina shell dissolution as an indicator of declining habitat suitability owing to ocean acidification in the California current ecosystem [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4 (4): 1785.
- [32] EDINGER E N. Reef degradation and coral bio-diversity in Indonesia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998 (8): 617.
- [33] MÉSZÁROS Istvá.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politics [J]. Monthly Review, 2006 (4): 34.
- [34] MARX Karl.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3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309.
- [35] MARX Karl, ENGELS Frederick.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142.
- [36] BHASKER Roy.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M]. London: Verso, 1986: 222.
- [37] ENGELS Frederick. Anti-Dühring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136 – 138.



引用格式: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张慧卿. 欧盟能够克服其困境吗? ——关于欧洲当前政治问题的评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65-75.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65-11

欧盟能够克服其困境吗?

——关于欧洲当前政治问题的评论

Can the European Union overcome its present difficulties?

—A review of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in Europe

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¹,张慧卿²

P. W. Preston, ZHANG Huiqing

1. 伯明翰大学 政府与社会学院, 英国 伯明翰;
2.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经过50多年的努力,欧盟把经过一战、二战而四分五裂的欧洲国家团结起来,欧洲得以非同寻常、持续和平地发展,人们有理由庆祝欧盟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过去10年中,欧盟却遭遇了一系列危机:欧元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对邻国乌克兰的内战,欧盟诸国无法达成共识;对内部移民问题的焦虑;英国脱欧所引起的震惊,等等。这一系列危机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问题:联盟关系的削弱、民众情绪的反向发展、合作机制面临的巨大压力、民族主义复兴所激起的公众对其他成员国的敌视等。欧盟的前景似乎很暗淡。但欧盟依然有着健全的制度体系、高效率的中央机构、可靠而又诚实的雇员,以及为欧洲一体化提供动力的坚实的道德和政治根基。只是其“使欧洲更加一体化”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欧洲政治精英快速的做出切合实际的反应。

关键词:

欧盟;
政治问题;
移民问题;
乌克兰问题;
财政问题;
脱欧

收稿日期:2017-10-23

作者简介: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1949—),男,英国人,伯明翰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张慧卿(1977—),女,山西省敏峙县人,江苏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民族政治学。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盟建立了不少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如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中央银行、欧盟法院等。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今欧盟是世界主要经贸区之一,是财政规则、贸易规则、环保规则等国际准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欧盟成员国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创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并且为建立防卫机构耗资巨大,人们有很多理由庆祝欧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在最近10年,欧盟遭遇了一系列危机,精英的诉求在增长,公众的支持在削弱,这些危机累积起来,导致了精英阶层的冲突,降低了公众对欧盟的支持。过去几年,在右翼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政党的影响下,法国、荷兰、意大利、波兰等国都出现了反对联盟的声音。这一倾向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投的结果是51.9%的人赞成脱离欧盟,48.1%的人赞成留在欧盟。

这些危机的累积性影响意味着:或者欧盟的精英们将采取补救性行动,或者欧盟一体化将被削弱。就前者而言,舆论界通常建议:对欧盟体制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以及确立与之相伴的技术领导的政策立场(建立一个成熟的中央银行,从而使经济从整体上恢复原状);加强核心国家间的政治联系(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联盟迈出第一步)。就后者而言,一个逐渐削弱的欧盟,其不同的组成部分会慢慢地分道扬镳,甚至会出现明显的分化(欧盟将分化为东欧、南欧、斯堪的纳维亚等部分,另外,至关重要的,在西欧将有一个以德国、荷兰、奥地利为中心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出现)。到目前为止,精英阶层几乎没有加强联合的愿望,而且对现状(机制、政策、所宣称的目标)忧心忡忡。在不久的将来,欧盟有被精英阶层短视主义统

治的危险,从而可能会无所适从。本文拟在对欧盟的制度架构、财政危机、乌克兰危机、移民问题、英国脱欧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欧盟的未来进行展望,以求教于学界。

一、欧盟的制度架构

亨利·基辛格曾说:当涉及欧洲问题时,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欧盟是一个“五亿人俱乐部”,其政治制度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令人迷惑的。究竟谁掌握权力是不清楚的,谁在承担责任也是不清楚的。权力和责任分散在欧盟的不同机构之手。另外,分布在成员国甚至亚国家地区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的权力和责任也不明确;而且在更广泛的规模上,这些机构属于国际社会另外层次的权力和责任主体。关于国际机构让人困惑的指责经常存在,现今这一批评指向欧盟:它不单单是一个多边国际组织,但它又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国家。^[1-3]

撰写欧盟章程*就是意在通过提供一个连贯性的章程文件,解决向谁求助的问题。经过多次协商,《欧盟宪法条约》于2004年通过。这一条约首先经过精英阶层的同意,接下来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但是2005年,法国和荷兰在公投中以绝对多数否决了这一条约。由于这两国是欧盟创始国,它们的投票至关重要,撰写欧盟新宪法的计划被否决了。

尽管遭受这一挫折,但经过技术性处理之后,这一条约于2007年被重新贴上标签,称为《里斯本条约》,并付诸实施。然而,随着这一政治—司法实践的展开,许多长期存在的争论又被提起,这些争论涉及欧盟的性质、未来与合法性。对于如何解决这些争端并没有达成共识,因此争论还在继续。

* 由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所领衔的委员会,在2001—2003年制定《欧洲未来协定》,其成员来自各成员国和布鲁塞尔。

1. 欧盟的性质

首先,关于欧盟的争论是从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描述这一组织开始:欧盟是什么类型的组织?有什么样的目标?其中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欧盟是超国家组织,另一种观点认为欧盟是一个国际组织。前者暗含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政治联合,后者意味着其成员国的入盟仅在于满足彼此的利益。

这一争论涉及两个方面的现实问题:一是成员国对联合目标的承认程度;二是布鲁塞尔欧盟中央机构的作用。如果成员国承认联合的目标,那么,它就需要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在促进这一目标实现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某个成员国不承认这一目标,欧盟中央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又不够积极,那么这一目标就是不可接受的。

许多评论者认为德国认可联合的目标,有时被看成是对 1933—1945 年灾难^[4]后路径的体面回归。近年舆论界认为德国严格遵守欧盟政策,尽管有些政策对其他成员国会造造成显而易见的损害,特别是像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样的地中海国家。*

许多评论者认为,法国明显不承认联合的目标。因为最初的欧盟只有 6 个成员国,而且具有非正式的联合领导者,因此法国精英倾向于承认“欧洲的国家”(戴高乐 60 多岁时的理念),而不仅仅是联合的欧洲。最近的评论没有发现法国精英试图改变他们这一观念的强有力证据,他们的不情愿加深了德国精英的疑虑。德法作为联合领导者、欧洲引擎,似乎不再能发挥他们之前所发挥的作用。

许多评论者认为,英国是联合的敌视者(除了在贸易和财政问题上),英国曾经被称为

是半独立的。这一背景在英国丧失帝国地位进而依附美国的双重过程中得以体现。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欧洲被视为第二好的选择。** 英国脱欧公投体现了英国精英和民众在欧盟目标上的矛盾情绪。对于所有的成员国来说,存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前者指向短期的经济利益,后者更多地关注未来。

2. 布鲁塞尔机器的本质

评论指向了对欧盟运行机制、效率、可靠性、诚实度的长期关注***。有评论指出,布鲁塞尔欧盟中央远离欧盟民众,而且以技术专家治国的方式运行。像之前所指出的,对欧盟中央的机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并不明确,因此人们期待专家治理的模式(传说中的政治中立)。因此,布鲁塞尔欧盟中央非常小(雇员很少),它的行动方式由其成员国所指引。因此,如果说它远离民众,那是由成员国构建它的方式与委托给他的任务所决定的。

还有评论认为,布鲁塞尔欧盟中央是腐败的,并举出了许多例子,如雇员工资的疯涨、议员过高的费用、官员的有偏见的招聘、对于庞大支出的监管不力,等等。是的,在过去,布鲁塞尔欧盟中央确实存在腐败。但是,现在人员和开销都受到了监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联盟这样的复杂机构,腐败事件可能会发生,因此,对这一机构要实行警察化管理。

关于布鲁塞尔欧盟中央人员过多、开销过大的批评并不恰当,事实上比起成员国,布鲁塞尔欧盟中央的雇员并不多,且很热情,与欧盟价值信仰相联姻,不愿意承认或对批评做出回应。

还有关于核心职员不够高效的批评,认为

* 这一集团被扩展到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首字母缩写为 PIGS,地地道道的侮辱,但在公众媒体中很流行。

** 关于公众对帝国解体的反应,参见 PRESTON P W. Britain after empire: constructing a post-war political cultural project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有关机构设置,参见 RICHARDSON ED J. European Union: power and policy making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所有的成员国都有一个理事,共有28个理事,但这些理事并没有尽责。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职能机构。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需要有自己国家的人掌管权力,因此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就成了各成员国输送冗余高级官员的地方。

还有关于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开销优先性的批评,认为布鲁塞尔欧盟中央大量的钱是从农业增值税而来,并且是优先用来稳定农业价格的。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批评。这使我们回想起此前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时,有很多农民因受到二战的影响,战后非常贫困,很需要食物。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新修订价格支持体系。

上述所有关于欧盟的争论(建议和批评)都在成员国内部起作用。这些成员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又引起了对欧盟的讨论。因此,可以概括地说欧盟政治在三个层面发生作用:欧洲、国家、亚国家(或地区)。这使得评价这些争论非常困难。因此,这些争论只是暂时性的争论,而不是原则性的争论。

制度的设计部分是为了使欧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加连贯和更加显著的作用,包括设置一名“总统”和一名“外相”。法国和荷兰公投的结果使这一进程戛然而止。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作为替代性条约,虽然弱化了制度性建设,但是保存了许多改革成果。条约是由成员国议会通过的(爱尔兰第一次公投没通过条约,第二次公投才通过条约)。但是一系列事件表明:持反欧盟立场的人还是不喜欢这一条约,他们认为这一条约是由精英主宰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毫无意义。

二、财政危机

2008年、2015年的金融危机源于华尔街和

伦敦的银行(后者中很多是前者的分支机构)*,投资银行利用天真的金融工具从事高风险策略,美国信贷市场的倒塌是危机的导火索,银行过量放贷,购房者过量借贷,随即非可持续性的信贷泡沫漫延开来。泡沫破裂,借贷者和银行都发现他们面临麻烦,前者丧失了钱财和房子,后者有数十亿美元的呆账坏账,这些问题威胁到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机构,美国和英国为了使银行摆脱困境,便利用纳税者的资金和信用。最初,人们认为欧洲大陆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是事实,欧洲大陆陷入了同样的投机性的信用泡沫。欧洲国家的银行,特别是德国和法国银行对地中海国家过量贷款,当信用泡沫发生时,这些国家面临数十亿的呆账坏账。这些债务记在了由欧盟机构提供资金的当地银行的记账本上。银行得以解困,但负担要那些国家的公民承担。欧洲大陆银行在缓慢地复活:成员国的行为受到欧盟规则的限制,事实证明,改变这一现状(例如允许欧洲中央银行的债务写到记账本上)非常困难。

关于成员国对此如何回应有很多争论,但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最普遍的反应是为银行重新制定规则(通过新的法规去阻止失控的贷款)。欧元区的成员国强调加强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所有的成员国被要求削减政府债务。

关于谁应当被指责、接下来做什么的问题,在舆论界引起了更严肃的讨论,在德国财政紧缩政策上引起了更尖锐的政治争论。德国政治阶层和地方经济学专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新的规则统治的自由市场,即奥尔多自由主义,也就是秩序自由主义,从而被错误地指向了凯恩斯主义偏好者的立场。德国政界和经济学家也对债务发行欧洲化表示反感(成员国都可以发行欧洲债券,享受低利率,而这些只对德国

* 英语国家的知识界和政策制定者评论,这一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帝国的终结,新自由主义常常遭到各种批评。

和北方的一些成员国有利)*。

对欧盟制度的批评意味着欧盟本质上是有缺陷的。欧洲中央银行并不是成熟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没有欧洲层面的财政政策,有评论者建议法国精英不要接受这一点,没有欧洲层面的机制来重新分配资金,德国政治阶层对帮助维持联邦制的资金转移充满敌意,在不同的经济层次上有更强或更弱的成员,正如美国在美联储和其他机构所做的那样。当今的后危机时代的紧缩政策使得原本贫穷的国家更加贫困。

希腊的例子经常被引用:拥有主权债务和糟糕的银行,寻求欧盟的帮助,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提高税收,降低福利),这一举措不仅违背民众意愿,也违背许多专业经济学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愿望,他们认为希腊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推测希腊的债务迟早会被免除。

三、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根源于1989—1991年。伴随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欧洲出现了新的政治解决机制:新的民族—国家模式与寻求国际关系的结合。这些事件也产生了全新的、独立的、在欧盟与俄罗斯的夹缝中生存的乌克兰,它贫穷、种族分裂,且动荡不安——该国一段时间的不稳定是与国内权力斗争伴随而来的,且当前仍旧不稳定,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外部干预并没起到什么作用,特别是早期欧盟和美国的帮助。**

对于欧盟来说,冷战的结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处理东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做法是邀请他们成为欧盟的成员。但是在成员国

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建构政治制度呢?这一问题存在争议(这一争议的焦点在于扩大欧盟的成员数还是继续加强既定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冷战后,欧盟开始向东部扩展,原本属于俄罗斯阵营的成员加入了欧盟,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与之伴随的行动是欧盟于2004年建立了睦邻政策,这一政策——一个用来处理与邻国关系的方法——意在扩大欧盟范围东部的国家(包括格鲁吉亚、美国等)或东南部的国家(土耳其)或南部的国家(靠近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政策包括与具有长远目标成为成员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援助联系。在此背景下,处在东部地区的乌克兰被包括进来。然而,对这些计划持批评意见者认为:布鲁塞尔并不明白这些联系从长远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效。乌克兰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与这样一个国家发生联系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不清楚的。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睦邻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确。

对于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心成员国的美国而言,苏联阵营的解体带来了欧洲的安全问题。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这里应当有一个安全框架。于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会)就作为欧洲转型组织***而出现,而北约则作为政治军事联盟而出现。前者依旧比较弱,其效能也受到质疑;而后者开始向东扩张。北约作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矛头直指俄罗斯,认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有可能成为新的成员国,北约应当为其负责。

* Streeck 在2016年评论到:像美国一样,德国精英集体认为对外部世界应当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自然的、理性的态度,他们对不能这样看问题的人感到困惑不解。

** 参见记者 Mary Dejevsky 在英国报纸上所撰写的 *The Independent* 一文。

*** 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建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连接起了两大阵营,有35个国家签名,1990年代,布达佩斯峰会使欧安组织得以扩展,现在由57个成员国组成,几乎覆盖了之前两大阵营的所有国家。

1989—1991年的乌克兰有很多问题。乌克兰的精英在叶利钦的混乱统治与苏联解体后,倾向于独立。作为独立的国家,有评论者指出,乌克兰是分裂的(分裂为西部、东部地区)、腐败的(寡头政治和弱的正式制度)、贫穷的(从正式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家在独立后的20年内似乎并没有多大发展,事实上,最近几年有更多的问题呈现。

乌克兰国内政治的一个方面是处理与近邻之间的关系,包括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在国内,有些地区喜欢西方,有些地区喜欢俄罗斯。乌克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交织在一起,使美国和欧盟都卷入其中,并给双方都带来了麻烦。2004年的“橙色革命”打破了亚努科维奇的亲俄力量的设想(建立在选举舞弊的基础上);公众抗议迫使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重新进行选举,使亲西方的尤先科执政。而在2010年的选举中,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外部势力开始干涉乌克兰内政。在这期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揽子援助,俄罗斯也向乌克兰提供了援助。开始总统喜欢欧洲,但是后来转向了俄罗斯。很快,2014年颜色革命爆发。

欧盟(睦邻政策)、非政府组织(开放社会等等)的行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行动都支持季莫申科革命。俄罗斯对这一革命进行了干预。乌克兰东部是俄罗斯民族,他们宣布地方独立。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以俄罗斯人为主,是俄罗斯主要的军事基地之一),结果爆发了持续时间很长的内战。西方国家把乌克兰的当前形势归咎于俄罗斯,但是另外一些评论意见认为,当前乌克兰的一些事件就像早些年的格鲁吉亚一样,对俄罗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2014年的《基辅协定》虽导致了“冻结冲突”的结果,使乌克兰的暴力活动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也没有出现解决问题的迹象。

四、移民问题

欧盟成员国公民可以在他们喜欢的任何地方工作、生活,这也是欧盟宪法框架里所规定的四个自由(人口、货物、资本、服务)之一。《申根条约》同意取消内部边界。这一安排的实际影响是不同的,就流动自由而言,是从东部、南部的相对贫困地区到西部、北部的相对富裕地区的内部流动。

在欧洲移民中,还有一些是非法移民,其主要来自中东、北非、撒哈拉和南亚。人员从外部涌入欧洲或者欧洲内部的人员流动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但新情况是:人口的流动引起了欧盟国家的焦虑,而欧盟中央所设想的人口流出国是遥远的、不民主的、对移民不感兴趣的。2015年大量涌入德国的移民所引发的问题使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人口的流动给德国带来了困难,并且产生了更加长远的影响。因此,在一些必须处理此类事情的国家产生了政治势力的右转倾向:在法国,强化了对马丽娜·勒庞的支持;在英国,则推动了脱欧公投。

二战后的欧盟成员国接收了大量移民,有些移民是由于冷战形成不同的阵营所引发的(人们从东部阵营向西部阵营移动),有些移民是出于公民权利、家庭团聚或避免在新建国家里受迫害的考虑而来的,有些移民则是被邀请来促进战后经济重建的(如工人们从南欧到北欧的流动,或从原殖民地到核心国家的流动)。移民虽对调整移民输出国与接收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1970年代后,由于移民接收国政府采取了控制移民数量的措施、鼓励多元文化主义,并出台了反歧视法,这些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但是最近,又有一些问题露出了苗头。例如,2005年,尼古拉·萨科齐(当时的法国内政部长)批评了法国的移民,引起了巴黎市郊的骚乱^[5];2009年,

意大利人反对来自东欧的罗马人^[6]。

2015年夏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边界向中东战争所产生的移民开放。所有这一切都被发生在2015年夏秋之交的事件所超越了,有新移民进入希腊,艰辛跋涉到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有1 015 078名移民从海上到达欧洲^[7]。在这些移民中,有900 000人是通过希腊进入的,远远超过了2014年的77 163人。其中,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的移民占到移民总数的88%以上^[8]。意大利2013年有移民42 925人,2014年有移民17 000人;2015年有移民153 842人。^[8]在这一时期,希腊、保加利亚、中欧当局面对大量涌入的移民无所适从。2015年的夏末和秋天,大约有100万移民进入德国。最初,德国人认为移民的涌入是件好事,直到在科隆新年前夕的庆祝活动上有一些本地妇女遭到强奸,精英阶层和媒体反应迟缓,这件事情为公众所知,精英阶层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对默克尔有了新的看法。与移民的涌入相伴的是责任分担、边界控制和土耳其问题的处理。于是,成员国修订了其边界管理办法与移民政策,试图控制、封锁和改变移民流动的方向。保加利亚重新竖起藩篱,严格限制跨越边界者;土耳其也努力限制移民的涌入。在2016年4个月的开放政策里,有185 000移民通过海上进入欧盟,比2015年下降了100万左右,主要输送国家有叙利亚(43%)、阿富汗(27%)、伊拉克(14%)、巴基斯坦(3%)和其他国家(9%)。在这些移民中,45%是男人,20%是女人,36%是孩子。^[9]

德国政府虽默许了默克尔的行为,帮助她克服了早期的错误,但评论者开始冷嘲热讽。默克尔与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土耳其达成了交易,包括给予土耳其钱财和其他利益,前提

是土耳其控制难民的流动。这一行动受到了批评,人们把这视为对令人讨厌的国家的行贿。然而,这一交易产生了新的问题:使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关联(欧盟问题、经济政策问题)。默克尔的行动导致了德国右翼势力的复活,她甚至被质疑是否有资格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袖(基督教社会联盟)。

这一大规模移民事件还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2017年的法国大选,作为民族主义者、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马丽娜·勒庞与支持一体化的自由主义者的埃曼努尔·马克龙进行角逐,而此前勒庞的支持率并不高。

法国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有许多关于他们受歧视的报道。法国当局确认公民共和主义的理想,不对民族成分和相关的数据进行搜集,并不直接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勒庞的支持率在第二轮投票中,占到了35%的比例,他们对这些群体根本没有同情心,而且不欢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法国的政治体制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大学(包含一些精英机构)培养了大量的行政精英,这些精英似乎是骄傲自满的,他们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对普通民众的诉求却不屑一顾。再加上经济问题——部分是由于流动引起的(东部劳动力的流入,生产力在东部的重新分配),以及欧洲货币问题,货币政策倾向于紧缩,也就是说,要缩减政府开支。这为民众反抗精英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轮选举中,有35%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民族主义政党。评论者认为,除非这些问题得以解决,而且像德国当局一样,但法国当局并没有改变欧盟中央银行现行规则的意愿和举措。因此,民族主义政党可能将在下次选举中获胜。*

* 法国选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这里的论证主要源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媒体,如 UK press (*The Economist*,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Guardian*), the French press (*Le Monde Diplomatique*) and the German Press (*Spiegel International*)。

整个欧洲的精英阶层对于移民问题反应迟缓,并且态度模棱两可。欧盟内部的移民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拥有自由流动的权利),而欧盟之外的移民或者是寻求避难,或者是签证超期,或者是被人贩子带到欧盟(跟欧盟内部移民并不相同),欧盟对这部分移民的态度不太明确,对其自由流动也未加明确限制。然而,当危机发生后,欧盟试图控制人口流动,加强边界管理并重新安置移民,并寻求控制移民涌入的长远之计。

公众的反应是不同的,移民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后,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来自社会组织的支持者,他们欢迎移民并为欧洲对新来者的包容而喝彩;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内部的人口流动有利于GDP的提高;来自政府官员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移民中年轻人占大多数可避免人口分布的老龄化。相反,反对者或者来自那些接受大量外国工人的社区,或者来自那些提供福利供给的地方政府,或者来自右翼共和党人士,他们认为移民逐渐成为一个公共问题。

欧盟大约有5亿人,因此同化100万移民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到来的方式和精英的反应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反对欧盟和欧洲精英,反对英国留在欧盟,主张英国举行脱欧公投。

五、英国脱欧公投

2015年欧盟似乎陷入了麻烦之中:东部有乌克兰问题,东南部有中东的阿拉伯陆地问题,南部有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地区问题。2016年,又出现了更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启动了脱欧公投,这次公投是由前首相戴维·卡梅伦支持发起的。这次公投是本土和欧洲的精英阶层都始料未及的,其结果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疑问):首相是怎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的?为什么民众投票反对欧盟?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2016年6月英国民众的脱欧公投结果使英国和欧盟的精英都感到惊讶。就像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脱欧公投似乎是民众对精英的反对。在欧洲大陆也有类似状况,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混乱。《里斯本条约》第50条规定,脱欧程序应当在两年内完成,但脱欧的具体细节并不是很清楚。这一程序从未被启动过,按照精英的设想,这一程序也不太可能采用。

同时,英国的政治辩论也在不断进行中。卡梅伦首相领导的政府被抛在一边,被特蕾莎·梅领导的政府取而代之。

2016年11月,特蕾莎·梅抛出了她的协商计划:《里斯本条约》第50条将在2017年初启动,还有《废除条例草案》,即废除1972年加入欧共体的法案;当脱欧完成后,《废除条例草案》将把现行的欧盟法律重新置于英国法律的框架中;政治司法大纲的所有经济/社会规则在英国各司其职,受到议会的监管,所有涉及英国与欧洲之关系的规则将由议会来协调。

尽管特蕾莎·梅的政治司法路线看起来似乎是比较清晰的,但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英国政府成立了主管脱欧事务的部门,这表明它在脱欧公投之前没做任何准备工作。其次,很明显,脱欧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很多关键问题,如脱欧的成本(英国向欧盟支付赔款的计划已在议会通过)、生活在欧盟其他国家的英国公民和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国家公民的现状(签证现状、获得医疗和福利的机会等)、欧洲法院将来的作用(在监督贸易合同方面)、后脱欧时代的贸易条件等。在2017年的选举中,持疑欧立场的支持者使得特蕾莎·梅获得了强有力的地位,但是想使英国脱离这样一个置身于其中40多年的国际组织,并非易事。

1. 英国加入欧盟的背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为现代国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对外扩张、科技、贸易和战争,保证了这一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繁荣。英国进入现代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为:精英建立了帝国,以宗主国为核心,与同它联系的附属和边缘国家形成一个包括不同层级的英联邦。英国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法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德国),但是英国的精英阶层认为,英国是与欧洲大陆相分离的,这种英国特殊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英国的政治文化之中。

二战的后果是1940年代后期帝国体系坍塌,边缘地区出现了反叛,中心地区政治发生了变化,制度被重新配置,中心国家被重新想象,作为长久的民族国家体系,原来的外围部分纷纷独立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恩·拉腊克曾评论说:英国丧失了帝国地位,但尚未找到新的定位。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英国的精英反对早期创建的组织,决心加入欧盟,1950年代掌权的贵族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递交了申请,但是被拒绝了。爱德华·希思(1970—1974)时期英国赢得了联盟成员国身份,而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深化了这一身份。约翰·梅杰则使这一身份得到更进一步确认,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斯本条约》对戈登·布朗签署的欧盟宪法的失败部分进行了技术上的编撰。可见,英国是在其帝国地位崩溃后,在封锁欧洲国家的企图失败后,在战后经济发展弱于欧洲其他国家时才加入了欧盟。

英国加入欧盟从未得到英国精英的一致认同,也从未得到英国民众的一致认同。在民众看来,英国加入欧盟,仅仅是狭义上的、经济意义上的加入,将欧盟视为贸易区域,而将欧洲大

陆希望的更深入的联盟解读为毫无意义的故作姿态,甚至被视为是对英国政治和文化的威胁。英国的勉强加入意味着欧盟要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英国的退出是始料未及的。联盟的成员国也有反对的声音。右翼把其与意识形态的主张相结合,把欧洲大陆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具有新自由主义萌芽的,并且具有怀旧色彩的。相反,左派认为欧盟是通过自由市场构建的。因此,欧盟作为一个政治联盟是分裂的,一部分是热情洋溢的,另一部分是不冷不热的,还有一部分是敌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无形中增强了英国独立党和反对欧盟的集团的影响力。

2. 2016年公投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下台后,在议会和乡村,保守党成员展开了反欧盟运动。新成立的独立人民党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欧盟。

在保守党内部,继任领导者渐渐对持反欧盟立场的势力让步,企图安抚反对势力,但是徒劳无益。最后戴维·卡梅伦承诺对这一问题进行公投——这一公投发生在2016年。脱欧和留欧阵营都为公投造势,媒体大量介入。保守党的一部分和英国独立人民党支持脱欧,他们强调重点在于收回对国家的控制权;精英和国际势力则支持留欧,认为脱离欧盟要付出很大代价。投票结果是51.9:48.1,赞成脱欧的势力获得了胜利。

3. 《里斯本条约》第50条相关规定

《里斯本条约》包含一个条款,这一条款虽对如何退出欧盟作了规定,但从来没被启用过。这一条款是这样规定的:第一步,成员国通知欧盟理事会(国家元首集团);第二步,通过协商达成退出协议;第三步,欧洲议会同意后,欧洲联盟理事会达成协议;第四步,退出协议生效后,成员国身份结束(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则在提出退出申请后,两年之内结束成员国身份);第五步,作为前成员国,应当与欧盟进行协商,

以形成新的关系,并付诸实践;第六步,继续留在欧盟的成员国更新现存协议。

上述规定虽在理论上是较完善的,但在实践上这一切都是未知的,因此政局将会很尴尬。

4. 英国脱欧的广泛影响

作为一个欧盟成员国,脱离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不愉快可想而知。在荷兰、法国、意大利和1/4的中欧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政党。在希腊和西班牙,左翼政党发挥着很关键的影响。最近30年,新自由主义精英共识处于高压之下。在过去,政治和制度进步总会带来危机。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独裁统治的结束带来了成员国的扩张,冷战的结束推动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并推动了成员扩张。因此,脱欧也许会成为压倒性的问题,会推动创造性的想法和新的政策的产生。

欧盟的现状与英国脱欧意味着欧洲被削弱了,精英被警告,他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会掌握政权。当下的问题需要被强调,欧盟机构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需要重新审视,其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和怎样存在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六、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承担的角色

欧盟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着广泛联系,其成员国在许多国际组织和在贸易、发展援助、安全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欧盟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并且得到了全球体系的认可。

欧盟在外交方面的作用以前虽不是很明显,但近年其作用在凸显,被称为“软实力”。欧盟的军事力量非常微弱,尽管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在海外也有一些军事力量,其介入海外事务时的身份要么是北约,要么是联合国,要么是特定的政府。欧盟也有建立防卫认同的计划,

但评论者的怀疑将会很快出现。

欧盟成员国与美国有着紧密联系,这些联系包括贸易、财政和安全。欧盟和美国在世贸中起着重要作用。欧盟和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着领导角色,欧盟成员国大多也是北约成员国;欧盟成员国和东亚的很多国家有多边贸易协议;欧盟与东亚国家有着越来越多的联系,它在亚欧会议上把东亚国家视为一个团体。

另外,欧盟与其前殖民地国家也有很多联系,在政府援助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联系似乎将持续存在,但其发挥更大外交和军事作用的愿望在短期内并不会实现,对解决当前欧盟的危机也并没有什么帮助。

七、欧盟未来展望

欧盟存在的50年,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些怪异,多重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系列制度的产生,而这些制度又促进了多重行动者的进一步联系。这种连锁反应看似是偶然发生的,但同时又是很棘手的。在过去,很难发现欧洲一体化逆转的迹象。但最近,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精英阶层承认,更加紧密的联盟关系在削弱,民众的情绪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欧洲一体化进程将会变得更为复杂。英国脱欧可能会加剧这种悲观情绪,英国的离开既可能导致其他有脱欧倾向的国家更离心离德,也可能促使精英们想办法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有评论者认为:整合将变得扑朔迷离。这意味着有些国家整合程度会更快,欧盟的危机使得欧盟与成员国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难民危机和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会使得现在的合作机制面临更大压力,民族主义的复兴将会激起公众对其他成员国的敌视。

2017年欧盟的前景似乎很暗淡,而那些自称精英的人似乎无法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然

而,尽管当下的形势并不乐观,但并没有迹象表明欧洲精英们要改变他们“使欧洲变得更加一体化”的目标。欧洲这一计划的道德和政治根基可以追溯到1914—1945年。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毁坏了欧洲大陆,使它被外部势力所占领,西方有美国,东部有苏联。正是这一灾难时期的集体记忆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道德和政治动力,但欧洲的政治精英应当做出切合实际的反应。

参考文献:

- [1] ROSAMUND B.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M]. London: Macmillan Palgrave, 2000: 45.
- [2] BLAIR A. The European Union since 1945 [M]. London: Longman, 2005: 96.
- [3] BALE T. European Politic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4] WOLFGANG S. Scenario for a wonderful tomorrow in London [J]. Review of Books, 2016(3): 7.
- [5]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法国骚乱[EB/OL]. (2006 - 10 - 24) [2017 - 10 - 10]. <http://riotsfrance.ssrc.org>.
- [6] BB C. Italy hornby racial strains [EB/OL]. (2009 - 2 - 4) [2017 - 10 - 10]. <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7858012.stm>.
- [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 避难者—移民应急响应—中东[EB/OL]. (2016 - 05 - 07) [2017 - 10 - 10]. <http://data.unhcr.org/mediterranean/regional.php>.
- [8] IOM. World migration report [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6: 12.
- [9] UNHCR. Regional refugee and migrant response [EB/OL]. (2016 - 12 - 01) [2017 - 10 - 10]. <http://www.unhcr.org/partners/donors/58949-7d07/2017-regional-refugee-migrant-response-plan-europe-january-december-2017.html?query=%20Refugees/Migrants%20Emergency%20Response>.



引用格式: 从缅甸民主化进程看美缅关系的发展[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1): 76-8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1-0076-09

从缅甸民主化进程看美缅关系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from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Burma

曹国良

CAO Guoliang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通过构建缅甸民主化程度与美缅关系发展之间的解释框架,从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和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两个方面考察缅甸民主化程度与美缅关系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缅甸的民主化程度是影响美缅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缅甸的民主化程度高则美缅关系发展较好,缅甸的民主化程度低则美缅关系发展较差。可见,人权外交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美国以自身的价值观划定“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中的国家可以享受其作为超级大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不在这个“朋友圈”中的国家修正自己的内政外交行为,以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从而搭上美国的“便车”;反过来,美国通过经济、军事、技术援助等手段进一步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

关键词:
民主化;
政治改革;
经济援助;
美缅关系

收稿日期: 2017-12-20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7YCX001)

作者简介: 曹国良(1992—),男,河南省巩义市人,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弱化民主、人权等观念,轻视东盟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等。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步转向孤立主义,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用美国的利益至上取代全球主义;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在反思自己的外交布局,重新定义东南亚在其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应看到,特朗普对于奥巴马的东南亚政策并没有全盘否定,“除了贸易和人权,特朗普还是延续了奥巴马时期介入亚太的外交政策”^[1],从特朗普上台后与东南亚国家间高层次的互动可以看出,东南亚在美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丧失^[2]。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维克拉姆·尼赫鲁曾指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美国传统的东南亚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在经济和地区治理方面发展得并不均衡,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框架,从而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一种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更全面、更深层次的关系”^[3]。这是奥巴马时期美国调整其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积极改善和增强与东南亚各国间的关系。以东盟十国为例,按照与美国关系的亲疏程度大概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为盟友国家,一类为非盟友国家。美国与东南亚盟友国家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重要的非北约盟友”——菲律宾和泰国;第二层次是美国安全利益的亲密伙伴、准盟国——新加坡;第三层次是特别关注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4]美国在东南亚的非盟友国家包括文莱、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其中,文莱为君

主制国家,国家实力有限且奉行不结盟和同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为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强大攻势下,美国高层不断出访以上三国且互动频繁,面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老挝、柬埔寨并没有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的关系也未受到很大冲击。而缅甸对改善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则十分迫切,并且已作出实质性的举动。鉴于此,本文拟探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美缅关系因何得到了缓和与改善,以求教于学界。

一、美缅关系改善的原因:现有研究与不足

对于美缅关系改善的原因,中外学者进行了多种解读,综合考察现有研究文献,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美国反思对缅制裁说”“配合重返亚太战略说”“昂山素季个人因素说”等。

1. 美国反思对缅制裁说

1948年美国与缅甸建交后,双边关系时好时坏,美国也不时以民主、人权问题为由对缅甸实施制裁。有学者认为,今日美缅关系的改善是美国出于对缅甸制裁效果的反思:一方面,自1988年对缅甸实施制裁以来,美国并没有实现帮助缅甸建立民主政权的目标,结果反而加重了缅甸民众对美国的怨恨情绪;另一方面,制裁造成了美国在缅甸的利益弱化,进而把缅甸推向了亚洲其他国家。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建交后的美缅关系一直是在好与坏之间波动,如果上述解释能够成立,那么美国在1962年首次对缅甸实施制裁后就应反思其效果,从而实现美缅关系的平稳发展。

2. 配合重返亚太战略说

不少学者在分析美国调整对缅甸外交政策的原因时会把其放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认为调整对缅政策是美国重新布局外交重

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虑。这种分析并没有理清美国调整对缅政策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将美国改善与缅甸关系、逐步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看作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表现,因而难以站得住脚。

3. 昂山素季个人因素说

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大卫·斯坦伯格教授认为,“昂山素季塑造了美国的对缅态度”^[5],是昂山素季的个人魅力和美国民众对于昂山素季的广泛支持,致使昂山素季的观点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制定对缅外交政策的基础。此说也很牵强。事实上,美国改善对缅关系虽然确实考虑到昂山素季的个人因素,但也不应过于拔高。分析国际关系一般是将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决策者个人层次结合起来作综合分析,微观层次上的研究虽然会比较精确地发现具体的行为,但是很难发现系统变化的一般性规律^[6]。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观点外,也有学者把美缅关系改善的分析重点放在缅甸国内的形势上。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容根·哈克教授就指出,伴随着内比都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奥巴马正在采取行动重新调整美国的对缅政策,美缅的双边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但该研究并没有对缅甸国内的民主政治改革进行系统分析,将其与美国对缅政策的调整联合起来同样牵强。

中缅关系的定位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伙伴关系的层级上来看,中缅关系是仅次于中俄关系和中巴关系的^[8],缅甸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决定了缅甸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价值。而随着缅甸国内改革进程的加快,其在对外政策中不断通过引入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来平衡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从而逐步减弱缅甸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也就是说,平衡乃至削弱中国对缅甸的影响,有

可能是美缅关系改善的原因之一。

二、美缅关系改善:理论分析

通过对美缅关系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缅甸的民主化程度与美缅关系存在着某种相关性,下文将从可操作角度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民主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学界已有广泛的讨论,总体而言,民主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定义:一是从哲理上确定政治民主,这里指的是一种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人民进行统治,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经过他们自己或他们选出的官吏行使这项权利;二是全体人具有平等权利,不存在世袭或专制的差别,每个人享有法律赋予的自由权,尊重人的尊严,建立充分和自由的沟通,并且注重人的发展。^[9]现代民主政体需要满足四项最低标准:(一)行政和立法机关是公开、自由和公平选举出来的;(二)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投票权;(三)公民享有被法律保护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包括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不受报复的批评政府的自由等;(四)民选当局拥有真正的统治权,他们不受军人或神职领导人的控制^[10]。罗伯特·达尔从民主权利的视角指出民主至少要满足五项标准,即“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资格。”^[11]本文所讲的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政体,它区别于罗伯特·达尔定义的民主权利或议事规则。

美缅关系好坏程度的衡量指标主要通过测量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获得。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的无偿或优惠的货物或资金,用以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以达到援助国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12],援助的数量与频次能大体反映援受双方关系的亲疏。二

战后,美国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战略考量,将对外援助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尽管有学者批评美国的对外援助“披着政治色彩浓厚的外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帮助受援国(国家集团)解决政治经济困难、维护地区稳定方面还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另外,分析美国对受援国(国家集团)援助的差异和变化,也可以看出美国与该受援国(国家集团)关系的亲疏。美国的对外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技术援助等,本研究主要分析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大部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承担,除此之外美国的农业部、国务院等部门也会参与其中。本研究中,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数据主要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向美国国会所作的报告和由此编制的绿皮书《美国海外贷款和赠款》中获取。

将国家间互动的具体事件进行赋值并作数据分析,是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基本方法。事件的获取主要来源于相关国家公开发布的可靠信息和数据,例如,衡量中国与大国的双边关系,选择《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事件数据就可基本满足需要^[13]。从研究的逻辑上看,把对外援助作为衡量美缅关系好坏的指标是很有说服力的。一方面,美国对外援助的实施机构都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国防部、农业部、财政部等联邦政府部门构成的,这些部门是在以美国《对外援助法》为基础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所以美国的对外援助具有很明显的官方性质,这种官方性质不仅包括行政部门,而且包括立法机构;另一方面,美国对外援助通常带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色彩,这也恰恰佐证了美国提供经济援助与缅甸的民主化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1. 缅甸的民主化程度

根据1947年1月英缅两国签订的《昂山—艾德礼协定》,缅甸于1947年4月举行制宪议

会选举并于9月24日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缅甸联邦宪法》(也称1947年宪法)。该宪法规定,缅甸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制”^[14]⁶⁰，“缅甸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是联邦国会,缅甸联邦的行政权授予以总理为首的内阁组成的联邦政府”^[15]。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并解散联邦国会,缅甸结束了议会民主制进入军人统治时期。政变发生后,奈温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体制,各级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同时奈温还成立了社会主义纲领党,纲领党的主要对象是部队成员,因此,“纲领党与以奈温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义的”^[16]。联邦革命委员会明令取缔社会主义纲领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并宣布政府有权禁止除宗教团体外任何团体的政治活动。1973年,缅甸以社会主义纲领党一党制为基础制定了新宪法(宪法于次年生效,故又称为1974年宪法),新宪法规定缅甸国家机构由人民议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组成。1974年3月,缅甸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人民议会并在人民议会的基础上产生了新政府,同时革命委员会宣布解散。1988年9月18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平息了动荡不安的局势并解散了人民议会和各级行政机构,随后宣布由军人组成的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军政府严厉镇压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拒绝交权于在1990年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全国民主同盟。^[17]2003年8月,缅甸军政府对外公布了推进民主进程的民主路线图,具体步骤为:“第一步,重新召开1996年中断的国民大会;第二步,国民大会召开后,逐步开始各项工作进程,建立一个真实的、有充分秩序的民主制度;第三步,按照国民大会制定的基本原则起草新宪法草案;第四步,举行全民投票,通过宪法草案;第五步,举行大选,组成议会;第六步,根据新宪法规定召开议会;第七步,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

人、内阁及权力机构领导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18]2008年5月,《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公投通过并批准生效,新宪法规定缅甸实行多党民主制度,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14]61-62}。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大选,产生了新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于次年2月选出了民选政府,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主席吴登盛当选为总统,标志着缅甸民主路线图的最终完成。吴登盛执政后,缅甸政治体系的运转逐步走向正常,长期遭受监禁的缅甸民权运动领袖昂山素季获得释放并在2015年的全国大选中领导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

根据上文对缅甸1947—2015年民主化进程的梳理,结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A.威对民主的定义和衡量标准,通过定性分析制得1947—2015年缅甸民主化程度演变表(见表1),通过分别整合5个时间段的衡量指标,我们可以判定:1947—1962年和2011—2015年两时段缅甸的民主化程度最高,1963—1973年和1989—2010年两时段缅甸的民主化程度最低。

2. 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

1950年9月,美国和缅甸签订了第一个《美缅经济合作协议》,从协议签订到1962年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向缅甸提供了一系列的经济援助,包括贷款、赠款、农业设备、技术培训等,这对建国初期缅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62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此后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急剧减少但并没有完全停止:一方面,美国国际开

发署继续投入资金支持在建项目的建设直至项目完成,如1966年美国和缅甸签署了一份贷款偿还协议支持缅甸学校和医院的建设^[19];另一方面,奈温迫于国内的经济压力于1978年要求恢复与美国的援助/被援助关系,美国同意后重建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缅甸的办事处,但此时美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卫生方面。1988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美国于次年再次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缅甸的办事处。美国国际开发署编制的绿皮书《美国海外贷款和赠款》显示:1990—1995年的5年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额为零。从1998年开始,美国国际开发署逐步恢复了在缅甸的卫生援助项目,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和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支持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的预防^[20]。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大量投入是在缅甸2010年大选后,尤其是吴登盛当选总统后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让美国对缅甸“充满信心”。2011—2012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和总统奥巴马先后访问缅甸,奥巴马在访问缅甸期间宣布“今明两年将向缅甸提供1.7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同时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缅甸代表处揭幕”^[21]。2016年10月7日,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宣布自1997年以来在缅甸境内的国家紧急状态终止,标志着美国解除了对缅甸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编制的绿皮书《美国海外贷款和赠款》,绘制1947—2015年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变化统计图,见图1。由图1可知,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大致分为5个阶段:1947—1962年美国

表1 1947—2015年缅甸民主化程度演变表

民主衡量标准	1947—1962年	1963—1973年	1974—1988年	1989—2010年	2011—2015年
行政和立法机关是否通过民选产生	是	否	是	否	是
是否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投票权	是	否	是	否	是
公民是否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是	否	否	否	是
民选当局是否拥有真正的统治权	是	否	否	否	是

对缅甸的经济援助波动较大但总体援助程度较高;1963—1973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4—1988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程度较高;1989—2010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程度整体较低,其中1999年之前援助额基本为零,1999年以后援助逐步增加;2011—2015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程度较高。

3. 缅甸民主化程度与美缅关系的发展

通过对照表1和图1,我们可以发现,缅甸的民主化程度与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呈正相关关系,即缅甸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则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额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究其原因,在于缅甸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契合了美国对别国的外交政策和人权状况的判定标准,也解除了美国对受援国掌权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怀疑。

一般认为,美国的人权外交开始于卡特政府,1977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到:对人权的承诺和保证是今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22]。但是美国在外交战略中融入人权因素并非始于卡特,而是早已有之,比如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相关的3

项基本法律条款(502B条款、116条款、701条款)都是与人权相挂钩的,其中第116条款就明确规定:“对于不断地、大量地参与侵犯国际上承认的人权的国家,美国不得向其提供援助。”^[23]³¹。1962年和1988年缅甸两次军事政变发生后,军政府解散民选政府并剥夺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系列行为是和美国人权外交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的,因此以1962年和1988年为时间节点,此后两个时段(1963—1973年和1989—2010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大幅减少。缅甸建国初期实行议会民主制,以及2003年公布民主路线图等推进民主化的努力让美国产生并增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因此1947—1962年和2003年之后这两个时间段,美国对缅甸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24]缅甸民主改革的最重要意义就是解决了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与军政府执政时的专制政权或威权体制不同,民选政府一方面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疏通了公民参与国家政权的通道,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扩大和巩固了政府的执政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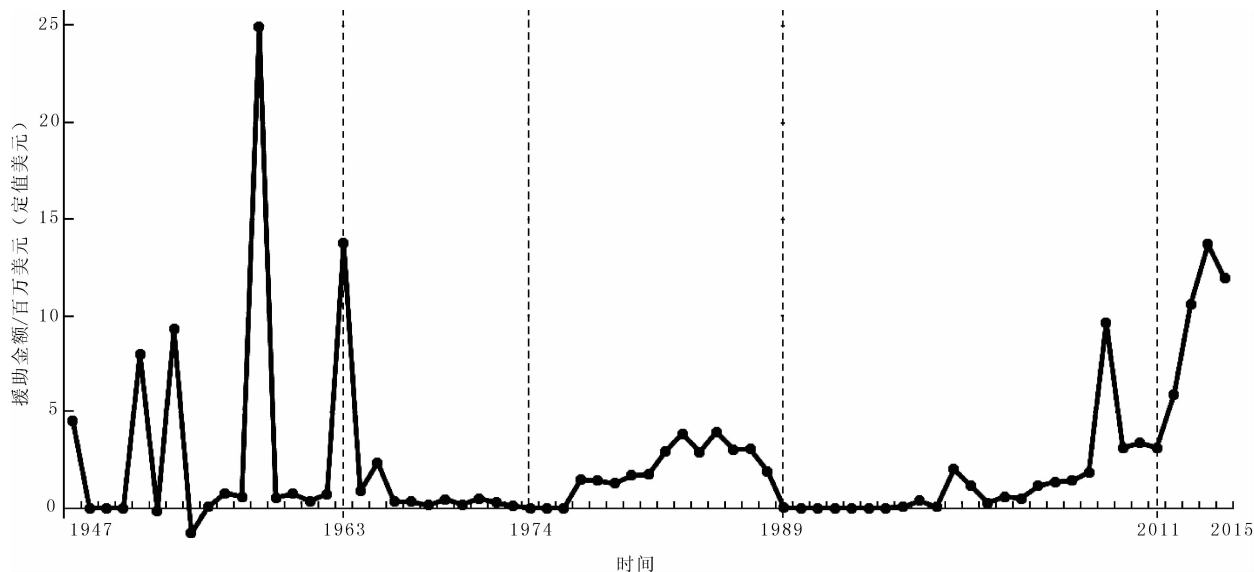


图1 1947—2015年美国对缅甸经济援助的变化情况示意图

与非民主政府相比,民主政府在决策时更加理性,其中安全和发展又是理性的两个主要维度。在安全方面,由于吸收了不同党派、不同利益团体的意见,民主政府的外交决策不会特别激进而会倾向于平缓;在发展方面,经济利益最大化是民主政府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反映到外交政策层面就是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从而保证自由贸易的顺利开展。结合美缅关系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民选政府时期,缅甸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非常重视同其他国家维持和改善关系,因此美缅关系就比较好,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额也比较大。

三、美缅关系改善:实践检验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美国与缅甸的双边关系,由于研究对象为单一案例,无法进行大样本的求同比较,所以我们采用案例内求同求异比较的检验方法。通过文献回顾和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影响美缅关系发展的变量主要包括3个,即国际体系格局(体系层次)、美国的战略重心布局(国家层次)、昂山素季是否参与缅甸政治(个人层次)。美缅关系案例内正向求同比较排除了国际体系格局的影响,美缅关系案例内反向求同比较排除了美国战略重心布局和昂山素季个人的影响,美缅关系案例内求异比较进一步控制了以上3个变量对美缅关系的影

响(见表2)。

通过对美缅关系案例内的求同求异比较,证实了我们上文所提出的观点,即缅甸的民主化程度高则美缅关系发展较好,缅甸的民主化程度低则美缅关系发展较差。下面我们将通过对1947年至今的美缅关系的梳理,来进一步印证这一结论。

1947年1月,缅甸与英国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英国同意缅甸独立。根据该协定,英国同意缅甸在充分独立前可以组建一个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临时政府,在缅甸完全独立前的1947年9月18日,美国国务院就宣布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谈到,美缅两国政府同意以大使身份互派外交代表并把美国驻仰光总领事馆提升为大使馆的地位^[25]。美缅建交后双边关系并不稳固,波动较大,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1948—1962年。缅甸实行议会民主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26]109},美国对缅甸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此间的美缅关系态势良好;(2)1963—1973年。由于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缅甸进入军人政权时期,“政治上实行近乎沙文主义的集权统治,外交上实行严格的中立政策”,缅甸此举让美国非常反感,两国关系因此趋于冷淡;(3)1974—1988年。1973年后缅甸逐步对西方实

表2 美缅关系案例内求同求异比较

比较类别	案例	缅甸民主化程度	反向控制变量	美缅关系友好程度
正向求同	1947—1962年美缅关系	高	美国战略重心不在亚太地区	高
	2011—2015年美缅关系	高	美国战略重心在亚太地区	高
反向求同	1963—1973年美缅关系	低	体系格局为两极格局昂山素季不参与缅甸政治	低
	1989—2010年美缅关系	低	体系格局为一超多强格局昂山素季参与缅甸政治	低
求异	1947—1962年美缅关系	高	体系格局为两极格局美国战略重心不在亚太地区昂山素季不参与缅甸政治	高
	1963—1973年美缅关系	低	体系格局为两极格局美国战略重心不在亚太地区昂山素季不参与缅甸政治	低

行开放^[27],一方面借助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机会加强与西方的接触,另一方面“开始争取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外国援助,恢复与各国的对外交往”^[26]¹¹⁴,美缅双方高层互动频繁;(4)1989—2010年。缅甸军方于1988年通过流血政变执掌政权,在1990年大选后又拒绝交权于获胜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17],缅甸军方对人权和民主的严重侵犯,使得美国以缅甸存在民主、人权和毒品问题为由不断加大对其制裁,两国关系走向恶化;(5)2011年至今。2010年10月缅甸举行大选并产生了新一届联邦议会,2011年2月联邦议会选举产生了以吴登盛总统为首的准文职政府,结束了缅甸的军事统治。缅甸的举动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美国恢复了与缅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重新发挥其国际开发署在缅甸的作用,支持国际金融机构为缅甸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放松对缅甸的经济和投资制裁,同时也增强了双方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的互动”^[28],最终奥巴马政府于2016年10月宣布终止针对缅甸的《国家应急法》,解除对缅甸的相关制裁措施。

在上文中,我们将美缅关系的发展历程划分为5个阶段,但是在验证时则只囊括了4个阶段,没有包含1974—1988年阶段。这一阶段属于奈温军政府统治的后一时期,相较于前一时期(1963—1973年),奈温军政府进行了一定的政治改革并且在对外关系上也逐步恢复同西方国家的交往,所以从图1中可以看到,1974—1988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相较于前后两个时期是较高的,但由于这种改革是有限的,因此从图1中也能够看到这一时期美国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相较于1947—1962年和2011—2015年是较低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四、余论

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权外交仍

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人权外交中,美国以自身的价值观划定“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中的国家可以享受其作为超级大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不在这个“朋友圈”中的国家修正自己的内政外交行为,以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从而搭上美国的“便车”;反过来,美国通过经济、军事、技术援助等手段进一步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始终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立的另外一种表达就是国家利益优先还是道德优先”^[23]⁴⁷,更进一步说,现实主义主要指的是安全和经济,理想主义主要指的就是人权。特朗普上台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今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淡化人权的概念,同时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等国际主流社会的协议,这一系列反全球化的行为,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逐步走向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正逐步参与全球治理并努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表现。对于中美之间目前出现的这种差异,官方和学界都应理性看待,一方面应努力抓住并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进行外交决策时也应科学规划和论证。

参考文献:

- [1] JOSHUA K. Except for trade and human rights, Trump hasn't upended U. S. policy in Asia yet [EB/OL]. (2017-06-17) [2017-07-10].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
- [2] AARON L C. Trump and Southeast Asia: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EB/OL]. (2017-06-22) [2017-07-17].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
- [3] VIKRAM N. Obama in Southeast Asia: Symbolism or Substance? [EB/OL]. (2012-11-17) [2017-07-2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 [4] 费昭珣. 同盟理论视角下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关系[D]. 广州:暨南大学,2009.
- [5] DAVID I S. Aung San Suu Kyi and U S policy toward Burma[J].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10(3):35.
- [6] 秦亚青. 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J]. *欧洲研究*,1998(3):9.
- [7] JÜRGEN H. The United States and Myanmar: from antagonists to security partners? [J].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5(3):55.
- [8] 门洪华, 刘笑阳.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2):84.
- [9] 王沪宁. 政治民主和政治稳态的相关分析[J]. *政治学研究*, 1989(1):38.
- [10] STEVEN L, LUCAN A. Way,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2):51.
- [11] 罗伯特·达尔. 论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43.
- [12] 宋新宁, 陈岳.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16.
- [13] 阎学通, 周方银. 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6):93.
- [14] 李晨阳, 古龙驹. 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2008年)[J]. *南洋资料译丛*, 2009(1):60.
- [15] 贺圣达. 缅甸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455.
- [16] David I S. Burma under the military: towards a chronology [J].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981(3):244.
- [17] 刘德会. 美缅关系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影响[J]. *东南亚研究*, 2014(1):40.
- [18] 杜继锋. 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4)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125.
- [19]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USAID assistant in Burma [EB/OL]. (2016 - 07 - 08) [2017 - 08 - 05]. <https://www.usaid.gov/burma/history/>.
- [2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relations with Burma: U S assistance to Burma [EB/OL]. (2017 - 01 - 27) [2017 - 08 - 10]. <https://www.state.gov/>.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商贸关系司网站. 美国将在未来两年对缅甸提供 1.7 亿美元援助[EB/OL]. (2012 - 11 - 21) [2017 - 08 - 10]. <http://gjs.mofcom.gov.cn/article/feihuiyuan/>.
- [22] Jimmy C. Address at commencement exerci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EB/OL]. (1977 - 05 - 22) [2017 - 08 - 14].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
- [23] 周琪. 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J]. *美国研究*, 1998(1):21.
- [24] 俞可平. 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3):47.
- [25]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 guide to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of recognitio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lations, by country, since 1776: Burma [EB/OL]. (2015 - 04 - 03) [2017 - 08 - 17]. <https://history.state.gov/countries/burma/diplomatic-relations>.
- [26] 刘务. 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缅关系的发展[J]. *当代亚太*, 2010(1):109.
- [27] 貌貌季. 1962年以来的缅甸外交政策——为维护集团生存的消极中立主义[M].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1981:86.
- [28] 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information: U S relations with Burma [EB/OL]. (2014 - 05 - 11) [2017 - 08 - 22]. <https://www.state.gov/>.



引用格式:姬建敏. 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1): 85-93.

中图分类号:G23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85-09

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 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研究

Study on the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journals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opening and reform

姬建敏^{1,2}

Ji Jianmin

1.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 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突出的10年。审视这10年走过的历程,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其发展的政治环境,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期刊出版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回观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发展历程,1978—1981年是其调整恢复期,1982—1988年是其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办刊宗旨、文章内容、学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等均坚守了其学术性的本色,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繁荣。从1978年开始,在我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关注社会现实,记录时代律动,在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依托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和地域特点,形成期刊特色,对学校建设和区域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社会环境;
发展状况;
学术特色;
学术贡献

收稿日期:2018-01-05

作者简介:姬建敏(1964—),女,河南省偃师市人,河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编辑出版。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从“文革”结束时的小树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森林,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综观学界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研究,除了宋应离编著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和马宇红编著的《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简史》对高校学报(既包括社会科学学报,也包括自然科学学报)进行研究外,还没有见到专门研究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专著出版;至于论文,在中国知网用篇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查询,也少见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110多年历史的系统研究,甚至连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的研究都没有看到。鉴于此,本文拟对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文中除特殊需要标注相关学报版别的,其他不再一一标注)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以期助力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研究与发展。

一、办刊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期刊发展的先决条件。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审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环境,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其发展的前提,高等教育秩序的恢复与迅猛发展、社科学术研究与编辑出版业的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

1. 政治环境: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成为第一要务。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必须以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先导。而当时由于“文革”10年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还没有消除,也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拨乱反正受到了严重阻碍。1978年5月,一场席卷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针对“两个凡是”,文章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经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不应再坚持。文章见报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引起强烈反响。不久《解放军报》与此呼应,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大讨论不仅有力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舆论准备。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2. 学术环境:高等教育与期刊出版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既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制约,也受制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文革”10年,高考中断,人才断流,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包括教育秩序都处于混乱甚至是荒诞之中。1977年9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渴求知识、渴望成才的七七届、七八届新生涌入大学校园,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

前人人平等;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复苏、教育秩序和知识价值的回归。之后的几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加,本科教育制度、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广大高校师生思想解放,意气风发,有理想、有追求、有思想、有激情,不仅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刻苦学习,而且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且不说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仅就当时的学生来说,就发表了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史学月刊》(河南大学主办)前主编李振宏,1980年还是河南大学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在《文史哲》发表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对宋史权威漆侠的观点提出质疑。^[1]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沈卫威,1984读大学三年级的时期,就在《河南大学学报》发表处女作《端木蕻良和他的〈科尔沁旗草原〉》。^[2]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1980年代读硕士时也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3]《史学月刊》^[4]上发表过文章。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盛产“大家”的年代,而这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在那个刚刚结束书荒、刊荒的年代,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压抑已久的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出版业迎来了井喷式的大发展,图书、期刊、报纸等以几何级数增长,期刊出版空前繁荣。1985年,中国期刊发行总数25.60亿册,全国人均期刊占有量首次突破2册。^[5]¹⁷⁹不仅数量“疯长”,而且种类多样化、多质化。以学术期刊中的高校社科学报为例,1981年,全国有近200种;1987年10月,已达393种;1988年8月,增至410多种。^[6]²⁸⁷⁻³⁰²

可见,在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高校的社科学术期刊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借助高等教育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兴盛、期刊出版的繁荣,在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迎来了第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二、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展状况

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110多年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7],那么,相对于其他阶段而言,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则颇为顺利。1976年“文革”结束,由举国欢庆、百废待兴到拨乱反正、短暂调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一如各行各业一样迅速走上快车道。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历程,1978—1981年是恢复调整期;1982—1988年则是快速发展期。

1. 恢复调整期

“文革”10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977年,在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时代大潮裹挟下,遭到破坏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逐渐恢复。1978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同时召开了高校学报工作座谈会并制定了《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成为我国基本国策。这不仅促使“文革”中被停办的高校学术期刊得到尽快复刊,而且也催生出一些新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0年底,我国高等学校编辑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55种。其中综合性大学学报31种,师范大学(含师范学院)学报49种,师范专科学校学报47种,语言、财贸院校学报17种,政法院校学报2种,民族院校学报6种,艺术美术学院学报3种。在这些学报中,直接冠以校名的学报约130家,另取新名的有近30家,著名的如云南大学的《思想战线》、山东

大学的《文史哲》、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北方论丛》等。^[8]1980年代初,我国大学学报不仅数量多、门类全,而且还有自然科学版与社会科学版之分、综合性与专业性之别。专业学报又分财经类、政法类、管理类,等等,盛况空前。

与高校社科学报一样,这一时期的高校专业学术期刊也处在复刊、创办、发展期。以北京大学为例,1978年,法学院创刊了《中外法学》,南亚研究所创办了《南亚研究》;1979年,经济学院创办了《经济科学》;1980年,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国际政治研究》;1981年,外国语学院创办了《国外文学》,图书馆创办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等。还有一些在今天颇有影响的名刊大刊也在这一时期创刊。例如,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创刊的《比较教育研究》,上海财经学院创刊的《外国经济与管理》;1980年,武汉大学创办的《图书情报知识》;1981年,复旦大学创刊的《新闻大学》,等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期。

2. 快速发展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各条战线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喜人局面。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经济上的持续发展、稳定上升,给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包括出版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198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出版物的商品属性,解放了出版生产力;1984年,思想文化领域全国性的“文化热”逐渐达到高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许多省市和地区的社科期刊工作者先后成立了诸如期刊协会、编辑学会、学报研究会等组织,许多高校的院、系、所先后创办了出版社、杂志社,出版各种类型的学习杂志、专业研究杂志等,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迎来了快速发展的“疯长期”。以高校社科学报

为例,继1978年的武汉大学会议以后,1984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座谈会”;1988年11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前者对如何进一步办好高校社科学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指示,后者结束了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一盘散沙”的局面。在教育部社科司的直接领导下,在行业组织“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引领下,1980年代不仅国家直属重点高校、部属高校、省属高校办有自己的学报,而且地处偏远地区的师专、师范,以及改革开放后才批准成立的地方大学,也基本上都办有自己的学报,并且有些还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如《楚雄师专学报》、《呼兰师专学报》、《思茅师专学报》、《保山师专学报》、《阴山学刊》(包头师范学院主办)、《深圳大学学报》、《平原大学学报》等。它们的出现,壮大了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队伍。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代的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从1981年的150余种、1983年的208种、1985年的277种、1986年的360种、1987年的393种,增加到1988年的440种^{[5]235}。截至1987年10月,高校文科学报已达393种,到1988年8月,增至410多种,全国大学学报总数超过1000种,不仅比1978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占全国6200种期刊的1/6左右。^{[6]302}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期刊,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1986年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是1987年创刊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与实验》是1983年创刊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是1985年创刊的,《教育学报》是1988年创刊的。另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出版科学》(1986年试办)、湖南师范大学的《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东北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创刊)、中国传媒大学的

《当代电影》(1884年创刊)、吉林大学的《当代法学》(1987年创刊)、山东大学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4年创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外语教学》(1985年创刊)、南开大学的《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创刊)等,都是这一阶段创办的刊物。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创办之多、发展之快,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以最新公布的CSSCI来源期刊为例,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共收录社科学术期刊554种。据笔者统计,在这554种来源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有289种,占比52.17%;而在这289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中,1978—1988年创刊的有153种,占比52.94%。也就是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数量已过半;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创刊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比此前100年创刊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数量之和还要多。这里且不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的分量和影响有多大,只说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创办的数量之多,就在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110年的历史中让人叹为观止,其对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奠基之功不言而喻。

三、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特色与作用

出版物以内容为王,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内容与质量,从一定程度上说决定着它的前途与命运。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从内容上看,尽管还受到“左”的影响,没有完全挣脱政治对学术的羁绊,但已开始最大程度地追求学术性,探索学术话题,回应现实社会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其特征鲜明,作用突出。

1. 回归学术,促进学术繁荣

学术期刊的标志、特征和本质都是学术。“文革”10年,大多数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游弋于

学术与政治之间,少数甚至以政治代替学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邓小平提出了“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9]之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开启了从政治回归学术、以学术为本的办刊理念,促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自由开放的学风、文风、刊风在1980年代的流行。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办刊宗旨方面。以1987年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为例,其创刊号《发刊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进行创造性的探索,欢迎对于现实问题所进行的一切有益的探讨,为那些在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档案学、管理学等一切社会科学领域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补充新论据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地,努力促进开发新学科、推广新思想、树立新学风,并注意在这一过程中扶植新人。^{[5]232}其不仅强调学术——“研究……新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而且突出创新——“为那些……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补充新论据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地”,尤其是一个“创造性”和几个“新”字,对学术创新的重视和以学术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其实,办刊宗旨作为期刊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大纲,代表了期刊的主导思想,反映了期刊的灵魂。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其他重新复刊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和新创办的期刊,复刊词或发刊词大多秉持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思想,强调创新,看重创新。比如,1980年创刊的《高

等教育研究》(华中工学院主办)突出高等教育的研究性质,刊发高等教育综合研究的新成果;1981年创刊的《社会》(上海大学主办)则重点刊发国内外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1982年创办的《科技与出版》(清华大学主办)融科技、出版于一体,着重新内容、新信息的传播;1884年创刊的《当代电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注重刊发有关电影理论、电影创作的思考与探索的成果。可见,这些刊物不仅从办刊宗旨上凸显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创新的品位,而且彰显了为学术发展、学术繁荣服务的理念和气度。

二是在文章内容方面。在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表了一大批学术性、理论性都很强的研究性文章。比较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刊发的《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不仅具有强烈的学术色彩,而且被公认为是正确的政治导向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完美结合的代表;《复旦学报》1978年10月复刊号刊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被《人民日报》转载、被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肯定,“是一篇富于时代性和学术性的力作”^[10]。另外,《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的《信息智化编辑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和1988年第3期发表的《文化缔构编辑观》,以及《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发表的《太平天国并不是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和1985年第3期发表的《河南回族分布的历史渊源》等文章,内容极具创新性、学术性;《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刊发的《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被公认为“文革”后最早为胡适的红学给予实事求是评价的少数论文之一^[11];《文史哲》1984年第1期策划刊发的5篇“文化史研究笔谈”,呼吁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把历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史、政治史的做法,要求大力加强对于文化史与传统

文化的研究,被认为是1980年代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起点。^[12]这些开放性、多元性的研究,反映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营造的自由、蓬勃的学术氛围。

三是在学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一般来说,刊发文章的质量如何,与文章的类型关系很大。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刚从“文革”严冬走出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由于还没有建立与健全学术研究的规范和学术共同体的规则、范式,时事宣传类文章、工作总结类文章、教学教案类文章还时有出现,但学术论文比重、转载数量已相当可观。据宋应离先生对1978—1981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的10家学报所发文章进行的统计,学术论文占文章总数的85%以上。^{[6]287}正因为对学术、学理的重视,所发文章的转载率也越来越高。以《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为例,在1980—1981年两年内,仅《复旦学报》就被转载107篇。1982年,《新华文摘》全年12期共摘用学术论文500多篇,其中选自高校文科学报的就有130多篇,约占总数的1/4强^{[6]288}。转载量的增多,学术影响的扩大,既促使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进一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规范办刊范式,凸显学术期刊应有的气度和章法,又繁荣了学术研究,为期刊学术质量的提升和中国社科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2. 关注现实,推进改革进程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不仅追求学术性,同时还十分关注现实、记录时代律动,在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解放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先声,而思想解放的标志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此之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已发表了多篇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文章,实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河。例如,《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刊登了梁宁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复旦学报》1978年复刊后第1期开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专题笔谈,发表了林永民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等7篇文章,其内容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从理论、学术上肯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当时,“两个凡是”大行其道,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能发表这样的文章,且不说其学术敏感、学术认知高人一筹,只说其文章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敢于率先发表的政治胆识、政治魄力,就已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具有一定的引领和助推作用。不仅如此,当大讨论席卷全国的时候,《武汉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北京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等一大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都组织了相关笔谈、专题,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使以学术理论研究见长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大放异彩,凸显了记录时代、引领时代的特质。例如,面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拨乱反正,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刊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重头文章,如《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刊发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复旦学报》1978年第2期刊发的《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史哲》1979年第3期刊发的《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等。

这不仅使高校这一学术地基上开放出了璀璨的时之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营造了历史人物客观评价、学术问题自由争鸣的学术生态环境,推动了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进程。

二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引人瞩目的是思想解放和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当时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既在思想解放中赚足了“眼球”,又在面对改革开放亟需解决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实践、新问题,交出了比较优异的答卷。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我国经济属于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些事关改革目标的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刊发了蒋学模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一文,旗帜鲜明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而1980年代前期,曹凤岐就曾大胆提出要在中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的主张:《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率先刊出曹凤岐的《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之后,《北京大学学报》还连续刊发了“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文章,为理论界广泛接受,并受到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5]234}该学报也被认为是“国内公开发表‘股份制改革’文章的第一本刊物”^[13]。另外,《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刊发的《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刊发的《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改革》,《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刊发的《我国农村家庭经营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新贡献》,《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刊发的《论我国当前的结构性需求膨胀》,《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刊发的《工

作日制度的改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也都论证和回答了“四化”建设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所有这一切,不仅凸显了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激情荡漾的1980年代积极投身现实问题研究、多方位展现改革成就的特色和风骨,而且也对改革实践和经济建设产生了促进作用。

3. 注重特色,服务高校与区域发展

个性和特色既是期刊的招牌,也是期刊的资本。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刚刚告别了物资短缺、知识短缺、精神短缺和思想短缺的中国,万事万物都散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从万马齐喑中走出来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个性,彰显自我,不仅迅速地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发展态势,而且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服务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或服务于建设经济、传承优秀文化。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特色、打造品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所在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为特色。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处于计划经济阶段的我国高校,其学科建制、招生规模、培养层次、专业特色、学术方向等各不相同,而依托各高校迅速发展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仅熟悉所在高校的特色、特长、优势、重点等,而且其办刊宗旨、功能、定位等也与所在高校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尤其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大部分编辑,本身就是高校社科类院系的教师,有些还是重点学科的领导、专家,这使期刊本能地都把展现本校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等作为刊物的发展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一时期新创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人口研究》、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现代传播》、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等,均将展现本校本院所的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等作为刊物的发展方向,刊物个性特色鲜明,这不仅有利于刊物的健康发展,而且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与专业学术期刊相对应,这一时期的综合性学报也都依据各高校办学层次、办学方针、高校性质、承担的教育任务,以及学术资源状况、科研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开辟特色栏目,打造品牌。例如,一些重点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南开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分别在文学、史学、经济学、哲学、新闻学、语言学、历史、政治等传统学科上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师范类名校学报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等,边疆高校学报如《思想战线》《贵州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报》的民族学、边疆民族史研究等,地方高校学报如《河南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编辑学研究,《深圳大学学报》的特区问题研究等,不仅成功避开了“千刊一面”的尴尬,突出了各自的优势,打造了品牌,展现了“高校+学术”的特色,而且也对高校的学术、学科建设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助推作用。

二是以高校地域特点为特色。地域优势既包括地理环境优势,也包括历史积淀、人文特色等优势。我国高校众多,分布极不平衡,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高校居多,西部、北部边疆地区高校偏少。而大城市和边疆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各不相同,依托高校而创办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各有千秋。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殷都学刊》(安阳师范学院主办)的“殷商文化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研究”、《齐鲁学刊》(曲阜师

范大学主办)的“孔子·儒家·齐鲁文化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研究”等,都在1980年代独领风骚。不仅如此,在那个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年代,学报作为高等学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传播媒介,基本是一校一刊,即使是当时新成立的地方院校(边疆院校)、师范专科学校、地市党校等学术、学科不强的学校,也都有学报编辑部这个组织机构。于是,学科强的拼学科,科研强的拼科研,其他的大多利用学校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优势、历史文化优势、人文资源优势,或另起炉灶,创办特色学术期刊,或独辟蹊径,创办学报特色栏目。前者如厦门大学1983年创办的《台湾研究集刊》、西北民族大学1986年创办的《西北民族研究》、山东大学的《周易研究》、青海民族大学1989年创办的《青海民族研究》等,现在都是CSSCI来源期刊;后者如《河南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杭州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的“徽学研究”等,均发展得较好。师范专科类学报、地方大学学报,如《赤峰师专学报》的“辽研究”、《阴山学刊》(包头师范学院主办)的“阴山文化研究”、《开封师专学报》的“清明上河图研究”、《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主办)的“汉代文化研究”、《呼兰师专学报》的“萧红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研究”、《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衡阳师专学报》的“船山研究”、《承德师专学报》的“避暑山庄诗文研究”,等等,都对发扬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四、结语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是一个激情迸发的10年,是一个创造传奇、成就神话的10年。就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来说,尽管也存在着办刊模式不完善、刊物策划少、季刊多且刊文量少等

缺陷,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最大的亮点是发展快、成就多、百花齐放,最突出的贡献是为改革开放40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欣欣向荣开了个好头,在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 [1] 姬建敏.新时期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特征刍议——以1977—1987年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41.
- [2] 史洪智.笔墨春秋——我与《河南大学学报》[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164.
- [3] 郭常英.坚守与求新——纪念《史学月刊》创刊65周年[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47.
- [4] 宋应离.名刊名编名人[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321.
- [5] 李频.共和国期刊60年(1949—200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 [6] 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简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 [7] 乔家君.中国高校学报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28.
- [8] 马宇红.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简史[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48.
-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4.
- [10] 章培恒.总序[C]//黄颂杰,吕晓刚,周桂发.光华文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
- [11] 龙协涛,胡梅娜.润物细无声——社科学报编辑家耕耘录(续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222.
- [12] 刘京希,郭震旦.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个案[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50.
- [13] 姚申.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5):82.



引用格式:蔡艳玲,司俊龙.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国际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94-102.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094-09

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国际研究热点 可视化分析

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hotspots on working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蔡艳玲, 司俊龙

CAI Yanling, SI Junlong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运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III,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2006—2016 年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历时变化等要素进行分析,发现:从时间来看,近 10 年来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的重要性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共被引文献来看,A. D. Baddeley、M. Daneman、A. Miyake 等在核心文献中贡献突出;从文献突变来看,M. T. Ullman (2004)、J. R. Saffran (1996) 等所著文献具有较高的突变度,这表明这些文献在相应的时间区间内对工作记忆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从研究热点看,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视域下的工作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记忆容量与各组成部分对二语习得的作用,涉及语音意识、词汇习得、句子加工、语篇写作系统、二语习得反馈、纠错等方面,语言学能也成为了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一些精密的仪器和手段来测量工作记忆对学习者的二语习得的影响,综合利用现代先进的脑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以促进二语习得的发展。

关键词:
工作记忆;
二语习得;
共被引文献;
文献突变;
知识图谱

收稿日期:2017-10-09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6-GH-050)

作者简介:蔡艳玲(1966—),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修辞写作。

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能力有限的记忆系统。自 A. D. Baddeley 等^[1]提出“工作记忆”这一概念以来,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证明,工作记忆对人们的学习、记忆、思维等高级认知活动都起着重要作用,能保持任务相关信息在一定时间内处于高度激活与可提取状态。工作记忆研究最早是认知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所关注的焦点。随着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心理学等学科不断发展,二语习得研究也从语言学延伸到神经科学和信息处理等多个领域和学科^[2]。记忆在语言习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言语行为和言语学习的核心。当大脑接收信息时,有三类记忆在起作用:感觉记忆、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3]。感觉记录器将接收到的信息以电化冲动的形式传入大脑供工作记忆加工;工作记忆具有储存和加工两种功能,是知觉、长时记忆及其活动之间的接口,从而支持了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4];长时记忆则系统储存知识。工作记忆通过大脑中所储存的信息,可促进复杂的认知活动,如学习、理解和推理等^[5]。

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当前有关二语习得的实证研究多使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探讨工作记忆对语言输入、理解和输出的作用,指出工作记忆对不同二语范畴的习得与发展,以及二语技能学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二语技能尤其是复杂认知技能如听、说、读、写都有影响,并且有抑制来自母语干扰的作用^[6]。A. D. Baddeley^[7]认为,语音工作记忆不仅影响母语学习,也有助于二语学习;学习者的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研究中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之一”^[8]。最近,A. D. Baddeley 等^[9]指出,认知心理学界的工作记忆理论今后需结合二语习得的特点来进行扩展和补充,两者的理论整合工作

亟待提升。随着一些专家学者不断尝试运用新的视角、对新的领域进行述评,大量关于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不断涌现。例如,吴潜龙^[10]从语言与思维之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二语习得中出现的问题;温植胜等^[11]在认知心理学和语言习得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工作记忆视角下“语音/执行”二语习得研究理论模型;陈士法等^[12]研究了我国外语界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之关系;马拯^[13]评述了工作记忆研究的理论模型、测量工具和研究成果。然而以往研究多采用传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法,本文拟借助 CiteSpace III 文献可视化软件,运用引文分析的方法,利用客观数据对国际期刊中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历时变化等要素进行分析,以更加形象直观地呈现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的研究热点,并对当前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做出客观全面的梳理,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采用 CiteSpace III 科学计量学分析工具来系统梳理二语习得视域下的工作记忆研究现状,文献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23 日,检索主题为 working memor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经过二次检索排除其他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 225 个文献记录。我们通过对由检索得到的数据进行文献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分析,并按年份进行归类,绘制出工作记忆国际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以对图谱进行解读和分析。检索到的这 10 年相关文献每年发表工作记忆研究论文情况,具体见图 1。

由图 1 可见,在 21 世纪初,有关工作记忆的研究国际上成果较少,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然而,近年来随着工作记忆研究理论的

不断完善和应用的推广,工作记忆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成果呈不断上升趋势。

二、数据分析

1. 工作记忆研究共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在工作记忆研究领域的发展演变历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文献,文献共被引图谱可以追根溯源、形象直观地展示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轨迹。运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III 对 225 篇论文进行文献共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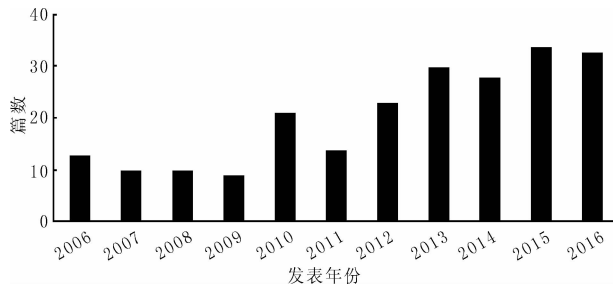


图1 工作记忆研究论文发表数量与时间分布图

引分析,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2),其中聚类值 Modularity (Q)为0.7204,聚类内部相似度指标 Silhouette (S)值为0.8497,这说明聚类内节点联系比较紧密,聚类内节点的主题具有较强关联性。图谱中1个节点代表1篇文献,“年轮”(节点向外扩展的不同颜色圆圈)代表此文献在不同年份被引用的频次,从里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而近。圆圈厚度与被引频次相关,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粗细代表着文献共被引关系的强弱。节点之间连线的不同颜色,分别对应首次被引用时间。知识图谱中关键点的圆圈大小、“年轮”疏密、连线粗细等形象地展示了工作记忆国际研究状况和研究趋势。节点中外圈呈紫色的“年轮”代表文献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最外围的紫色“年轮”越厚,说明该文献越具有产生革新性影响的潜质^[14]。图谱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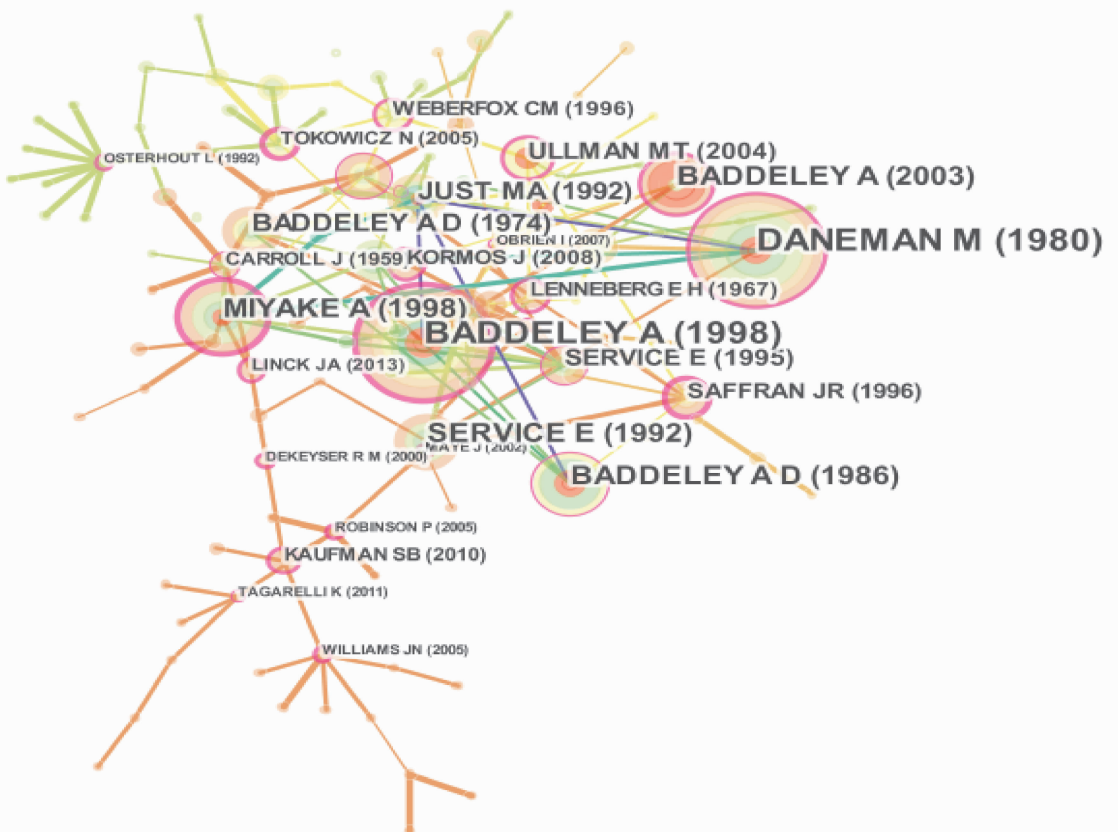


图2 工作记忆共被文献引知识图谱

A. Baddeley* (1998)、M. Daneman (1980)、A. Baddeley (2003)、A. Miyake (1998)、N. Tokowicz (2005) 等作者的文章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是该领域具有标志意义的“拐点”^[15]。从图谱中圆圈“年轮”大小可以看出,共被引文献依次有 A. Baddeley (1998)、M. Daneman (1980)、M. A. Just (1992)、A. Baddeley (2003)、M. T. Ullman (2004) 等研究者的论文。另外,图谱中连线的粗细显示, A. Baddeley (1998)、M. Daneman (1980)、A. Miyake (1998) 等作者所著文献都有着很强的共被引关系。

被引频次是同行认知的一种形式,反映学术群体对学者的信赖和认可程度,同时也体现学者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影响^[16]。通过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向前可以追溯文献根源,向后可以追踪发展^[16]。利用 CiteSpace III 可视化软件,对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按照文献的被引次数进行排序的情况见表 1。

通过分析发现,共被引文献主要是对工作记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语音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容量之间的关系、语音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对于二语学习者学习词汇的作用,以及工作记忆对二语学习者听说读写与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影响的研究等。由表 1 可见,共被引次数排名第 1 位的是 A. Baddeley 等作者 (1998) 的一篇文章,该文章通过对正常成人和儿童,以及神经心理疾病患者和特殊发展人群的研究,发现语音环在学习具有异常语音形式的新词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引次数列第 2、第 3 位的分别是 M. Daneman (1980) 和 A. Baddeley (1986) 所著文献。M. Daneman 等^[17]通过实验发现阅读理解的个体差异可反映出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别,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协调加工和储存功能方面。A. D. Baddeley (1986) 阐述了短时

记忆的研究现状,构建出工作记忆的特殊模型,即视觉空间模板、语音环和中央执行系统,并全面阐述了各个系统的不同功能和作用。被引次数列第 4 位的是 A. Miyake 等作者 (1998)^[18] 所著文献。该文提出工作记忆的容量差异会对二语习得过程产生影响,并通过阅读广度实验发现母语和二语能力与母语和二语的工作记忆有关。E. Service (1992)^[19] 所著文献的被引次数列第 5 位。该文通过非词复述和非词抄写,以及比较句法语义结构预测英语学习能力的实验,发现在工作记忆中记忆陌生语音材料的能力是外语新词学习的基础。A. Baddeley (2003)^[20] 所著文献名列第 6 位。该文研究了工作记忆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详细说明了工作记忆的组成,以及各子系统的功能。被引次数列第 7 位的是 A. Baddeley (2007)^[21] 所著文献。该文介绍了工作记忆的相关概念,把工作记忆引入更为广阔的情境中进行研究,以发现工作记忆与社会行为、情感、意识直觉和行为控制的关系。这种尝试也引出了一些关于意识的经典哲学问题和关于自由意识的研究。被引次数列第 8 位的是 H. Cheung (1996)^[22] 所著文献。该文发现语音记忆在二语词汇习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与学习者的语言知识相互作用。被引次数列第 9 位的是 A. Baddeley (2000)^[23] 所著文献。该文在原工作记忆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第四个系统即情节缓冲器,从而扩展了工作记忆模型的适应性。被引次数列第 10 位的是 E. Service (1995) 等所著文献^[24]。该文通过非词复述的精确度实验,得出语音短时记忆与外语词汇习得有着密切关系的结论。

工作记忆研究突变文献的时间线图谱见图 3。所谓“突变”,是指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发生了很大变化,被引次数突变表示文献在某

* Baddeley Alan David 在被引文献中有 A. Baddeley 和 A. D. Baddeley 两种缩写形式,本文统一缩写为 A. Baddeley。

一时间段内引用量迅速增加,图中深色线框代表突变发生变化的时间区间。由图3可见,M. T. Ullman (2004)、J. R. Saffran(1996)等作者所著的文献具有较高的突变度,表明这些文献在相应的时间区间内对工作记忆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M. T. Ullman(2004)^[25]用实验验证了陈述性和程序性记忆模型等理论,为心理词汇和心理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J.

R. Saffran(1996)研究发现,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可以根据相邻语音之间的关系把单词从流利的语言中分割开,从而实现语言习得;C. M. Weberfox(1996)运用 ERPs 和行为反应法对61位汉英双语成年人进行测试,发现与语言相关的神经系统会随成熟期的变化受到限制,专门加工语言的神经子系统也显示出不同的敏感期。另外,从图谱中也可以看出,H. Clahsen(2006)

表1 工作记忆研究文献共被引列表(按被引次数排序)

排序	被引次数	中心性	作者	文献篇名	文献来源期刊/出版社名称	年份
1	42	0.33	A. Baddeley, S. Gathercole	<i>The phonological loop as a language learning device.</i>	<i>Psychological Review</i>	1998
2	39	0.43	M. Daneman	<i>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and reading</i>	<i>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i>	1980
3	31	0.17	A. Baddeley	<i>Working memory</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30	0.18	A. Miyake, P. F. Naomi, F. H. Alice, et al.	<i>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working memory as language aptitude</i>	<i>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i>	1998
5	30	0.33	E. Service	<i>Phonology, working memor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i>	<i>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i>	1992
6	27	0.11	A. Baddeley	<i>Working memory and language: an overview</i>	<i>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i>	2003
7	27	0.22	A. Baddeley	<i>Working memory thought and action</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25	0.06	H. Cheung	<i>Nonword span as a unique predictor of second - language vocabulary language</i>	<i>Developmental Psychology</i>	1996
9	25	0.04	A. Baddeley	<i>The episodic buffer: a new component of working memory</i>	<i>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i>	2000
10	24	0.02	E. Service, V. Kohonen	<i>Is the relation between phonological memor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ccounted for by vocabulary acquisition</i>	<i>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i>	1995



图3 工作记忆研究突变文献时间线图

的研究成果在相应的时间内也发生了突变,被引用次数显著增加,对工作记忆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

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反映文章的主题,相同的关键词在不同文章中的重复出现就可以被视为研究热点^[26]。利用 CiteSpace 对国际期刊论文中工作记忆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我们绘制出工作记忆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 4。图谱中 1 个节点代表 1 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连线的粗细反映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的强弱。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排序情况见表 2。

图 4 和表 2 显示工作记忆研究的关键词有工作记忆、习得、个体差异、短时记忆、语言、英语、儿童、理解、双语、外语、知识、语音记忆、记忆、二语习得、语音意识、双语儿童、非言词复述、核磁共振、语法、大脑等,与这些词相关的内

容成为近年来工作记忆研究关注的焦点。图 4 中连线的疏密程度、实线与虚线以及“年轮”色彩的厚度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基于关键词图谱和表格可以看出,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的理论整合联系密切,但仍处于萌芽阶段;工作记忆对于二语学习过程牵涉到的认知技能如听、说、读、写都有影响,研究者主要研究工作记忆与二语学习中的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联系;从关键词中可以发现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应用语言学家的重视,对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之间联系的研究也在加强;语音工作记忆和中央执行器对二语学习的影响也引起一些专家的关注;利用数字广度、非词复述等方法测试语音工作记忆的广度,利用阅读广度、运算广度等方法测试工作记忆的复杂记忆广度已成为工作记忆研究一种新的方法,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的应用已成为现代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流行范式。在关键词图谱中 English、Spanish、Chinese、French、German 等也

CiteSpace, v. 5.0.R1 SE (64-bit)
December 28, 2016 7:24:08 PM CST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WML\data
Timespan: 1996-2016 (Slice Length=1)
Selection Criteria: Top 40 per slice, LRF=-1, LBY=-1
Network: N=227, E=406 (Density=0.0158)
Pruning: M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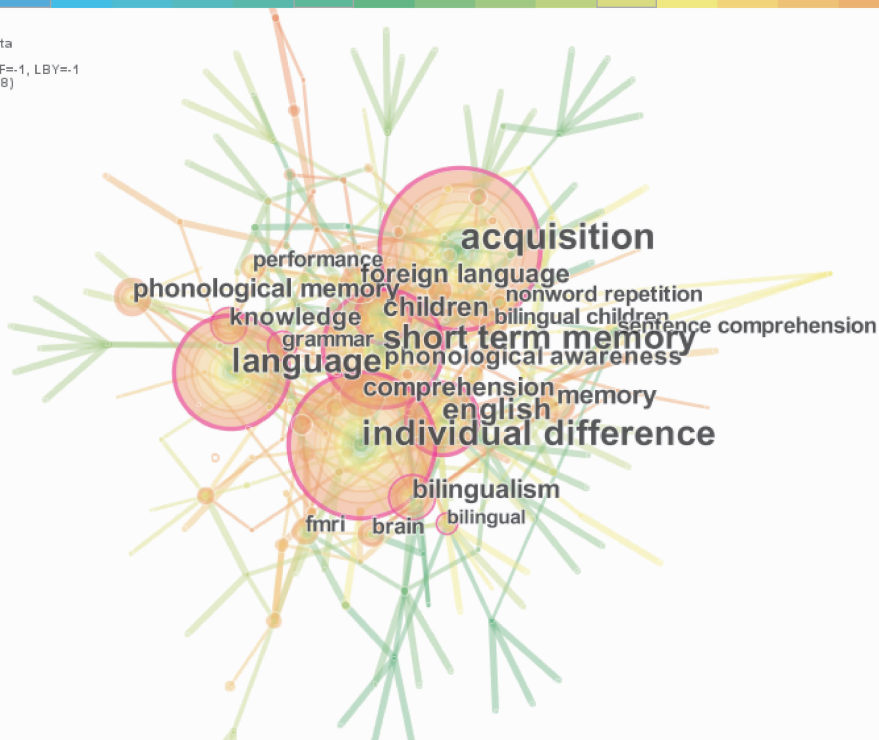


图 4 工作记忆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表2 工作记忆研究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working memory(工作记忆)	153	0.17
2	acquisition(习得)	68	0.23
3	individual difference(个体差异)	60	0.44
4	short term memory(短时记忆)	50	0.34
5	language(语言)	48	0.32
6	English(英语)	30	0.17
7	children(儿童)	22	0.27
8	comprehension(理解)	19	0.05
9	bilingualism(双语)	19	0.11
10	foreign language(外语)	17	0.08
11	knowledge(知识)	15	0.12
12	phonological memory(语音记忆)	15	0.03
13	memory(记忆)	15	0.05
14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二语习得)	14	0.08
15	phonological Awareness(语音意识)	13	0.05
16	bilingual children(双语儿童)	13	0.10
17	nonword repetition(非言语词复述)	12	0.04
18	FMRI(核磁共振)	12	0.13
19	grammar(语法)	12	0.10
20	brain(大脑)	12	0.12

成为关键词, English 的被引频次最高, Spanish 也逐渐活跃, 这说明工作记忆的语言研究对象比较广泛。探讨工作记忆的主要成分与母语习得不同层面间的关系、语音工作记忆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学习者在执行控制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 以及对语言理解加工的影响等, 已成为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

此外, 为了更清楚地呈现 2006—2016 年工作记忆国际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 我们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关键词按其年份进行归类, 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见, 研究者主要关注工作记忆对语音意识、词汇习得、句法加工与语篇写作的影响。同时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中的元语言知识、语言障碍者、习得反馈、纠错与儿童习得者之关系的研究等, 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研究者对于学习者非言语智力和行为也进行了探索, 语言学能及其相关因素也成为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地采

用脑成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以探讨大脑功能与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三、结论

本文运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III, 主要对 2006—2016 年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领域有关工作记忆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共被引、文献突变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历史变化等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数据表明, 近 10 年工作记忆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工作记忆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性。从研究者方面看, A. Baddeley、M. Daneman、A. Miyake 等在核心文献中贡献突出。在研究内容上, 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语习得视域下的工作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记忆容量与各组成部分对二语习得的作用, 涉及语音意识、词汇习得、句子加工、语篇写作系统、二语习得反馈、纠错等方面, 语言学能也成为了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特别是工作记忆差异对阅读理解的作用也是研究热点。同时, 工作记忆研究对特殊学习者日益关注, 当前国际上也开始从脑白质完整性、言语运动控制、特殊性语言障碍(如对儿童多动症和儿童孤独症的研究), 以及其他认知神经机制等方面对工作记忆进行研究。

国际上对于工作记忆的研究不仅从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上进行了创新, 而且其研究范式、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工作记忆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一些精密的仪器和手段来测量工作记忆对二语习得学习者的影响, 综合利用现代先进的脑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为促进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有效的途径。

本文对国际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热点进行

表3 国际期刊论文中二词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热点的历时变化情况(2006—2016)

年份	研究热点1	研究热点2	研究热点3	研究热点4	研究热点5
2006	phonological awareness	foreign language vocabulary	FMRI	mental practice	brain imaging
2007	sentence comprehension	working memory	FMRI	auditory process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8	vocabulary acquisition	nonverbal IQ	metalinguistic knowledge	working memor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9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ental-retroflex contrast	working memory	reading comprehension	
2010	integrated format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preschool children	nonword repetition	nonverbal intelligence
2011	phoneme awareness instruction	writing system	syntactic level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ambiguity resolution
2012	corrective feedback	cognitive processing	vocabulary development	phonological awareness	novel speech behavior
2013	corrective feedback	behavioral evidence	Non-word repetition	bilingual children	language aptitude
2014	ERP evidence	formation processing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mplantation	language evolution
2015	identical hypothesis	perceptual reorganization	early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eferred imitation
2016	white matter integrity	writing system	speech motor control	number agreement	explicit correction

了可视化分析,涉及的国内研究动态较少,今后可将国际与国内有关工作记忆研究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以充分把握工作记忆研究的前沿和动态。此外,未来应不断对工作记忆和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框架、实验工具和研究手段进行整合和创新,以促进二语习得的研究发展与提高。

参考文献:

- [1] BADDELEY A, HITCH G J.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47.
- [2] 郝广伟. 认知心里视域下的二语习得“注意”[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版(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5):10.
- [3] 桂诗春. 记忆和英语学习[J]. 外语界, 2003(3):2.
- [4] BADDELEY A. The episodic buffer; a new component of working memory?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00(11):417.
- [5] 徐方. 短时记忆在国内二语习得中的研究述评[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5(2):122.
- [6] LINCK J A, OSTHUS P, KOETH J T, et al. Working memory and seco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a meta-analysis [J]. Psychonom-

ic Bulletin & Review. 2014(4):861.

- [7] BADDELEY A. Working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WEN Z, MOTA M, MCNEILL M. Working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5:17.
- [8] DRNYEI Z. The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2005.
- [9] WEN Z, MOTA M, MCNEILL M. Working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C].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5.
- [10] 吴潜龙. 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几个问题[J]. 外语教学, 2000(1):3.
- [11] 温植胜, 易保树. 工作记忆与二语习得研究的新进展[J]. 现代外语, 2015(4):65.
- [12] 陈士法, 崔涛涛, 罗小姝. 国内外语界工作记忆与第二语言习得关系研究 20 年[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2):15.
- [13] 马拯. 二语习得视域下工作记忆研究综述: 从理论框架到实证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11):46.
- [14] CHEN C M.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2006,57(3):359.
- [15] 冯佳,王克非,刘霞.近二十年国际翻译学动态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2014(155):11.
- [16] 李杰,陈超美.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
- [17] DANEMAN M, CARPENTER P A.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and reading[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80(19):450.
- [18] MIYAKE A, NAOMI P F, ALICE F H, et 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working memory as language aptitude [J].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1998:339.
- [19] SERVICE E. Phonology, working memory, and foreign-language learning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92(1):21.
- [20] BADDELEY A. Working memory and language: an overview[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2003(3):189.
- [21] BADDELEY A. Working memory, thought and a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13.
- [22] CHEUNG H. Nonword span as a unique predictor of second-language vocabulary language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6(5):867.
- [23] BADDELEY A. The episodic buffer: a new component of working memory?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00(11):417.
- [24] SERVICE E, Kohonen V.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phonological memor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ccounted for by vocabulary acquisition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995(2):155.
- [25] ULLMAN M. Contributions of memory circuits to language: the declarative/procedural model [J]. Cognition, 2004(92):213.
- [26] 刘霞,许家金,刘磊.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概述(1998—2013) [J]. 语料库语言学, 2014(1):69.



引用格式:何芳芝. 言语幽默性别差异研究——以《爱情公寓》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103-108.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1.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1-0103-06

言语幽默性别差异研究

——以《爱情公寓》为例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verbal humor

—Taking *Love apartment* for example

何芳芝^{1,2}

HE Fangzhi

1.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2. 罗切斯特大学 华纳教育人文学院, 纽约 罗切斯特 14624

摘要:以《爱情公寓》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研究言语幽默的性别差异,发现:从幽默言语的数量上看,男性比女性更多使用幽默言语,不论是在男性之间或是在男女之间男性都表现得比较活跃,更具有幽默感;从幽默功能看,男性之间的幽默言语主要以取笑和冲突为主,而女性之间的幽默言语以分享为主,男女之间的幽默言语以取笑为主;从幽默调侃的对象来看,男女之间的幽默,女性在多数情况下扮演着取笑男性的角色,而男性往往是被取笑的对象。幽默性别差异的主要根源在于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不平等,在行为准则、交际场合上存在差异。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男性的优越感和主宰权,而女性则被要求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因此,不是男性的幽默感天然地比女性强,而是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观制约了女性幽默天赋的发挥。

关键词:

言语幽默;
性别差异;
行为准则;
交际

收稿日期:2017-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Y021);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14GGJS-086)

作者简介:何芳芝(1977—),女,河南省邓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引起了各个学科的关注,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幽默是个人风格的一种体现,有助于社会交际。研究幽默的性别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幽默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构建和谐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幽默的性别差异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除少数硕士论文外,几乎没有期刊论文论及,而且现有的研究多以英美国家为社会背景。鉴于此,本文拟选取情景喜剧——《爱情公寓》作为考察对象,解析言语幽默所反映出来的性别差异,以及导致此种差异的根源。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由汪洋担任制片人的《爱情公寓》第一季(共20集)作为分析语料考察幽默的相对数量是否具有性别差异,以及幽默的功能是否具有性别差异。语料的选择依据以下两个标准:第一,必须是超乎常规的语言使用;第二,必须伴随有听众笑声或罐装笑声。本研究非穷尽性的精确研究,因此即使没有找出所有的幽默言语,定量分析的结果也具有代表意义。此外,由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性别差异,所以对幽默言语的分类以幽默话语发出者与幽默调侃对象的性别为依据。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爱情公寓》中的幽默对白为对象。该剧以一幢名为“爱情公寓”的公寓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用一个个幽默诙谐的故事展现住在这里的7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以嬉笑怒骂的手法演绎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情景喜剧为语料来源,是因为情景喜剧更多地借用幽默对白来塑造人物形象、构建故事情节。语言在文艺创作中可以起到凸显人物性格特点、渲染情境与启迪思

考的重要作用,情景喜剧能集中展现各种形式的幽默言语,且情节非常接近现实生活,所以情景喜剧是考察幽默言语的最好语料来源。

2. 理论依据

J. Hay^[1]认为,幽默具有团结功能、权力功能与心理功能,并认为团结功能包含分享、突出相似与调侃取笑,权力功能包含冲突与控制,心理功能包含自我防御与应对。

分享功能主要指说话者通过幽默言语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听者更多地了解自己,如《爱情公寓》第3集主人公欧阳(男)与子乔(男)的如下一段对白。

欧阳:那你最恐怖的梦是什么?

子乔:最恐怖的梦?

欧阳:对,就是让你能够突然惊醒的梦。

子乔:那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梦到自己在考试,噢,太恐怖了。

欧阳:好,继续。

子乔:后来我就一下子惊醒了,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我真的在考试。

子乔在一菲(女)和小贤(男)的陪同下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欧阳让子乔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没病装病,子乔就讲述了自己高中考试时做梦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子乔玩世不恭的性格特点。

突出相似功能,顾名思义,就是说话者通过讲述与听者相似的经历,利用同病相怜的心理,获得听者的信任,如《爱情公寓》第3集主人公一菲与小贤的一段如下对白。

一菲:曾老师曾经和你一样,也有着严重的心理障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看了心理医生,才重新做人,并且活到了现在。

小贤:对啊,她说的基本上……没错。

为了说服子乔去看心理医生,一菲故意编造小贤也有看心理医生的经历以博取子乔的信任,小贤也非常配合地承认自己曾有过心理疾病。

调侃取笑功能,是指说话者通过调侃他人的不幸经历、言语特征而引人发笑。一般只有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才会互相取笑,以增进感情,如《爱情公寓》第2集小贤与一菲的如下一段对白。

小贤:出大事了,如果我现在要选择一个卡通人物来形容子乔的话,那就是绿巨人了。

一菲:绿? 股票跌了?

小贤:跌你个头啊! 绿帽子,再这么发展下去,子乔很快就会绿得跟油菜花一样了。

一菲:你说的是西兰花吧,油菜花那是黄的。

小贤看到美嘉(女)和关谷(男)独处,误认为美嘉和关谷关系暧昧,很同情子乔的遭遇,并试图帮助子乔。当他和一菲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故意用绿巨人来取笑子乔被戴“绿帽子”了。

幽默优越论认为幽默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幽默者通过幽默来展示自己心理或物质上的优越感^[2]。而制造冲突是幽默者体现优越感最常用的形式之一,如《爱情公寓》第6集中美嘉与子乔的如下一段对白。

美嘉:吕子乔! 你是我见过的最垃圾最混蛋最不要脸的男人,看见你我就相信基因确实会突变的,而且会越变越烂!

子乔:陈美嘉! 你是我见到的世界上

身材最平的女人,你不是飞机场,你简直就是盆地,下雨天还会积水的那种!

以上两个人物之间的言语虽然在观众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在具体的语境中是彼此恶意贬低对方,以突出自己的优点,制造更多矛盾和冲突。

控制局面也是权力功能的一种体现,即说话人(幽默者)能够掌控局面,以影响听者的行为,如《爱情公寓》第3集美嘉与子乔的如下一段对白。

美嘉:住手。

子乔:美嘉,美嘉,你来救我啦,美嘉。

美嘉:你们想虐待子乔?

(子乔哭,小贤松手)

美嘉:让我来吧。

子乔:什么?

一菲和小贤为了治疗子乔的抑郁症想尽办法,结果发现子乔假装有病以获取朋友们的关心和同情。他们十分生气,想借电击疗法之名惩罚子乔,但无意中被美嘉撞见,美嘉使用言语幽默获得场面的控制权,并得到了惩罚子乔的机会。

自我防御是幽默的主要心理功能之一,指说话者明知自己的行为或语言不太恰当,在受到听者言语攻击时,利用幽默巧妙地进行反击,从而保全自己的面子,如《爱情公寓》第3集子乔与美嘉的如下一段对白。

(美嘉抖出一大堆硬币)

子乔:拿走,拿走,这都什么啊?

美嘉:干吗? 没见过人民币啊?

子乔催促美嘉该交房租了,美嘉仅有一些硬币,子乔看到之后不屑一顾,用言语对美嘉进行了讽刺,但是美嘉通过幽默的言语对子乔进

行了反驳,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应对功能指说话者通过言语幽默解决谈话中出现的问题,如言语不当、表达不清等,以化解尴尬局面,如《爱情公寓》第4集小贤与 Lisa (女)的如下一段对白。

小贤:不会,其实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智障。

Lisa:你不是说他是收电费的吗?

小贤:他幻想自己是收电费的,上星期下雨打雷闪电的,他硬是要把闪电的电费算在我的头上。

小贤为了获得一档电视节目的主播资格,百般讨好制片人 Lisa,并邀请 Lisa 来家做客。Lisa 发现了子乔的照片,并坦白在和子乔有一夜情之后再也联系不上他。为了不让子乔的出现毁掉这次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小贤在子乔敲门时说他是收电费的,巧妙地化解了子乔和 Lisa 相遇的尴尬局面。

3. 数据统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语料按照7种功能进行定性分析,然后进行定量统计。通过观看视频、分析文本,我们共发现幽默言语125例,其中男性之间的幽默言语17例,女性之间的幽默言语10例,男女之间的幽默言语98例(见表1)。在男女之间的98例幽默言语中,男性作为发话者的有59例,女性作为发话者的有39例;男女之间以取笑为主的54例幽默言语中,男性作为发话者的有23例、作为被取笑对象的有31例,女性作为

发话者的有31例、作为被取笑对象的有23例。

二、数据特征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从幽默言语的数量上看,男性比女性更多使用幽默言语,不论是在男性之间或是在男女之间男性都表现得比较活跃,更具有幽默感;从幽默功能看,男性之间的幽默言语主要以取笑和冲突为主,而女性之间的幽默言语以分享为主,男女之间的幽默言语以取笑为主;从幽默调侃的对象来看,男女之间的幽默,女性在多数情况下扮演着取笑男性的角色,而男性往往是被取笑的对象。

1. 男性的幽默言语多于女性

在本研究中,男性作为发话者的幽默言语共有76例,占61%,这说明男性更具有幽默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幽默,男性会借助讲笑话、调侃、揶揄、滑稽模仿等幽默手段,使自己成为交际场合中的焦点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从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到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各种幽默的主人公主要是男性。喜剧电影中的主要角色也多是男性,如《憨豆先生》《三傻大闹宝莱坞》等。即使在动画片中,喜剧动画人物也以雄性为主,如《猫和老鼠》中的汤姆和杰瑞。幽默大师,从卓别林到马三立,也是以男性为主。此外,中国戏曲文化中丑角的扮演者也多是男性。印度梵文剧本中宫廷打诨插科逗乐之人,也大多是男性。总而言之,男性在幽默方面占绝对多数。

2. 同性之间男性的幽默言语更具有攻击性

在男性之间的幽默中,取笑功能的幽默占41%,冲突功能的幽默占29%,二者合计共占

表1 幽默功能性别差异分析

发话者—听话者	分享经历	突出相似	调侃取笑	引起冲突	控制局面	自我防御	应对问题	共计
男—男	1	1	7	5	2	0	1	17
女—女	4	1	2	0	2	0	1	10
男—女	4	5	23	15	6	7	9	59
女—男	1	0	31	2	1	2	2	39

/例

70%;而女性之间的幽默凸显分享功能,占40%,主要目的是通过分享个人经历以增进友谊。男性幽默看似单纯为了活跃氛围,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男性与他人竞争的欲望。男性借助讲笑话和调侃等幽默言语表现手段,展现口才和智慧,主要用以贬低他人或对他进行生理或心理上的挑战,进而使自己脱颖而出,达到在交际中占上风的目的,尤其在公众场合。

3. 异性之间男性更容易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除男性之间幽默以打趣调侃为主要功能外,在男女之间的幽默中男性成为被调侃对象的也占到57%,这说明男性是幽默言语主体的同时,也是幽默的主要被调侃对象。调侃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越是关系密切的人之间,越会有更多的调侃打趣,即所谓的“戏谑关系”^[3]。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不论是男性之间还是男女之间,男性更容易成为调侃对象。心理学研究表明,对强者的嘲笑往往会增加弱者的自信心。^[4]在男女两性之间,女性作为相对弱者往往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因此,在男女之间的幽默言语中,女性不易成为调侃的对象,而女性更愿意借用幽默言语调侃男性,以增进彼此团结。

三、言语幽默的性别差异原因探讨

不可否认,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但幽默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社会观念规约的行为准则、交际场合等非生理因素所导致的。

在当今社会,虽然女性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对私有财产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支配权,且可以忽略分工差异而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但从整体上来看,男性的社会地位仍普遍高于女性,尤其是在公共领域。研究发现,表面上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很大的提高,而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但是在公共生活方面,尤其在乡镇,男性依然占有绝对的控制权。^[5]社会分工的差异、经济地位的低下、政治权利的缺失、

对社会必需品的贡献、理想女性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以及对男性的依赖,都是导致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因素,进而使男性可以借用幽默大胆展示自我,而女性则倾向于自觉约束自己。

男孩和女孩从小就被灌输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尽管不同文化对女孩的要求不尽相同,但女孩要比男孩承受更多方面的约束,尤其在言行举止、着装打扮等方面;而男孩则被教育为要勇敢、大胆。研究表明,孩提时期的男孩比女孩更喜欢打闹或言语攻击^[6]。男孩的游戏活动大多与嬉戏打闹有关,而女孩的游戏则常常采取玩玩具、过家家、做手工等相对安静的方式,虽然有时会在游戏过程中显得很热闹,但也不会危及玩伴的人身安全。男孩受到他人攻击时,倾向于反击;但是女孩因在孩提时代就被告知生活中要远离攻击行为,故在受到攻击时往往采取避让的态度。此外,女孩比男孩更早地承担家务,也比男孩更听从妈妈的命令^[7],而男孩则在个人成就和自给自足方面承受更多的压力。社会对女性行为举止的要求从各个方面限制了女性的行为。如在很多文化中,女性在公开场合放声大笑常被看作是自我放纵或淫荡的表现。好女孩、淑女要温柔贞洁、举止大方。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非标准的语言形式,整体上女性发音比男性更标准。^{[8]166}这表明女性较为顺从规范,言行较为严谨、合规。然而幽默的很多表现形式都违背这些行为准则。在与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中,女性往往感觉更受约束和限制。这一现象不仅与她们较低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也与社会所树立的女性行为准则密不可分。

导致幽默性别差异的另一原因是男人的交际范围更多是在公开场合,而女性的交际范围则多是家庭、小团体等私密场合。在多数行业中,男性的比例大于女性,在拥有较高权力的部门更是如此。虽然近年来女性开始打破职业界限,进入某些男人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但是女性

囿于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定位,参与的公共活动少于男性。P. Harvey 对各种会议的出席人数所做的研究表明,女性出席会议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而且出席会议的女性很少有发言的机会。^{[8]44-64}多数女性在讲话开始和结束时都会因为发言的内容、发言的时间而表示歉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一直宣称人人平等,但是研究表明,美国女性在正式社交场合一般不讲笑话,这大概是因为美国文化的习俗认为女性直截了当地讲故事或说笑话,不符合女性的社交礼仪原则。^[9]

四、结语

本研究以《爱情公寓》中的言语幽默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探究言语幽默的性别差异。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男性使用言语幽默多于女性;在幽默功能上,男性主要借助幽默实现冲突和取笑调侃的功能,女性则是为了增进团结;在男女之间的幽默中,男性往往成为被调侃的对象。幽默性别差异的主要根源在于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不平等,在行为准则、交际场合等方面存在差异。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男性的优越感和主宰权,而女性则被要求遵循一定的言行准则。因此,不是男性的幽默感天然地比女性强,而是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观制约了女性幽默天赋的发挥。

参考文献:

[1] HAY J. Functions of humor in the conversations

- of men and wome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6):709.
- [2] 何芳芝. 西方经典笑论的批判性思考[J]. *河南社会科学*, 2013(9):73.
- [3] SYKES A J M. The joking relationship in an industrial setting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9(68):188.
- [4] SALAVERA C, USÁN P, JARIE L. Styles of humor and social skills in students: gender differences [J]. *Current Psychology*, 2018(2):1.
- [5] 胡业方. 性别、权力与空间——农村妇女家庭与村庄权力类型研究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11):103.
- [6] MICKES L. Who's funny: Gender stereotypes, humor production, and memory bias [J]. *Psychon Bulletin & Review*, 2012(1):108.
- [7] CRICK N R, WEMER N E, CASAS J F, et al. Childhood aggression and gender: 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 [J]. *Nebr Symp Motiv*, 1998(45):75.
- [8] HARVEY P.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speech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gender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 [9] ATTARD S. Gender and humor: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J]. *Euro Americ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s*, 2016(2):63.